

第 16 章

加快經濟發展和開放：1982—1989

到 1982 年，陳雲的緊縮政策已取得了成功，但有意思的是，這反而使鄧小平更有理由推行陳雲所不贊成的「中國經濟超增長」政策。1980 年中國的預算赤字高達財政收入的 11.7%，到 1982 年已降至 2.6%。外匯儲備在 1980 年僅有 40 億美元，到 1982 年已升至 140 億美元。此外，1982 年的糧食產量為 3.54 億噸，比上年增長了 9%。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則達到 7.7%，幾乎是 4% 這一預定數字的兩倍。^[16-1]

鄧小平和陳雲在增長率上的分歧：1981—1983

到 1981 年，鄧小平對陳雲放緩增長率的經濟調整政策逐漸失去了耐心。他開始談論到 2000 年工農業產值要實現翻兩番。他在一次會議上問道，如果要使國民生產總值從 1980 年到 2000 年翻兩番，需要多快的增長速度。早已對此作過計算的胡耀邦立即回答：年均 7.2%。^[16-2]但是由於陳雲、姚依林和掌控著各計劃部門的謹慎幹部限制著基建投資的規模，1981 年的經濟增長只有 5.2%。

儘管鄧小平避免與陳雲公開鬧翻，但在華國鋒失勢後，鄧在政治鬥爭中已經不需要陳雲的合作，因而他開始加大推動現代化和經濟擴張的力度。有一次，鄧小平含蓄地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實際增長率與計劃增長率相差那麼大，這是不是有用？陳雲則回答說，生產超過計劃目標沒有問題。事實上，在陳雲看來，制定比較低的目標而後超越，比制定高目標要好。因為下面的幹部正幹勁十足，如果目標定得太高，他們會衝勁過大，超過經濟能夠承受的限度。結果會造成供應短缺和通貨膨脹，很快就會導致混亂，並使增長受阻。

1980 年底，在討論下一年的年度計劃時，陳雲的支持者姚依林說，儘管可以力爭達到 5%，但 1981 年可能實現的最高增長率是 4%——而從長遠看可能達到的最快增長速度是年均 6%。胡耀邦則盡力維護鄧小平的目標，於是他反駁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所有關於到 2000 年翻兩番的討論就毫無意義了。^[16-3]在 1981 年 12 月的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討論「六五」計劃（1981 年—1985 年）和 1982 年的年度計劃時，有關增長速度的分歧如此嚴重，乃至全國人大既沒有通過年度預算，也沒有明確「六五」計劃的增長目標。^[16-4]

1982 年 12 月上海全國人大代表團去陳雲在上海的冬季寓所看望他時，他用黃克誠的一個比喻來說明自己的觀點：「（經濟）就好比一隻鳥，鳥不能捏在手裏，捏在手裏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裏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對於那些想使經濟更加開放、更快增長的人來說，陳雲這種「鳥籠經濟學」成了阻礙市場發展的過時思維的象徵。陳雲後來解釋說，他所說的管制是指宏觀調控；鳥籠可以是一國一省，在某些情況下也許比一國還大。^[16-5]然而這種解釋並沒有終止對他的批評。

儘管陳雲的批評者有時會讓人覺得他反對一切改革，但事實並非如此。陳雲支持趙紫陽在四川率先進行的讓企業自負盈虧的改革；他贊成中央在原材料採購和產品銷售方面給予企業更大自由；他並不反對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並支持在工商業領域放鬆管制，讓下級幹部有更多的自由進行探索；他還同意在價格上要有一定的靈活性，使一些當時仍由計劃管理的小商品轉而進入市場交易。他也想讓經濟保持活力。^[16-6]但是陳雲認為，自己有責任維護計劃體制的良好秩序，使重點工業部門得到它們需要的資源，並確保通貨膨脹不至於失控。在這些問題上他表現得很固執。

在中共十二大（1982 年 9 月 1 日至 11 日）和隨後的全國人大（1982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0 日）公佈的文件中已經反應出鄧小平和陳雲在增長速度目標上日益擴大的分歧。黨代會上的大多數文件都是由謹慎的計劃幹部起草的。但在鄧小平的堅持下，大會接受了到世紀末讓工農業生產總值「翻兩番」這一目標。鄧小平堅定地重申，計劃增長率大大低於實際增長率不是好事。^[16-7]作為一名嚴守紀律的黨員，陳雲沒有公開批評鄧小平在本世紀末翻兩番的計劃，但是他也確實沒有表示認同。他再次強調未來 20 年的經濟建設應當分為兩個階段：前十年用較溫和的增長打基礎，後十年再謀求更快的增長。^[16-8]

經過修訂的「六五」計劃（1981年–1985年）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獲得通過，它反映著謹慎的計劃幹部的勝利。未來五年的年均增長目標被確定為**4%到5%**。同期的基本建設投資為**230**億美元，與第五個五年計劃相比幾乎沒有任何增長。投資的重點是能源和交通運輸，同時也將增加教育、科學、文化和衛生保健的支出。

此時，胡耀邦認為他能夠為現代化作貢獻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遍全國所有縣市，給地方幹部打氣。他聽取他們反映的問題，盡力消除發展經濟的障礙。根據他對農村的視察，胡耀邦確信各地有能力發展得更快。針對陳雲所主張的**80**年代增長要慢一些，以便為**90**年代更快的增長打好基礎，胡耀邦回應說，現任的領導人應當在**80**年代全力以赴，以免給**90**年代領導經濟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在陳雲和支持他的謹慎的計劃幹部看來——甚至包括趙紫陽在內——胡耀邦竭全力支持地方幹部的做法過於隨心所欲，而且他對遏制通貨膨脹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

胡耀邦在各地的視察使他和陳雲發生了衝突。雖然兩人在平反錯案上曾經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對陳雲仍很恭敬，但陳雲對胡耀邦的意見越來越大。在**1983**年**1**月**12**日一次討論年度計劃的會議上，鄧小平再次指出，**1981**年開始的「六五」計劃仍把年增長率定為**3%到4%**，可是實際增長率比這高了一倍多。

數據來源：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2.

鄧小平再次問，計劃和實際情況差別如此之大，這合適嗎？計劃幹部回答說「這樣不會壞事」。^[16-9]鄧小平於是採用他的典型風格：既要避免對抗，又要讓他的戰略佔上風。他並不公開批評陳雲和黨的決定，但也沒有限制地方幹部想方設法加快發展，不阻攔胡耀邦下去視察。面對他所不贊同的黨內共識，鄧小平的對策一貫是：「不爭論，大膽地闖」。

趙紫陽：構思改革

陳雲在**1980**年同意趙紫陽應當有個班子研究新時期的經濟問題，他承認此時已不同於他建立計劃體制的時期了（對趙紫陽的介紹，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趙紫陽剛來到北京時贊成陳雲的經濟調整政策，陳雲因而也支持趙紫陽讓企業經理有更多自主權和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在更一般的意義上，陳雲也很欣賞趙紫陽「講北京話」的努力，欣賞他願意放棄多年來形成的地方領導人的思維方式，轉而關注全國經濟大局。

趙紫陽希望避免政治鬥爭。雖然身為總理，他並不干涉陳雲和謹慎的計劃幹部領導計劃經濟的日常工作，而是和他的智囊團一起在常規的官僚體系之外，專注於如何引導相對封閉的經濟變得更加開放這一重大問題。當趙紫陽和他的智囊班子在北京工作了兩三年後，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對於經濟發展方向的新觀點，而鄧小平也開始轉向趙紫陽徵求意見。此時鄧小平已經對陳雲和謹慎的計劃幹部領導下的緩慢增長失去了耐心，他開始離陳雲而去，轉而借助於趙及其智囊團，讓他們提供基本經濟政策的指導。趙紫陽直接同日本顧問、世界銀行召集的各國經濟學家和經濟官員展開合作，為中國應當如何進行轉型構建思路。當時尚無任何社會主義國家成功地——並且沒有造成嚴重動盪地——從計劃經濟轉型為可持續的、開放的市場經濟。因此，當世界銀行官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經濟學家來到中國時，最重要的會談都是與趙紫陽進行的。趙紫陽雖然沒有接受過正規大學教育，但外國人對他的學識、求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觀念的能力以及分析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16-10]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1988**年訪問北京時，與趙紫陽的會面原本預期為半小時，但這次只有趙紫陽、佛利民和譯員在場的會談卻整整進行了兩個小時。佛利民在談到趙紫陽時說：「他對經濟形勢和市場如何運行都很有洞見。」佛利民把這次會見描述為「令人著迷」。^[16-11]

趙紫陽的智囊團之一是一個小型的（**30**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它在農村改革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它最初是由一群有見識的青年才俊組成的討論小組，他們在文革期間「下放」農村多年，對農村的情況有深入瞭解。**1981**年**11**月它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下屬的獨立機構。^[16-12]此後又併入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參與過制定包產到戶政策的工作，後來每年都為中央起草有關調整農村政策的**1**號文件。^[16-13]

趙的另一個智囊團是體制改革委員會，它是為研究根本性的體制改革而成立的。由於它就能就改革官僚部門建言獻策，一些官僚對它有可能提出的建議很敏感。它最初是中國科學院下屬的一個體制改革研究小組，**1980**年改為「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受趙直接領導；**1982**年**5**月更名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升格為部級單位。在趙紫陽

的領導下，它到 1984 年已有大約 100 名官員。^[16-14]忠誠且勤於鑽研的官員鮑彤，最初是由中組部派到趙紫陽手下任總理秘書，此時開始成為趙紫陽班子的主管。

在智囊團裏為趙紫陽工作的人，都十分尊重和欽佩趙紫陽。他們喜歡他毫不做作的隨和作風、不拘一格廣納賢言的開放態度，以及能把想法轉化為推動國家前進的實際政策的能力。

向國外學習

1978 年 6 月 23 日，鄧小平在聽過教育部派遣留學生計劃的彙報後說，要把出國留學生的人數增加到幾萬人。鄧認為，中國要想快速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學習和採用在國外已經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思想觀念。蘇聯人由於害怕「人才流失」，不太願意讓有才華的學者和學生出國。毛澤東則對西方緊閉國門。甚至蔣介石也曾擔心一些最聰明的年輕人會很快流向國外。然而鄧小平對於人才流失從來不擔心。正因為如此，在向發達國家學習現代化的秘訣這一點上，除了日本和南韓外，沒有任何發展中國家能夠在廣度和深度上與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相比。而由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它在學習外國的規模上很快就超過了日、韓兩國。

鄧小平派官員出國考察，邀請外國專家成立研究國外發展的機構，鼓勵翻譯外國文獻——所有這些舉措都規模宏大。日本和南韓的領導人擔心國內的公司會被外國公司的競爭壓垮，鄧小平則不同，他鼓勵外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現代化工廠，幫助培訓中國的管理者和工人。他充分利用那些能夠幫助中國瞭解國外發展的海外華人。最重要的是，他鼓勵年輕人走出國門到海外留學。從 1978 年到 2007 年的 30 年間，有超過 100 萬的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到 2007 年底，其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已經學成回國。^[16-15]為了學習外國經濟發展經驗，鄧小平同意由趙紫陽會見經濟學家；他本人更喜歡跟科學家，以及包玉剛、松下幸之助和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這樣的成功商業領袖交談，從他們那兒獲取如何使中國進步的想法。他還會見從事過國家經濟計劃工作的外國人，如日本的大來佐武郎和下河邊淳。從 1979 年初開始，中國的資深學者每隔幾天就出版一期報告，即《經濟研究參考資料》，概述對中國經濟有重要意義的國外發展狀況。而出國的代表團也會撰寫考察報告，上呈給國家領導人。

在中國研究國外的經濟發展經驗方面，沒有任何機構發揮的作用能與世界銀行相提並論，而世行在中國發揮的作用也超過了它所幫助的任何其他國家。^[16-16]1980 年中國大陸取代臺灣重新獲得在世行的中國席位後，世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訪華，為發展雙方的新關係鋪路。麥克納馬拉說過，沒有中國的世界銀行不是真正的世界銀行，他頂住了美國政府要求放緩中國加入世行的壓力。中國官員當時仍然擔心外國會為自身的目的利用中國，但是麥克納馬拉的獨立態度使他們相信，世界銀行並不代表任何單個國家的利益。

麥克納馬拉與鄧小平會面時，鄧對他說，中國未來與世行的關係中，觀念比錢更重要。鄧說，中國的現代化是必然的，但通過與世行合作中國能更快地發展。在討論世界銀行駐華首席代表的人選時，鄧說，他不在乎首席代表是哪國人，他只希望是一個最勝任的人。^[16-17]

鄧小平會見麥克納馬拉後，中國與世行的關係發展迅速。一個月後的 1980 年 5 月 15 日，中國通過世行的投票表決正式成為其成員國。世行的多數成員國是在 1945 年它成立之初就加入的，世行對他們的瞭解已經有多年的積累。但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而且取代臺灣之前又與世行沒有交往，因此世行在向中國提供貸款之前，必須首先對中國經濟建立起更好的瞭解。1980 年 10 月，世行作出了一個在其歷史上首創性的決定：它組織了一個由 30 位世界級專家組成的團隊，前往中國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考察。這些專家的研究特長包括中國經濟、農業、工程、衛生和教育等各個領域。中國也組織了一個與之相對應的專家隊伍和他們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後來擔任總理的朱鎔基。朱是自願加入中方團隊的，因為他將之視為學習的好機會。

鄧小平本人的支持使中方團隊的成員不必再擔心將來可能受到向外國人洩密的指控。為了增強雙方的信任，避免被中方猜忌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世行人員在中國期間沒有舉行任何未邀請中方參加的會議。中方團隊及其在北京的上級深知他們被委以打開國門的重任，他們熱切地希望弄清中國需要面對的獨特問題。世行團隊也清楚他們在中國對外開放中扮演的歷史性角色，同時意識到這是個瞭解中國的特殊機會，因此也努力與中方建立良好的長期合作關係。這個考察計劃是世行到那時為止承擔過的最大的針對單個國家的研究項目。世行當時還沒有像後來那樣變成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因而給予它的下屬團隊相當大的自主權去適應當地需要。麥克納馬拉訪華後不久，會講漢語的菲律賓華人林重庚被任命為世界銀行中國項目的首席經濟學家。他是哈佛經濟學博士，有在東南亞和非洲為世行工作的經歷；他也是 1980

年世行團隊在中國的實際領導者；1985 年世行在中國設立駐京辦事處後，他出任該辦事處的首任駐華首席代表，並一直任職到 1990 年。他把中國和世行在 1980 年代的特殊關係描述為「天造地設」。^[16-18]

在中國的三個月裏，世行團隊與負責經濟工作的中方官員進行會談，還到地方進行實地考察。儘管中方負責接待的是財政部，但他們有機會和所有主要經濟部門的官員會面，其中既有建設派，也有平衡派。國家計委和國家統計局官員在中方團隊中發揮著重要的領導作用。中方官員都沒有受過西方經濟學理論的訓練，但他們有管理計劃經濟發展的經驗。西方專家中很多人也都在發展中國家工作過，因此與其中國東道主一樣，更為關注具體制度環境下的實際情況，而不是學院派經濟學家所提供的理論性解釋。

世行團隊返回後，根據與中方所做的聯合研究撰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講述了 1949 年後的中國經濟歷史，介紹了中國的政策，並對中國經濟中適合或不適合作出政策改變的領域作了認真區分。在 1981 年 3 月完成這個三卷本的報告後，世行人員立刻與中方進行討論，並在 6 月提交世行董事會，為後者作出給中國第一筆貸款的決定提供參考。除了中國的專家外，趙紫陽和其他高官也讀過這份報告；後經中國政府批准，該報告得以公開發表。

當時首當其衝的大問題是，如何在維持中國經濟運行的同時，使它轉向更加開放、更少管制的體制。世行報告建議中國要更加注重利用價格，從價格入手促進更有效的投資決策，推進更靈活的對外貿易。它還建議讓國內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動，使勞動力的使用變得更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張價格變動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過急。這個團隊不主張全面迅速的市場自由化或私有化。對於中方人員來說，參與這項研究，使他們有機會瞭解具有全球發展經驗的經濟學專業人士的視野，並學習用新的眼光重新審視自身的體制。

中國成為世行成員後雙方談判達成的第一筆借款是對高等教育的援助。鄧小平一向重視培訓，因此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在貸款之外，世行還設立了專門計劃，幫助培訓即將處理各種經濟問題的中國專家。在這方面，中國與世行的經濟發展研究所合作，由後者每年舉辦人員培訓課程。世行還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繼而在福特基金會資助下，在天津大學設立了為期一年、專門培訓中國經濟學家的項目。從 1985 年到 1995 年，這項計劃培訓了將近 70 名經濟學家，其中大多數後來都身居要職，領導著中國的經濟發展。福特基金會還資助中國經濟學家在美國學習。作為對中國的進一步援助，世行還利用它與全球經濟學家無可比擬的關係網絡，應中國要求組織不同領域的專家進行會談。

1980 年代初，中國負責調整經濟體制的官員最初想從東歐國家尋求改革模式。他們首先關注的是南斯拉夫，1983 年又將興趣轉向匈牙利把不同部門的所有計劃都合為一體的「全面改革」。中國派出兩個代表團訪問匈牙利，研究它的改革規劃，匈牙利也派了一批人到中國介紹他們的改革經驗。熟悉匈牙利問題的人認為，中國應當使用更多的經濟手段取代行政手段，進一步向地方放權，並允許更加多樣化的所有制形式。匈牙利和日本一樣，也採用了以確定產出指標為主的「指導性計劃」，逐步擺脫了從前的指令性計劃——即提前為各產業部門精確規定具體的生產投入。^[16-19]然而，在探討東歐經驗的同時，一些中國官員也開始懷疑，東歐模式是否能夠解決中國面臨的複雜問題。

1982 年 8 月應中方請求，世界銀行將東歐和其他國家既有理論眼光又有實踐經驗的著名專家召集到浙江省的莫干山，探討社會主義體制改革的整體問題。中方人員以薛暮橋為首。來自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東歐知名經濟學家——包括弗拉吉爾茲·布魯斯（Włodzimierz Brus）——分別介紹了他們的觀點。會上進行的討論和會後組織的外國顧問對中國各地的考察，大大加深了人們對東歐改革模式是否適用於中國的疑慮。東歐專家此前的結論是，如果只進行局部改革，會造成對下一步改革的抵制，因此必須一次性地進行全面改革。可是，中國的農村改革已經呈現出似乎不可逆轉的積極成果，因此沒有必要急於進行一攬子的全面改革。會後東歐的學者們去中國各地考察，開始同意中國東道主的觀點，即一次性大膽進行改革的東歐模式在中國行不通，因為中國太大，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中國唯一切實可行的道路是逐步開放市場和放開價格，然後再進行漸進式的調整。與會者的觀點先彙報給趙紫陽並獲得了他的認同，然後再上報給鄧小平，鄧也支持趙紫陽關於漸進改革、而不是一攬子改革的意見。

1983 年，取代麥克納馬拉於 1981 年擔任世界銀行行長的克勞森（A. W. Clausen）訪問北京。鄧小平對他說，他認為世行 1981 年的報告很有意思，也很有用。隨後鄧請世行幫助評估中國到 2000 年生產總值翻兩番的可行性。速度問題似乎一直是鄧小平的中心問題。他希望經濟盡可能快地增長，又要避免大躍進的危險；他擔心中國的幹部像過去那樣盲目樂觀，所以要聽聽外人的意見。他希望世行再次承擔一項研究，根據全球經驗對中國未來 20 年實現這一目標考慮不同方案。應鄧小平請求，1984 年世行再度派出人員齊備的代表團前往中國，仍由林重庚帶隊。依據中方合作者、世行人員及相關顧問的研究，世行於 1985 年發佈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對制定「七五」計劃（1986 年–1990 年）起了重要作用。^[16-20]它的結論是，20 年內翻兩番的目標是可行的。這無疑讓鄧小平感到放心。報告認為，中國通過重點

抓工業生產，或者通過促進包括服務業在內的各部門平衡發展，都有望實現這一目標。中國選擇了以工業作為重點的道路。

1984 年召開了又一次由中青年經濟學家參加的莫干山會議，討論價格改革等問題，但這次會議世行人員沒有參加。^[16-21]會議的結論是支持價格雙軌制，即一軌價格適用於國家計劃內產品，另一軌價格則要適應市場的變化。完成定額的國營企業可以將超額部分以市場定價出售。這樣一來，很多企業會轉而以市場為導向從事生產，而在向市場轉型的過渡期又可以依靠計劃內價格獲得一定的穩定性。有些世行官員批評價格雙軌制，因為這會給國營企業的幹部製造迅速牟利的機會，他們可以用計劃價格購買商品，再以高價在市場上出售。但中國高層官員認為，他們有把握用行政處罰手段控制住腐敗。

1985 年，在鄧小平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後，中國官員再次請世界銀行召集專家，為中國從管制經濟轉型為由市場發揮更大作用的經濟提供指導。中外專家在一條名為「巴山輪」的船上開了一個星期的會。在這條從重慶沿長江順流而下、經三峽抵達武漢的輪船上，他們進行了正式和私下的緊張討論。世行召集的西方人中，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他介紹了運用宏觀經濟手段、尤其是通過調節需求控制市場的可能性。弗拉吉爾茲·布魯斯和首次訪問中國的雅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則介紹了東歐在調整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會議結束時，早已對東歐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持懷疑態度的中方與會者進一步確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結構問題——如允許業績不佳和重複生產的企業繼續生存的「軟預算約束」——是計劃體制內在的普遍性的問題。這標誌著中國結束了對採用東歐改革模式的探討，轉而以更強的意願接納市場的作用。

會議之前中方尚未充分理解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採用其他貨幣和財政手段來調節市場，以避免中國人一向認為的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大起大落。托賓的發言使他們相信，可以運用宏觀經濟手段調控市場體系。會後，中國經濟學家在引入宏觀調控手段的同時，對繼續擴大市場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

由於會議之前通貨膨脹已很嚴重，中國很快採用了從這次會議中得到的主要教益：即運用宏觀調控馴服通貨膨脹。趙紫陽總理看過會議報告後接受了這一結論，經鄧小平認可後便開始著手實施。

1980 年代初期，中國領導人在探討東歐經驗和利用世界銀行顧問的同時，也在研究日本經驗。儘管日本是世行成員國，它與中國主要以雙邊的方式進行合作，而合作規模則超過中國與任何其他國家。中國對臺灣和南韓的現代化經驗也有興趣，但中國大陸直到 1980 年代後期才與之有直接交往，因此臺灣和南韓在 1980 年代初的經驗對當時的中國沒有起到太大作用。

鄧小平 1978 年 10 月訪日之後，大來佐武郎於 1979 年 1 月到訪北京。作為一位經濟規劃官員，他在幫助亞洲國家經濟發展方面極富經驗。他此行要與谷牧探討成立日本顧問團的計劃，還要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探討日本在中國發展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大來佐武郎出生於遼寧省大連市，工程學出身，曾在日本經濟安定本部扮演過核心角色。這個部門曾經為日本經濟在二戰後脫離戰時經濟管制和對抗嚴重短缺提供指導。1955 年後安定本部併入日本經濟企劃廳，後者負責為日本經濟提供指導性計劃。大來佐武郎與谷牧商定，在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經濟轉型過程中，他將率一批有經驗的日本官員同以馬洪為首的中方官員每年舉行一次會談。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首相訪華時，當時已擔任外相的大來佐武郎陪同來訪。鄧小平對大來開玩笑說，你當了外相，還能繼續給中國當顧問嗎？確實，大來任外相期間，這些會談一度短暫地中止，但在他卸任後很快於 1980 年 7 月恢復。日本國土廳前任長官下河邊淳也是大來佐武郎的日本顧問團成員，他向中國介紹了日本政府如何通過建立制度及保障必需的資源，推動各地區均衡持續地發展。^[16-22]這個顧問團與中國經濟官員的會議一直持續到 1992 年。

1979 年初，中國效法日本成立了兩個機構：質量管制協會和企業管理協會。這兩個協會在北京為地方幹部開辦培訓班，再由這些幹部為各自地區的工廠經理培訓工業管理、傳授他們從日本人那裏學到的觀念。^[16-23]儘管這些培訓計劃的作用難以具體評估，但是對中國那些習慣於辦事慢吞吞的工廠經理和工人來說，這些榜樣的存在，加之官員的大力鼓動，確實促成了生產效率和質量控制的改善。

1980 年代，日本為中國提供的援助和在中國開設的工廠多於其他任何國家。日本的在華工廠為中國樹立了尺規，用以衡量中國在實現高效工業生產上取得的進展。中國在學習現代科技上主要盯的是美國，但中國工廠引進的新生產線中來自於日本的數量最多。池田勇人首相在 1960 年代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成了鄧小平要求工農業產值在 20 年內翻兩番的動力。自 1974 年以來，鄧小平會見的日本代表團也多於其他任何國家。

中國經濟官員在訪日期間看到，消費需求成為日本工廠的生產動力，從而減少了國家作為工業產品分配者的功能，這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結果是，生產消費品的中國工廠也得到指示，要求他們直接徵求當地商業網點的意見，瞭解消費者願意購買什麼產品。^[16-24]

尤其令中國官員印象深刻的是日本通產省的一項重要職能：它分析如何才能使不同產業的日本企業獲取在國際市場競爭中所需的資源和技術，然後讓企業發揮其自身的主動性來開發創新產品，以此推動整個國家的快速發展。鄧小平訪日期間，不但對日本企業內部的高度計劃性感到驚訝，更讓他吃驚的是這些計劃手段遠比中國更靈活、更能對市場變化作出反應。例如，通產省一方面會為大公司提供鼓勵和支持，但同時也會讓他們為爭奪市場份額而相互展開激烈的競爭。

中國在 1980 年至 1981 年施行的經濟調整政策，導致很多與日本簽訂的合同被取消、使日本公司與中方的合作被放緩（見第 15 章）。但 1982 年最困難的調整步驟完成後，中日關係又得以復甦。1982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趙紫陽訪問日本，除了尋求進一步投資和技術諮詢外，也是為了恢復日本人對中國經濟的興趣。^[16-25]日本通產省下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在中國設有若干個辦事處，它們研究中國經濟，輔助日本公司在中國當地發現蘊涵商機的領域，也為中國各個工業部門的經理和技術人員提供培訓。

到 1980 年代中期，國外機器的引進已經帶來了巨大變化。所謂「手工業式的重工業」，即工人光著膀子向煉鋼爐填煤、用大鐵錘把金屬鍛造成型的景象，被寶山鋼鐵廠裏具有連鑄設備和電子控制系統的現代氧氣轉爐所取代。現代生產線取代了用機床逐個加工機器零件的工人，工業產出大幅增長。合資企業中與外國同行一起工作的中層管理人員學會了使用現代電子設備、運用最新的現代管理技術，也為增長的大潮作出了貢獻。其中一些管理人員運用他們在外企學到的技能創辦自己的企業。1980 年代計算機在西方採用後，在中國企業中也迅速得到普及。

由日本、歐洲、香港和臺灣公司（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引入中國的新機器和新體制對其經濟增長所產生的累積作用，至少與北京領導層進行體制改革的影響同樣巨大。中國新的開放政策實際上是從國外引進了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和消費革命。

鄧小平的經濟攻勢：1984

當經濟運行良好時，鄧小平更易於獲得加快改革開放所需要的政治支持。當經濟出現通貨膨脹之類的問題時，陳雲和謹慎的平衡派則會獲得更大的勢力，使他們得以收緊計劃的韁繩，對抗通貨膨脹壓力。1982 年和 1983 年經濟增長開始加快，通貨膨脹也得到了控制，氣氛轉而變得對鄧小平有利。不但糧食增產，而且紡織這一消費工業的重要部門也有了可觀的增長，導致布匹配給制的結束。依據官方數字，農民的人均收入從 1978 年的 134 元增加到了 1984 年的 355 元。^[16-26]

在 1983 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高調提出要將投資比重提高到陳雲和國家計委所建議的水平之上。^[16-27]1983 年 12 月，已對謹慎的計劃派感到不耐煩的鄧小平說，對可能發生的事情進行科學預測是不可能的，如果只講穩定就很難取得進步，沒有一點闖勁，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翻兩番。^[16-28]

在這種有利的氣氛下，鄧小平準備擴大開放其他沿海地區。1984 年 1 月他去廣東和福建視察時宣佈，經濟特區的政策已經證明是成功的（見第 14 章）。電視鏡頭把深圳取得的令人矚目的建設成就傳播到全中國，為民眾接受同年底其他沿海地區的開放打下了基礎。

1984 年 5 月，國務院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這個授予國營企業更多自主權的方案基本上是由趙紫陽的智囊團成員擬定的。文件提出要運用包括價格和稅收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管理經濟活動。長期以來支持給予企業更大靈活性的趙紫陽，也進一步擴大了企業在完成政府定額後參與市場的自由。

鄧小平在 1984 年 6 月開始使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說。這個寬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鄧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擴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識形態框架，使國家能夠採取行之有效的政策。鄧小平利用這個概念來推動其擴大市場、在工商科教領域進行全面改革的目標。^[16-29]在 1984 年 9 月 3 日至 10 日的莫干山會議之後，採用價格雙軌制的國營企業，獲准擴大了對市場價格的使用。這使國企經理把更多精力放在能為企業帶來更多利潤的市場上，由此他們在計劃體制仍為經濟提供穩定產出的同時，也學會了市場經濟。^[16-30]在改革派（reformer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之間持續不斷的角力中，主張擴大市場作用的改革派取得了進展。

在 1984 年國慶日，鄧小平獲得的民眾支持達到了整個鄧時代的最高峰。在那一年的國慶遊行中，北京大學的學生遊行隊伍打出了一條寫有「小平您好」的橫幅。這是一種發自民間內心的友好問候，而街道兩旁的群眾也自發加入到「小平您好」的行列中。這句話和這個場景，和 17 年前紅衛兵遵照上面的指示高喊「毛主席萬歲」表達崇敬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1984 年的這些學生自發地表達了全國人民的感情，他們感謝鄧小平結束文革動亂，克服糧食短缺，改善了他們的生活，終於帶領國家走上正軌。而且就在一周之前，鄧小平簽署了香港和平回歸中國的協定。

國慶日十幾天之後，鄧小平充分利用這種高漲的民意，促使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批准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當時對經濟改革最全面的闡述。它既包括宏觀理論分析，也概述了為全面擴大市場鋪路的措施。「決定」採納了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說法，宣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不在於搞不搞計劃經濟，而在於是否實行公有制。社會主義的目標不是平均主義，而是共同富裕。領導起草這份文件的趙紫陽達到了鄧小平要求的目標：明確解釋為何社會主義能夠接納市場改革。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宣佈，將逐步減少政府定價，進一步發揮市場定價功能。^[16-31]這個文件大大鼓舞了那些希望得到更大靈活性的各部委幹部。鄧小平在全會上講話支持這一文件時指出，準備文件和斟酌用詞上的大量艱苦工作都是別人做的，但他同意文件的全部內容。鄧小平說，文件最重要的內容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重申了實行開放的基本論點：中國歷史表明，只有國家開放，才能取得重大進步（這個主題成為 1988 年 6 月的一部電視系列片《河殤》的主題，它引發爭議並造成了超乎尋常的影響）。^[16-32]鄧小平承認，開放難免會帶來一些問題，但他表示有信心解決這些問題。^[16-33]

陳雲在三中全會上沒有公開批評《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但是由於鄧小平開始大力推動加快增長和市場改革，兩人之間的關係變得越發緊張。在 1984 年的幾次會議上，陳雲對一系列數據都表示反對：1984 年基建投資大幅增加 33%，國民生產總值增長 15%，零售價格指數則上漲 9%——這是自改革以來最高的數字。^[16-34]確實，通貨膨脹已經令民眾極為憂慮。^[16-35]

市場的擴大也要求政府對稅收體制進行調整。1984 年 10 月，在經過試驗後，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新稅制，用繳稅的方式取代了原來的利潤上繳（「利改稅」）。在原來的制度下，政府為企業安排全部生產指標和稅收，缺少促使企業提高效率的任何經濟刺激。而新的制度下，每個企業完全自負盈虧；企業完稅後管理者可以留下稅後利潤，這就刺激了各地企業提高效率。而且，無論私營企業、國營企業還是合資企業都可以採用這個新的制度。不過，因為新制度運行之初工廠管理者缺乏經驗，中央財政收入在最初的七年裏並沒有增加。^[16-36]

1984 年底公佈的數據讓陳雲深感擔憂。1985 年 2 月 18 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值鄧小平南下廣州，陳雲批評了嚴重的預算赤字、超額使用外匯儲備和嚴格控制開支的失敗。他作出結論說，計劃優先於市場的政策並沒有過時。^[16-37]陳雲利用年底的數據，想把大膽向前闖的鄧小平拉回來。各省領導人被召集起來開了一系列緊急會議，結果是大規模削減基建、銀行信貸緊縮、嚴控漲工資和外匯使用。^[16-38]按照中國標準而言的嚴重通脹，甚至使趙紫陽也轉向了加強控制和限制投資。面對這種大氣候，鄧小平最後也加入了努力給過熱的經濟降溫的行列中去。^[16-39]

就像 1980 年代初期一樣，陳雲再次利用他的中紀委書記一職，限制廣東和福建的改革試驗。他和他的支持者公開了與走私、倒賣外匯、投機倒把和色情有關的案件。陳雲也很清楚，北京的各部委都在向經濟特區進行非法投資，這使執行黨的紀律變得更加困難。^[16-40]

作為限制經濟過熱的努力之一，胡喬木去了福建，批評該省幹部讓 19 世紀不平等條約下的通商口岸死灰復燃。姚依林去深圳時說，用國家的錢給深圳「輸血」已經太多，現在是「拔掉針頭」的時候了。^[16-41]此外，1985 年夏天中紀委通報了海南幹部為促進當地發展濫用特權，將進口汽車賣給內地牟取暴利的走私案。^[16-42]谷牧宣佈，國家只會優先發展 14 個沿海開發區中的 4 個——上海周邊、天津、大連和廣州。^[16-43]在對特區不斷升溫的批評氣氛中，甚至鄧小平也不得不改為守勢。他對自己 1984 年初提出的經濟特區政策加以限定說，如果特區被證明並不成功，那就只當是一次試驗好了。^[16-44]

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5 日為制定「七五」計劃（1986–1990）的基本政策而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陳雲宣佈經濟增長目標應當定為不超過 6% 或 7%（大約是 1984 或 1985 年增長率的一半），儘管實際增長率可能要高一些。他又說，應當限制鄉鎮企業奪走國營企業所需要的資源，他還警告說，如果不加以限制，將會造成能源的嚴重短缺和交通運輸的瓶頸。^[16-45]

這種新氣氛中鄧小平採取了守勢。為了鞏固自己的陣地，他提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加強「教育」，讓幹部更好地抵抗抗腐敗和違法亂紀。鄧小平說，他完全支持把「七五」期間的增長率定為**7%**，這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其實他對這個數字沒什麼不滿，因為他心裏清楚，由於過去兩年的高增長率，只要一直保持**7%**的年增長，還是可以輕鬆實現讓國民生產總值到**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16-46]但是批評鄧的人仍然認為，如果鄧在**1984**年不那麼急躁，情況可能會更好；也許可以避免伴隨著中國經濟過熱而產生的通脹和腐敗問題。

通貨膨脹的恐慌與反擊：1988

正如陳雲在**1980**年至**1981**年的經濟調整政策為鄧小平加快發展和改革鋪平了道路那樣，陳雲在**1985**年至**1986**年的緊縮政策再次為鄧小平繼續向前闖提供了條件。**1987**年**2**月，在為即將於秋天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制定指導路線時，鄧小平直接跟陳雲的主張唱起了反調：「（過去）講以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16-47]在**1987**年同一些外國領導人會談時，鄧也表示要在自己退休前留下一個更加開放的市場。

經鄧小平同意後，趙紫陽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講話中使用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說法。這又是一個巧妙的概念，使鄧小平和趙紫陽可以對保守派說，他們堅持社會主義，沒有放棄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目標。但他們補充說，高級階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後。「不再以計劃為主」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些新提法為繼續向市場經濟前進提供了框架。趙紫陽宣佈，「商品交換」要遵循「價值規律」，價格由價值決定；商品供應不足，價格就會更高。趙的講話還明確允許私營企業僱用七人以上。趙紫陽又說，將來股東可以分紅。陳雲在趙紫陽講話的過程中離開了會場。改革派認為他的離去是為了避免公開衝突，也是在表明他對趙紫陽的講話有看法。^[16-48]

1988年初，鄧小平決定要大膽推進改革，取消對更多商品的價格管制。正如他在**5**月中對北韓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吳振宇所說，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經有了改善，能夠承受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16-49]在鄧小平的強大壓力下，**5**月底召開的政治局會議（**5**月**30**日至**6**月**1**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價和工資的計劃。鄧小平多年來一直在瞭解物價改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場價格是建立市場經濟的關鍵。他對同事說，「長痛不如短痛」。長期以來不斷有人告訴他，即使物價上漲也只會是暫時的，市場的力量可以讓更多的供應者進入市場，價格自然會回落。

鄧小平此舉的另一個考慮是有增無減的腐敗，而價格雙軌制正是腐敗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雙軌制使一些幹部能夠以國家規定的低價獲得物資，再按市場上的高價轉手賣出。因此，結束國家計劃價格將可以消除腐敗的這個根源。^[16-50]於是鄧小平像一位無畏的戰士一樣決定義無反顧地取消物價管制，宣佈要在三到五年內完成物價改革。**7**月份煙酒價格放開，導致價格猛漲了**200%**以上。^[16-51]但這並沒有擋住鄧小平闖關。

鄧小平的經濟顧問警告說，進行物價改革的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脹壓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經供不應求。^[16-52]在放開物價之前必須在供應上有所準備，以防物價暴漲。鄧小平沒有被這個警告嚇住。在北戴河的一次政治局會議（**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上，對是否取消物價管制進行了激烈辯論。鄧小平最終佔了上風，政治局同意了他的全面放開物價的計劃。這次會議剛結束，《人民日報》就在**8**月**19**日公佈了這一決定。社論一發表，已經疲於應付通貨膨脹的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慌恐。人們紛紛取出銀行存款瘋狂購物，以防未來價格上漲。商店的東西一售而空，群眾也開始上街示威。

鄧小平深知改變黨的決策會削弱黨的權威，因而他自擔任頭號領導人以來一直堅決反對公開宣佈任何決策變化。可是這一次他別無選擇。民眾的情緒太強烈了，鄧小平只好接受國務院**8**月**30**日作出的放棄取消物價管制計劃的決定。這一次政策上的出爾反爾，是鄧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來，在改革舉措上最富戲劇性的倒退。

鄧小平宣佈進行全面物價改革計劃這一決定，後來被證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價最高昂的錯誤。他對於從長期來看此項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計是正確的——既然要向市場經濟轉變，就必須在某個時候放開物價。後來朱鎔基選擇在**1990**年代放開了物價，當時通貨膨脹壓力不大，民眾也已適應了物價的溫和上漲，因此更易於接受物價改革。朱鎔基設法避免了硬著陸，他的政策被認為是極大的成功。

鄧小平的錯誤出在對民眾情緒的短期評估上。他錯誤地以為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民眾接受放開物價。**83**歲的他已經遠離了群眾，觸及不到普通中國人的感受。鄧的家人在使他瞭解百姓感情方面起著一定作用，但他們的交往對象大多是其他高幹家庭，通貨膨脹的壓力對他們要比對普通受薪階層的影響小得多。

鄧小平的錯誤不但使他失去了民眾支持，也導致他在黨內高層的權威受損。他的闖勁和使人服從的能力大為下降。但是作為軍人的鄧小平多年練就的本領是：他知道如何重整旗鼓。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把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姚依林、萬里、薄一波和喬石——改革者和謹慎的計劃者兼而有之——叫到家中商量物價改革問題。他承認：「現在的局面看起來好像很亂，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需要進行調整，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貨膨脹、價格上漲，無論如何不能損害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要保持適當的發展速度。」^[16-53]鄧小平雖然只能選擇在放開物價管制上作出讓步，但是他清楚地表態，他對整個改革方案仍然深信不疑。

民眾對放開物價的反應也削弱了趙紫陽的地位。雖然這一次趙並不贊成取消物價管制，但他曾有過放開物價的先例，也曾允許通貨膨脹的壓力超出陳雲認為明智的程度。通過研究其他國家的經驗，他認為一定的通貨膨脹有助於加快經濟增長。然而，當時中國通貨膨脹的速度已經大大高於1949年以後的任何時期。1988年官方的零售價格指數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了26%。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其他數據顯示的通貨膨脹率甚至更高。^[16-54]

謹慎的計劃派完全不同意趙紫陽在1987年和1988年初所作的允許通貨膨脹加速的決定。在1988年9月26日至30日召開的十三屆三中全會上，趙紫陽因為年初導致通脹失控的政策而受到了批評。他同意為自己的錯誤負責，承認年初時用來指導決策的一些假設是錯誤的，而通貨膨脹問題沒有解決是因為經濟過熱和需求總量過大。^[16-55]有人認為應當撤銷他的總書記職務。趙設法保住了總書記的位子，但陳雲給了他一些有關經濟政策的訓導。1988年10月8日陳雲尖銳地批評趙紫陽說：絕對不能搞財政赤字，貨幣流通量已經太大；此外，應當一直保持經濟的均衡發展，不然就會引起混亂。^[16-56]這些警告聽上去十分嚴厲，但與1983年陳雲批評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開的大會上作出的。此後經濟決策權轉交給了李鵬，他在1987年11月被任命為代總理，1988年3月成為總理。趙紫陽是個主張搞市場化的堅定的改革派，李鵬卻要貫徹陳雲的緊縮政策，不消說，兩人的關係不會順暢。

趙紫陽雖然承認了錯誤，但他還沒有作好徹底丟卒保帥（鄧小平）的準備。他沒有明確公開地宣佈放開物價的決定是由他作出的。據知情的中共官員說，儘管鄧小平此後繼續支持趙紫陽擔任總書記，但兩人的關係有所緊張，因為高層官員和群眾都認為鄧小平要對物價失控負責。

在8月份的民眾恐慌及鄧和趙的權力被削弱後，謹慎的計劃派很快重新掌握了對經濟政策的控制權。國務院於1988年9月24日頒佈文件，宣佈今後兩年的工作重點是「改善經濟環境」。熟悉陳雲在1979至1981年的經濟調整政策的人，都不會對1988年謹慎的平衡派掌權後採取的經濟政策感到奇怪。1988年不再進行任何價格調整，企業和工作單位被告知不得漲價。一直以遠低於通貨膨脹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國人民銀行作出保證，在必要時將存款利率與通脹掛鉤。各地被要求縮小基建規模。^[16-57]投資受到壓縮，物價也被嚴加管制。銀行信貸受到嚴格控制，暫停向鄉鎮企業貸款。朱鎔基1990年代控制通貨膨脹時力求實現軟著陸，但陳雲在1988年底終止通貨膨脹的膽略，卻並不亞於鄧小平取消物價管制的氣魄。不出所料，1988年底出現了硬著陸。這從隨後幾年的增長率驟降中即可看出。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轉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9.

1988年至1990年期間在經濟管制和政治決策的雙重作用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從1988年的11%驟降至1989年的4%，工業增長率從15%下跌到5%。1990年最後一個季度零售價格指數的增幅降至0.6%。^[16-58]消費支出停滯不前，失業人數上升，很多城市出現了騷動跡象。計劃派仍然致力於減少財政赤字，然而由於稅基太窄，預算赤字實際上不降反升。但是，儘管有這些令人不安的經濟指標，在因放開物價而引起強烈反對之後的三年裏，鄧小平一直未能在黨內爭取到足夠支持，向陳雲的緊縮政策發起挑戰。

中蘇改革的比較

社會主義計劃體制最先是由蘇聯採用的，之後又進入中國，旨在幫助後發展國家追趕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地區。它使中國能夠積累資本，並將資源用於最優先的領域。就像早期蘇聯的情況一樣，這種計劃體制使中國得以在1950年代推動重工業的發展。但是到1970年代時，中蘇兩國的經濟都遠遠落後於更開放、更具競爭力的體制。然而，當1991

年蘇聯和東歐的共產制度崩潰時，中國卻能自豪地宣稱，它在 1978 年以後取得了平均 10% 的年增長率。是什麼因素使中國在 1980 年代的表現遠優於蘇聯和東歐？

中國與蘇聯相比具備很多優勢。它有漫長的海岸線，可以利用比陸路運輸更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運輸。過去 200 年來，移居香港、臺灣、東南亞和西方的華人及其後代有 2,000 萬之眾，他們可以作為資本和知識的來源為中國所用。此外，中國大陸潛在的巨大市場吸引著世界各地的眾多商人，他們願意為中國的發展提供幫助，以便今後能夠進入這個有十億消費者的市場。政治動機也發揮了部分作用：中國在 1978 年實行開放政策後，很多西方國家想使中國進一步疏遠蘇聯，願意向中國慷慨提供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國的學生和遊客。

地理和種族的同質性也對中國的成功起著重要作用。由於稻田耕作的性質，中國包產到戶的政策使農民種地的熱情空前高漲，農業產出大幅提升，這在擁有廣闊的旱地、更宜於採用大型拖拉機耕作的蘇聯是不可實現的。與各種少數民族超過人口一半的蘇聯相比，人口中 93% 為漢人的中國也更容易達成國家的團結。蘇聯由於在過去 100 年裏不斷擴展到廣闊的新區域，新納入的少數民族一直在積極或消極地抵抗著蘇聯的統治。與此相比，中國對它目前的大部分疆域都已經統治長達 2,000 多年，它也沒有通過佔領反抗其統治的國家來進行過度擴張。

中國的統治者從國家的悠久歷史中形成了中國乃是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蘇聯的領導人長久以來一直覺得蘇聯大大落後於西歐各國。再者，中國與其鄰居——日本、南韓、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徵，而後者不久前已成功轉型為富裕的現代國家和地區，可以作為中國效仿的榜樣。

然而，不論中國有哪些內在的固有優勢，鄧小平在關鍵性問題上作出了與蘇聯領導人截然不同的選擇，而鄧的選擇在刺激經濟增長方面被證明要成功得多。^[16-59] 首先，他堅持共產黨的權威。蘇聯的戈巴卓夫希望通過廢除蘇共的壟斷權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體系，而鄧小平有一個從未動搖過的信念：當初按蘇共模式建立的中國共產黨，應當保持作為中國唯一統治者的地位。在他看來，只有中共能夠提供在中國進行穩定統治所需要的忠誠、紀律和信念。鄧小平相信，中國需要單一的執政黨領導國家，他的這一信念與 20 世紀中國的另外三位主要領導人——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一脈相承。

但是鄧小平也務實地面對需要作出的改變。他知道他在 1978 年所繼承的中共臃腫而僵化，無法提供現代化所需要的領導力。他確信黨的很多資深幹部，尤其是在文革的政治鬥爭中發跡的人，是不足以領導現代化的無能之輩。他沒有把他們大批清除出黨，因為這樣做會帶來破壞，導致黨的分裂，使黨不能專心處理國家面臨的真正問題。但是他確實悄悄地把他們趕下了最重要的崗位，將位置留給那些有能力領導現代化的人。鄧在為高層領導崗位選拔人才上十分用心，而且鼓勵下級幹部也這樣做。這些領導班子選定之後，就會給予他們相當大的空間使其進取。

鄧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進，不搞「大爆炸」（big bang，亦稱「休克療法」）式的一步到位。俄羅斯在 1991 年後聽從了某些經濟學家的建議，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開放市場。與之相反，鄧小平根據世行推薦的專家建議，接受了突然開放市場將導致混亂的觀點。很多把制度視為理所當然的西方經濟學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卻深諳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國性的制度，並為之配備能夠適應當地文化與環境的體制、規章、法律和訓練有素的人員，這是一項費時而又至關重要的工作。中國缺少必要的經驗、規章、精明的企業家或私人資本，不可能突然轉向市場經濟。鄧小平知道，19 世紀的日本和後來的其他東亞經濟體，都花了幾十年時間來建立使其可以追趕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現有的國營企業，必然引起大範圍的失業，這從政治和社會角度都是難以承受的。因此他讓陳雲等人維持舊體制的運轉，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基礎，同時允許市場逐步發育，使人們獲取經驗，讓制度適應更加開放的經濟。鄧小平沒有強制推行新的體制——包產到戶、鄉鎮企業或私營企業，而是讓地方開展這類試驗，然後宣傳成功的經驗，讓其他地方按自身條件加以採用。

鄧小平全部改革戰略的支撐點，是他堅定地相信中國必須從觀念到貿易都向外部世界全面開放。蘇聯領導人對於允許外國商人和企業在蘇聯開工廠十分謹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蘇聯學生去海外留學。鄧小平知道，外國人和歸國留學生帶來的變化有可能使中國面對艱巨的調整問題，但是他堅信，一個國家只有保持開放才能最好地發展。他的一些同事擔心外國人和各種外國做法會把中國搞得暈頭轉向，但鄧相信中共足夠強大，能夠對事態加以控制。鄧大力支持派遣官員和學生出國，翻譯國外的書籍和文獻，歡迎外國顧問和商人來華。有人害怕外國人的競爭會危及中國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他對此類批評也有充分的準備。他認為外國公司的競爭非但搞不垮中國經濟，反而能使中國人的生意越做越強。他也不擔心出國的人會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國外，因為他相信他們會繼續幫助自己的祖國。

中國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巨變式的對外開放過程，並不是由鄧小平啟動的。事實上，毛澤東在 1969 年的中蘇衝突後率先打開了國門，周恩來和華國鋒又延續了毛所開創的路線。然而，鄧小平的獨到之處在於，他使國門大開，接納外國的觀念、技術和資本，其程度大大超過了他的前任。無論經歷了何種挫折，他一直掌控著這個擴大開放的艱難過程。他把自己對中國潛力的深刻信念傳播給國人，並運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險阻，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新時期。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人願意放下架子，承認自身的落後，不斷向外國學習他們所能學到的一切。

[16-1]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2]這次會議記錄在案的召開日期是 8 月 26 日。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2007），下冊，頁 537–538。

[16-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0 年 7 月 17 日–20 日，頁 656–657；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頁 537–538。

[16-4]Yizi Chen, “The Decision Process behind the 1986–1989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ol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138.

[16-5]朱佳木、遲愛萍、趙士剛：《陳雲》（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 186。

[16-6]鄧力群：《向陳雲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廣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頁 93。

[16-7]《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七冊本）（北京：無出版社，2000），第 7 冊，頁 204–205。

[16-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82 年 11 月 4 日，頁 309。

[16-9]《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 7 冊，頁 247。

[16-10]對林重庚 2008 年 8 月、Ross Garnaut 2011 年 6 月、劉遵義（Laurence Lau）2007 年 3 月的採訪。世界銀行的林重庚與趙紫陽的交往超過任何外國人，Ross Garnaut 在 1985 至 1988 年任澳大利亞駐華大使，是曾與霍克（Robert Hawke）總理一起推動澳洲經濟自由化的專業經濟學家。劉遵義是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後來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16-11]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543.

[16-12]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pp. 34–41.

[16-13]對這些智囊團的討論見同上。作者也曾採訪過杜潤生（2006 年 9 月）、盧邁（2006 年 8 月）、姚監復（2006 年 8 月）和鄧英淘（2003 年 10 月）。

[16-1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1978.12–2002.5）》（修訂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1982 年 3 月 18 日。

[16-15]孟禎：〈出國留學 30 年〉，《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 年 6 月 26 日，第 6 版。

[16-16]鄧小平也支持中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加強中國與國際金融界的聯繫。1981 年 10 月 25 日，鄧小平會見了國際貨幣組織總裁 Jacques de Larosière，表示贊成雙方開展合作，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 年 10 月 25 日，頁 780。

[16-17]Edwin Lim, “Learning and Working with the Giants,” in Indermit S. Gill and Tood Pugatch, *At the Frontlines of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from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5), pp. 89–119；林重庚：〈序言：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對外思想開放〉，收入吳敬璉編：《中國經濟 50 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Pieter Bottelier, “China and the World Bank: How the Partnership Was Built,” working paper 277, 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pril 2006；Robert McNamara, Oral History Recording,

October 3, 1991, pp. 16–18. 當中與林重庚有關的部分，來自 2009 年 8 月對林重庚的訪談。關於中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貿總協定以及世界銀行的談判的大背景，見 Harold K. 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0).

[16-18]這個團隊的官方領導人是 Shahid Husain，他是世界銀行東亞區業務副主任，但中國的工作，包括在中國的團隊，都由林重庚領導。見 Jacobson and Oksenber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 the World Bank, and GATT*.

[16-19]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0.

[16-20]Edwin Lim et al.,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The Report of a Mission Sent to China by the World Bank* (Baltimore: Published for the World Bank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這個報告包含教育、農業、能源、交通運輸、經濟項目和經濟結構幾個分冊。

[16-2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37. 這次莫干山會議召開於 1984 年 9 月 3–10 日。

[16-22]Saburo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Canberra: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er,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3), pp. 112–123. 1991 年 8 月作者與下河邊淳的交談。

[16-23]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 125–126。1987 年至 1988 年我參觀中國工廠時，見到工廠裏貼有很多佈告牌，有關基本管理原則，以及根據員工遵從日本範例的表現而進行等級評定。

[16-2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 125–126、156。

[16-25]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p. 138; Okita, *Saburo Okita: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

[16-26]董輔初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下冊，頁 152–153。

[16-27]《陳雲年譜（1905–1995）》，1983 年 6 月 30 日，頁 328–3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 年 6 月 30 日，頁 918–919。

[16-2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 年 12 月 22 日，頁 949–950。

[16-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6 月 30 日，頁 987；SWDXP-3, pp. 72–75.

[16-30]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16-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中冊，頁 610–61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545–557；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p. 137–138.

[16-32]Xiaokang Su and Luxiang Wang, *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16-33]SWDXP-3, pp. 90–99.

[16-34]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p. 357–369；董輔初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 310–311。

[16-35]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57.

[16-36]Barry Naughton, "False Starts and Second Wind: Financial Reforms in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pp. 223–252; David Bachman, “Implementing Chinese Tax Policy,” in David M. Lampton, 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119–153; Penelope B. Prime, “Taxation Reform in China’s Public Finance,”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p. 167–185.

[16-37]《陳雲年譜（1905–1995）》，1985年2月18日，頁375–376。

[16-38]董輔初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311–312;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p. 363, 949–952.

[16-3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1月23日，頁1027–1028。

[16-40]對廣東幹部的採訪，無日期。

[16-41]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2;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81–182.

[16-42]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91–294.

[16-43]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153.

[16-4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6月29日、8月1日，頁1055–1056、1063–1065。

[16-45]SWCY, 3:340–344; 《陳雲年譜（1905–1995）》，第3卷，頁383–384。

[16-46]SWDXP-3, pp. 144–150.

[16-47]SWDXP-3, p. 203.

[16-48]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p. 122–123.

[16-49]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0]SWDXP-3, May 19, 1988, pp. 257–258.

[16-51]董輔初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316。

[16-52]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526–531。

[16-53]SWDXP-3, pp. 271–272;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8年9月12日，頁1247–1248。

[16-54]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8.

[16-55]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p. 228.

[16-56]《陳雲年譜（1905–1995）》，1988年10月8日，頁416–417。

[16-5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93），上冊，頁253–255。

[16-58]董輔初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下冊，頁321–322;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p. 369.

[16-59]對這些不同選擇更全面的介紹見 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pp. 32–45.

第 17 章

一國兩制：臺灣、香港和西藏

縱觀中國帝制時代的歷史，每當一個朝代衰落時，廣袤的邊境地區就開始試圖擺脫中央的控制。而在豪強興起建立新的朝代後，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又會被收回和加強。隨著中國最後一個王朝大清國在 19 世紀 90 年代的衰落，朝廷大員李鴻章面對西方列強，被迫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將中國一些沿海領土的控制權轉讓給西方國家。1895 年甲午戰敗後，李鴻章將臺灣割讓給日本，1898 年又與英國簽訂了租讓香港新界的法案。因而，李鴻章被視為對洋人卑躬屈膝的賣國賊，是中國歷史上最受詬病的官員之一。就像過去改朝換代的豪強一樣，毛澤東收復了晚清政府丟掉的大部分中國領土，包括上海、青島等地的租界，但他卻未能收復臺灣和香港。這個重任落在了鄧小平的肩上。^[17-1]

和過去的皇帝不同，毛澤東得以利用電台、電影、報刊和現代宣傳機器，為實現愛國主義目標而獲取民眾支持。他尤其擅長動員中國的年輕人，使他們對自己的偉大文明曾經遭受的屈辱義憤填膺。一旦民族主義的火焰被煽動起來用以鞏固對自己的支持，就不會有任何共產黨領導人可能選擇背叛這種民眾情緒，鄧小平也不例外。所以鄧上台之後，便把收復臺灣和香港視為自己最神聖的職責之一。

鄧小平也努力加強對中國邊境地區的控制。中國的北部、西部和南部邊境都是多山地區，那裏的少數民族過著勉強溫飽的生活，比平原地區的農民更加貧困。大多數少數民族人口有限、缺乏組織，也得不到境外支持以抗衡北京的控制。但是西藏有所不同，一千多年前藏人就已經擁有一片幾乎和當時的中國一樣大的區域，雖然藏人的領土逐漸縮小，但一些較小的藏民群體仍散居於中國的幾個省份，藏傳寺院和喇嘛廟也足以成為抵抗漢人統治的中心。在鄧小平時代，他們得到流亡印度的一個龐大團體的支持，該團體在政治上很活躍並一直同中國敵對。尤為重要的是，藏人有達賴喇嘛的領導，他在全世界的追隨者之眾超過任何其他亞洲領導人。

為了收回臺灣和香港並維持對西藏的穩固統治，鄧小平就像其他中國統治者一樣，在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但他更願意以和平方式解決這些問題。為了獲得當地民眾的合作且避免使用武力，他願意給予他們相當大的自治權。1979 年 1 月，鄧小平在成為頭號領導人不久後便宣佈，中國對臺灣和香港擁有主權和最終控制權，但允許這些地方享有高度自治。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由周恩來提出的，但在鄧小平當政的 1982 年得到了深入而系統的闡述，正式成為「一國兩制」的政策。這項政策允許香港和臺灣在 5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內繼續保留不同的社會制度。鄧小平也願意給予西藏相當程度的自治，允許它保留自身的大量文化風俗。

謀求臺灣統一

即使知道美國與中國恢復邦交仍會繼續對臺銷售武器，鄧小平依然決心在自己掌權時期實現臺灣與大陸的統一。^[17-2]收復臺灣的重要性並非來自地緣戰略的考慮，而是因為這個由中國的死敵所統治的島嶼，讓人痛苦地聯想到中共仍未徹底結束內戰。更令人難堪的是，臺灣作為一個觸目的象徵，代表了帝國主義者瓜分中國所帶來的百年恥辱。

1979 年 1 月 1 日是中美正式建交日，其時正值鄧小平擔任頭號領導人幾周之後。鄧在元旦講話中申明了收復臺灣的重要性。他列出三個主要目標：（1）實現四個現代化；（2）中美關係正常化；（3）將臺灣回歸列入工作日程。^[17-3]幾天後，他又對參議員薩姆·努恩（Sam Nunn）率領的美國參議院代表團說，中國不排除使用武力收復臺灣，否則就等於捆住自己的手腳，使和平解決臺灣問題變得不可能。^[17-4]鄧小平的理由很容易得到中國人的理解，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美國支持，臺灣為避免被軍事佔領只能選擇與大陸統一，因此，美國維持對台關係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構成阻礙。1980 年 1 月，鄧小平在說明未來十年的主要目標時，再次將統一臺灣作為目標之一。^[17-5]在與美國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時，鄧預期臺灣將在幾年內回歸大陸，當時甚至伍德科克也這樣認為。

歷史上的先例也為鄧小平提供了實現這一日標的希望。鄭成功被剛建立的清朝打敗後，率領明朝餘部逃往臺灣；22 年後的 1683 年，當時統治臺灣的鄭成功的孫子同意臺灣重歸大清管轄。1949 年蔣介石被中共打敗後，也逃到了臺

灣。鄧小平希望他在莫斯科的同窗、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總統也會遵循鄭家的先例。1979 年元旦的全國人大致臺灣同胞書宣佈，如果臺灣回歸大陸，中國將尊重臺灣的現狀。鄧小平也對薩姆·努恩的代表團說，如果臺灣回歸大陸，它可以保留自己的社會制度一百年不變。臺灣必須降下自己的國旗，但可以保留軍隊。^[17-6]但蔣經國得悉鄧小平的建議後，卻作出了挑釁性的回應：他重申了增加軍事預算、加強軍力並最終光復大陸的意圖。^[17-7]此外他也繼續堅持臺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立法院委員則是中國所有省份的代表。

同時，美國國會使局勢變得更為複雜——它於 1979 年 4 月 10 日通過了《臺灣關係法》，使蔣經國大受鼓舞。該法案旨在調整美國與臺灣的貿易、交往和其他領域的一系列相關條約。由於臺灣政府不再是全中國的正式代表，這是必要的一步。但是，《臺灣關係法》的內容和精神超出了對具體條約的調整，它反映了很多反對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國會議員的情緒。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期間，國會一直被蒙在鼓裏；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一心想與中國恢復邦交，很少考慮臺灣的安全，也未能充分預見到美國國內支持臺灣的政治勢力之強大。^[17-8]美方在 1978 年 12 月的一個深夜把蔣經國叫醒，告訴他幾小時後將宣佈與中國大陸正式建交，這一做法被國會認為具有侮辱性，加強了國會要幫助臺灣的決心。國會中不少人得到過臺灣慷慨的資金支持，或是與對臺出售武器的公司有來往，他們認為正常化過程沒有以任何方式顧及到忠實的臺灣朋友。法案要對美國的輕慢行為有所糾正，它要求美國向臺灣提供必要的自衛武器，並宣佈，以和平手段之外的任何方式解決臺灣問題都將引起美國的嚴重關切。

《臺灣關係法》的精神在美國政治中的含義是：美國忠實於它的盟友。但是它違背了與中國談判的精神，有人甚至認為它違背了 1972 年《上海公報》的精神，美國政府在該公報中承認「海峽兩岸的全體中國人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後來被國會議員們視為重要的問題——臺灣是民主的一面旗幟，它尊重人權，實行法治——在 1979 年時還談不上，因為當時臺灣當局仍在實行戡亂法，用壓迫手段控制反對派，為此受到人權活動家的批評，後來這些批評則以更大的規模指向中國大陸。

《臺灣關係法》的通過讓鄧小平怒不可遏，他為此也受到一些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批評，認為他在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中對美國的態度不夠強硬。鄧小平並不關心《臺灣關係法》在法理上是否站得住腳，他擔心的是它的政治影響。該法案使他曾經為之奮戰多年並為此犧牲了數萬戰友的政治使命——結束國共內戰和恢復對臺灣的控制權——變得更加困難，甚至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實現了。鄧小平尤其反對的條款是，美國將繼續向臺灣出售「足夠的防禦性武器，使其能夠維持充分的自衛能力」。美國承諾提供軍事援助，斷送了鄧小平原本具有的說服臺灣自願回歸大陸的影響力。

為了增加與臺灣達成協議的可能，鄧小平還能做些什麼呢？除了通過外交渠道表現其「頑強好鬥」的一面，鄧小平還邀請美國國會議員訪華，向他們直接陳述中方的觀點。1979 年 4 月 19 日，鄧小平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弗蘭克·丘奇（Frank Church）參議員說，《臺灣關係法》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他又說，該法有協防臺灣的條款，這違反了中美建交最基本的前提。（鄧小平後來表示，《臺灣關係法》的頒佈比售武本身問題更為嚴重。）^[17-9]同時，他還盡可能地孤立臺灣人民。他支持游說其他國家將臺灣排除在任何區域性或國際性組織之外。他還發誓要把跟臺灣做生意的外國公司趕出中國大陸市場。

比《臺灣關係法》更讓鄧小平懊惱的是朗奴·列根競選總統。列根發誓要給臺灣以「尊嚴」，包括謀求與臺灣建立正式關係。1979 年 8 月 22 日，列根的競選搭檔、副總統候選人喬治·布殊前往亞洲，會見了憤怒的鄧小平。陪同布殊訪華、後來擔任駐華大使的李潔明（James R. Lilley）在回憶他們的會談時說：「這是一次特別不愉快的訪問。」布殊想讓中國放心列根不會實行兩個中國的政策，但是在會談中鄧小平的助手帶來了最新的新聞簡報，其中包括一次列根記者招待會的報道：列根在這次招待會上說，臺灣是一個國家，美國應當恢復與臺灣的外交關係，為臺灣的自我防禦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鄧小平說：「他又在搞這一套。」^[17-10]他接著又說：「列根不止一次說過，他支持與臺灣建立官方關係……不管在其他國際問題上有何觀點和立場，假如列根的言論和共和黨的政綱得到貫徹，這必將損害中美關係。」鄧小平還宣佈，如果共和黨繼續支持臺灣，他將被迫起來維護「十億中國人民的利益」。布殊盡量軟化美國的立場，但據李潔明說，「鄧小平仍然沒有消氣」。^[17-11]

列根當選總統後，由於他蓄意讓美臺關係升溫，賣給臺灣更多的先進武器，鄧小平兩年前訪美時形成的中美之間的密切關係逐漸被中方日益增長的不滿所取代。鄧小平希望能與美國建立更密切的關係，他也想讓美國幫助中國搞現代化。但是他認為臺灣問題對中國極其重要——假如美國給予臺灣官方承認，他不惜讓美中關係倒退。鄧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極為堅定。當時一位美國官員說，那時跟中國打交道，就像徒手掰蛤蜊那麼困難。

1981年1月4日，列根宣誓就職的前幾天，鄧小平會見了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史蒂文斯（Ted Stevens）和二戰期間援華的美國空軍飛虎隊英雄陳納德將軍（Claire L. Chennault）的華裔遺孀陳香梅，向他們擺明了自己的態度。他知道陳香梅是臺灣的朋友、列根就職委員會的成員，他警告她說，假如美國鼓勵臺灣獨立，將會給中美關係造成嚴重後果。鄧告訴客人，他希望看到中美關係向前發展，但是中國對列根的一些言論感到憂慮。他說，他知道競選人在大選前說的一些話與當選後的實際做法會有所不同，不過因為有一家美國報紙斷言只要美國採取反蘇立場，中國便有求於美國，對此他必須作出澄清。他承認那家報紙所說的一點，即中國確實是個窮國，但除此之外該報紙的言論全是錯誤的：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獨立，它絕不會低三下四有求於人，它會堅持自己的觀點——就算美國採取堅定的反蘇立場，中國也不會在臺灣問題上忍氣吞聲。他進一步警告說，如果列根向臺灣派駐私人代表，中國將把這視為正式的官方決定，這既違反《上海公報》，也違反《中美兩國建交公報》。如果美國不能正確處理這些微妙的關係，鄧小平說，中國準備讓中美關係不是回到70年代，而是倒退到60年代的水平。他下了最大的決心，不能讓列根與臺灣達成協定，否則將使收回臺灣從長遠看變得更為困難。他讓他的客人清楚地知道，中國將靜觀列根的一言一行。^[17-12]

中國對列根總統將把臺灣視同為一個國家的擔心，因中國駐美大使柴澤民得以出席列根的總統就職儀式而減弱。柴澤民曾威脅說，如果受邀的臺灣代表到場，他將拒絕出席儀式。最終臺灣代表並未到場，中國把這看作一個積極的信號。^[17-13]不過，鄧小平仍然深為關切列根與臺灣的關係。

鄧小平隨後又想對臺灣實行一系列「胡蘿蔔外交」，以增強對它與大陸改善關係的吸引力。中國在廖承志的領導下擬定了一個說明對臺政策的新文件，並在1981年3月向英國外相卡靈頓勳爵（Lord Carrington）出示了文件的草稿。1981年9月30日，這份文件由葉劍英元帥在國慶日前一天的公開講話中正式發佈。讓葉劍英來做這件事，是因為早年國共結成統一戰線時他供職於黃埔軍校，在國民黨中有不少老朋友。葉劍英的「九點建議」包含以下內容：

- 談判將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進行；
- 雙方應當為「三通」——通郵、通商、通航——創造條件；
- 歡迎臺灣人民來大陸投資經商；
- 統一之後臺灣將享有高度自治，可以保留它的軍隊；
- 臺灣現在的社會和經濟制度，包括私人企業和財產權，將保持不變。^[17-14]

但是臺灣沒有作出任何回應，而中國和列根政府的關係依然緊張。鄧小平知道，使用軍事手段跟有美國撐腰的臺灣對抗毫無勝算，於是他繼續運用自己手中的另一件武器。他威脅說，中國將減少甚至結束中美合作。在得知美國打算向中國大陸出售部分武器時，鄧小平回答說，如果這意味著美國要提升向臺灣出售武器的級別，中國不會接受這筆生意。

列根手下的國務卿黑格（Alexander Haig）應鄧小平之邀於1981年6月訪問了北京。6月16日鄧小平會見黑格時重複了他對其他人說過的話：中國希望中美關係順利發展，但是假如不能正確處理對臺售武問題，則可能造成中美關係的停滯甚至倒退。^[17-15]他還對黑格說，中國同意與美國恢復邦交時，美國曾表示會逐漸減少對臺售武，但後來並沒有這樣做。中方要求美國全面停止向臺灣出售戰鬥機。如果美國不減少對臺售武，他準備與美國斷交。黑格相信，為確保中美合作對抗蘇聯，必須作出讓步，於是向鄧小平保證說，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美國只會繼續向臺灣銷售「經過仔細挑選的防禦性武器」。^[17-16]

鄧小平向黑格表達了他的強硬觀點三天後，列根總統會見了應邀前來華盛頓討論臺灣和中國關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李光耀在回答列根的問題時說，他認為以臺灣的安全狀況並不需要美國擬售的FX-15戰鬥機。會談結束時，列根請李光耀給臺灣的蔣經國總統捎信，告訴蔣美國難以滿足臺灣的全部要求，臺灣現在不應當提出對高技術武器的要求，但列根總統也不會扔下蔣經國不管。數日之後，李光耀就把這個口信帶給了蔣經國總統。^[17-17]

與此同時，鄧小平和部下繼續向美國施壓。黑格訪華後不久，當時國務院的中國問題資深專家、駐華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收到了中國外交官交給他的一份照會，其中提到，美國繼續對臺售武將會給雙方戰略合作造成嚴重後果。鄧小平在8月底接受香港報紙採訪時再次警告說，北京已經為中美關係惡化作好了準備。在10月的墨西哥坎昆峰會上，趙紫陽總理對列根總統說，中國希望與美國合作對抗蘇聯，但臺灣問題仍是這一合作的障礙。同樣是在坎昆會議上，外交部長黃華告訴黑格國務卿，中國要求得到一個明確日期，在此期限之前售臺武器的數量和質量不可超過卡特當政時期的水平，他還要求每年逐漸減少對臺售武，並確定一個具體日期完全停止出售。一周後黃華外長又轉達了鄧小平的要求，即在中美軍事合作談判結束之前，美國不能與臺灣達成任何出售武器的協議。美國接受了鄧小平的要求。

黑格答覆黃華說，美國不同意為停止對臺售武規定一個時限，但是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將是「有限的和有選擇的」，並且不會超出卡特政府時期的水平。^[17-18]

為了表明北京對美國未減少對臺售武的不滿，趙紫陽不但拒絕了列根發出的慶祝 1972 年《上海公報》發表十周年的訪美邀請，甚至沒有對他的信給予答覆。中國按「殺雞儆猴」的古訓，以荷蘭向臺灣出售兩艘潛艇為由將中荷外交關係降級。1982 年 1 月，美國派助理國務卿約翰·霍爾德里奇出訪北京，以防關係進一步惡化。^[17-19]霍爾德里奇一行人受到的接待十分冷淡，但是當霍爾德里奇告訴中方官員美國決定停止向臺灣出售 FSX 戰鬥機後，中方又變得親切起來。然而霍爾德里奇還肩負著自己的使命：在美國決定向臺灣出售哪些武器系統之前，和北京就中美關係的框架達成更寬泛的協定。霍爾德里奇帶來了一份框架協議的草稿，但中方認為它過於含糊其辭，沒有對他們關心的問題作出回應。北京方面要求，為使談判繼續，美國必須不再向臺灣運送任何武器。^[17-20]這相當於已經劃出了中方的底線。1982 年最初幾個月，中國媒體仍不斷抨擊美國干涉臺灣問題，中國認為這是自己的內政。

為了打破這種緊張關係，列根總統致信北京，建議讓副總統喬治·布殊——他與鄧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國重要官員有著良好的關係——出訪亞洲時順道訪華。中方沒有當即作出答覆，直到布殊已經訪問了幾個亞洲國家後才通知美國，北京歡迎布殊來訪。布殊在抵京後的最初幾天發現，北京對售武問題依然態度強硬。隨後鄧小平請他前去會談。會談過程中鄧提議和布殊去旁邊一個房間單獨交談一刻鐘，只允許恒安石大使和譯員在場。一小時後，布殊和鄧小平達成了非正式諒解，最終這被納入了美國限制對臺售武的文件。鄧小平知道已經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結果：美國不會停止對臺售武，但對售武作了限制——而隨著美國對臺售武的減少，鄧小平可以樂觀地認為，從長遠看臺灣終將回歸大陸。這次談話之後中方對美國的責難便消失了，氣氛也變得輕鬆起來。^[17-21]一年多來像一位軍人那樣以強硬姿態氣勢洶洶地教訓美國官員的鄧小平，又變成了一個幽默風趣的合作夥伴。^[17-22]

鄧小平和布殊在會談中達成的諒解，成了恒安石和中方同行之間進行具體談判的基礎，並形成了《關於美國對臺售武的中美聯合公報》（1982 年 8 月 17 日簽署）。該協議對美國售臺武器作出限制，明確表示美國「無意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執行『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報還規定，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美國願意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達成最後的解決」。^[17-23]為了安撫臺灣及對公報持反對意見的國會議員，列根總統邀請 30 位參議員和眾議員開了一個情況介紹會，向他們解釋為何這一協議並未傷害臺灣。

8 月 17 日公報一公佈，鄧小平就邀請恒安石與他非正式會面。在和藹的交談中，鄧小平祝賀恒安石達成了協定。這份《八一七公報》，連同 1972 年 2 月 27 日的《上海公報》和 1979 年 1 月 1 日的《中美建交公報》一起，成為美中關係的三個基礎文件。^[17-24]此後直到天安門悲劇為止，它為中美關係提供了穩定的基礎。它也為列根總統 1984 年 4 月下旬為期六天的中國之行鋪平了道路，使他成為兩國建交後第一位訪華的美國總統。列根訪華期間與鄧小平進行了三個小時的友好會談。鄧在解釋了中方的對臺立場後，請列根從中方觀點考慮問題，不要因為蔣經國而本末倒置。^[17-25]列根感到這次訪問很愉快，他說鄧小平「看起來不像共產黨」。^[17-26]

在 1980 年代中期，鄧小平對自己能在「去見馬克思」前解決臺灣統一問題仍存一線希望。他和蔣經國有私交，兩人在 1926 年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1985 年 9 月 20 日鄧小平會見李光耀時，知道李不久前曾見過患有嚴重糖尿病的蔣經國，就問他蔣經國對接班人問題是否有所安排。李光耀回答說自己沒法說誰最終會接蔣經國的班。鄧小平則說他擔心蔣經國去世後臺灣會發生混亂，因為那裏有部分勢力想跟美國和日本合作，尋求臺灣獨立。鄧小平隨後請李光耀轉達他對蔣經國的問候以及兩人見一面的建議。沒過一個月，李光耀就飛到臺灣捎去了這個口信。然而蔣經國有著多年與共產黨打交道的痛苦記憶，他說他無法相信他們，拒絕了會面的邀請。^[17-27]此事過後，已屆 81 歲高齡的鄧小平再沒多少理由指望自己能解決臺灣問題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阻止臺灣作出任何走向獨立的舉動，為他的繼承者有朝一日重新控制臺灣鋪路。

兩年後的 1987 年，蔣經國在病榻上廢除了實行已久的戡亂法，使反對黨合法化，從而為臺灣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礎。他也第一次允許臺灣人民去大陸探親，但不能直接前往，而是要繞道香港。臺灣人很快就開始前往大陸探親，並在那裏做起了生意。由於很難區分臺灣人是否在大陸有親戚，因此不久後便允許所有臺灣人前往大陸。鄧小平歡迎臺灣人來大陸探親和做生意，他把這視為走向最終統一的步驟，儘管在他生前也許不再可能實現。鄧小平的說法是：「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17-28]

收回香港主權

1975 年 5 月 25 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了 1970 年至 1974 年擔任英國首相的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毛澤東當時表示，解決香港問題的時機還不到，他指著旁邊的鄧小平和另一些年輕幹部說：「這個問題讓他們去解決吧。」^[17-29]

鄧小平 1977 年復出後對香港問題產生了濃厚興趣。然而，1977 年在與葉劍英元帥共同前往廣東時，他們的討論重點並不是收回主權，而是香港能為大陸的現代化提供什麼幫助。鄧小平很清楚，中國可望在金融、技術和管理領域大大得益於香港。即使中國收回主權後，也要讓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眼下的任務是減少文革期間紅衛兵的劣跡給香港商人造成的恐懼和反感。文革中的紅衛兵不但迫害港人住在大陸的親屬，而且還湧入香港讓港人心驚膽戰，使他們普遍憎惡毛澤東的統治。^[17-30]

鄧小平在 1978 年 4 月成立了國務院下屬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和以廖承志為組長的領導小組。廖承志可以說是這個職務的不二人選：他的家鄉在惠州附近一個小村莊，距香港只有五十多公里。另外他與香港和日本都有很深的淵源，他 1940 年代後期曾在香港居住，其堂妹是香港首席大法官的妻子。

廖承志最初的任務之一是籌備和召開文革後的第一次港澳問題會議。這次會議開了將近一個月，主題是放棄導致港人疏遠大陸的「極左」政策，最初的工作重點是改善中國與港澳工商界的關係。

北京在提到香港時，長期以來習慣稱「港澳」，仿佛說的是一個地方。對於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來說，澳門這塊隔珠江三角洲與香港相望的葡萄牙殖民地只是個小地方，相對而言並不重要，經濟活力來自於香港；況且，雖然與葡萄牙的租約到 1999 年才到期，澳門實際上已處在大陸的控制之下。葡萄牙在 1967 年和 1974 年曾兩次提出將澳門歸還中國，北京已與葡萄牙達成協議，大體勾畫出了歸還澳門的方案。北京擔心這個決定會對極不穩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負面影響，因此一直對協議保密，公開的說法是還沒有作好收回澳門的準備。對鄧小平而言，「港澳」指的就是香港。

從 1949 年到 1978 年的冷戰期間，香港一直是中國與外界溝通的最重要視窗。港英當局允許共產黨和國民黨在這裏共存，甚至相互搞諜報活動，只要他們不公然開啟戰端，能讓港英殖民政府維持法律和秩序即可。^[17-31]北京利用香港這個地方賺取外匯，進口技術，獲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但是直到 1978 年以前，這個視窗只開了一道縫，大陸與香港的關係仍受到極大限制。中國原本可以切斷對香港的飲水和食物供應，但即使在文革期間它也沒有這樣做。1960 年代俄國人對中國批判修正主義聽得厭煩，便恐嚇香港人說，假如中國真反修，它不妨證明給世人看看，把家門口那塊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收回去。北京則回答說，香港屬於歷史問題，要等到適當的時機才會加以解決。北京對香港的戰略是「長遠打算，充分利用」。^[17-32]

為了解決「收回香港主權」的問題，鄧小平要認真進行準備。1978 年他還沒有籌劃處理這件事的路線圖。當時鄧小平僅僅作出了中國將維護香港繁榮的一般性保證。然而，廖承志在 1978 年 8 月 19 日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對一批香港客人保證說，香港可以長期保留它的現行制度，中國不會在香港搞群眾運動。^[17-33]

1978 年 11 月，儘管鄧小平正忙於出訪東南亞以及為成為頭號領導人作準備，他還是抽空接見了香港船王，即當時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錢的商人包玉剛。^[17-34]鄧小平賞識的不僅是包玉剛的成功，還有他對國際商業界第一手知識的掌握、對見過面的世界各國政要的敏銳觀察力、對香港商業精神的直率讚揚、他的務實作風以及希望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幫助的真誠態度。在中國大陸以外，沒有任何家庭能像包玉剛的家庭那樣與鄧小平一家人形成密切關係。^[17-35]1978 年 11 月，鄧小平和包玉剛專門討論了香港商人在中國現代化中能夠發揮的作用。

1978 年 12 月，對外經貿部部長李強被派往香港，考察香港能為中國、尤其是廣東的現代化提供哪些幫助。李強在訪港時首次宣佈，中國將接受外商投資，歡迎貸款。李強還邀請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鄧小平知道港督麥理浩會講漢語，在倫敦很有威望，與中共駐港代表也有不錯的工作關係。他還知道，對於香港在 1997 年之後的命運，最終還是要跟英國人認真磋商。^[17-36]在口頭邀請麥理浩之後，中方又發出了正式的邀請函，這是由一位中國部長寫給港督的第一封信。麥理浩認識到中方這種姿態的歷史性意義，他說：「鑒於中國現代化計劃的大背景，這是一個嚴肅的倡議。人人都同意，我當然應當走一趟。」^[17-37]（關於香港在四化中作用的更多內容，見第 14 章。）

1920 年鄧小平赴法國時乘坐的輪船曾停靠香港，當時他就對香港產生了興趣，1929 年至 1931 年他被派往廣西領導城市暴動時曾取道香港，在那裏住過數月，對香港有了更多瞭解。^[17-38]鄧小平對殖民歷史有大致的瞭解：香港島

在 1842 年鴉片戰爭後割讓給英國，1860 年又割讓了大陸的一小塊地方九龍，北邊的「新界」則於 1898 年租借給英國 99 年，將於 1997 年到期。鄧像中國的其他愛國者一樣認為所有三個條約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在中國無力抵抗之際被強加的「不平等條約」。

從 1949 年到 1978 年，中共在香港維持著一些自己的組織，在普通港人中也有為數不多的追隨者。^[17-39]共產黨對所有其他人，包括國民黨、英國人和美國人，都懷有極深的猜疑，但是大多數港人害怕給自己找麻煩，像對待瘟疫一樣躲避政治。中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在當地出版報刊和圖書，向大陸提供有關香港和世界各地的公開或機密報告，外交部也派有駐港官員。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照顧大陸的商業利益，華潤集團則代表外經貿部和中國地方政府做生意。中國在香港也有自己的零售商店、情報組織、左派學校和工會。這些組織在寫給北京的報告中一味吹噓中共在香港得到的支持，這使鄧小平等領導人低估了香港華人居民事實上對英人統治的滿意程度。其實，大多數港人都害怕剛搞過文革的中國會對香港幹出什麼名堂。^[17-40]

1979 年 3 月 24 日麥理浩與鄧小平見面時，一些英國外交官已經開始猜測，1997 年需要把租約到期的新界歸還中國時，英國將不得不放棄對整個香港的主權，因為香港新界以外的地方無法作為獨立的行政單位存在。但是當時的北京政權——它剛剛走出文革，完全缺乏治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經驗，還有在 1950 年代消滅大陸所有私營企業的記錄——怎麼可能提供維護香港穩定和繁榮所需要的明智領導呢？不僅香港的外國商人，甚至香港華人也疑慮重重。港英官員和很多普通市民都希望，即使英國人在 1997 年放棄主權，中國也應當允許英國官員繼續管理香港。^[17-41]

在去北京訪問的途中，英國官員已知道鄧小平一定會談到香港能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什麼幫助。但是讓他們感到意外的是，鄧小平在對麥理浩的開場白中就提到了香港的最終命運問題。他宣佈，兩國商討解決方案必須以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為前提，但是直到下世紀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香港仍可繼續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儘管大陸實行社會主義。^[17-42]三年以後鄧小平才正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政策，但是在這次最初的會見中，他已經向麥理浩說明了這項政策的要點。

麥理浩和隨行的中國問題專家意識到，如果向鄧小平提出 1997 年後能否仍由英國繼續管理香港，無疑會使他動怒。於是他們決定間接談及這個問題，提出如何給那些要簽訂 15 年以上租約的人提供保障，因為這些租約在 1997 年之後仍然生效。出於同一思路，麥理浩還提到在 1997 年之後的局勢尚不明朗的情況下，香港投資者對從事新的貸款、抵押和其他投資活動的擔憂。麥理浩建議，把規定 1997 年租約到期的官方文件用語改為「只要英國繼續管理這一領地」。據陪同麥理浩的柯利達（Percy Cradock）說，鄧小平顯然沒有理解商業上採用的 15 年租約與有關新界的 99 年政府租約之間有何區別。^[17-43]鄧小平一直避免就租約問題表明看法，但是他說投資者可以放心。^[17-44]在回答英方對大量中共幹部將被派往香港的關切時，鄧小平立刻回答說，中國會採取措施避免這種問題發生。

麥理浩返港後沒有公開北京會談的細節，但他轉達了鄧小平保證中國不會損害投資者利益的信息。港人得悉此說後如釋重負，而中國更加開放的氣氛給他們造成的印象，香港媒體有關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領導中國走上更加務實的道路的報道，也加強了他們這種感覺。第二年香港股市和房地產價格飆升。^[17-45]

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又有一些英國高官飛到北京與鄧小平和其他中國官員會談，華國鋒也在 11 月訪問了英國。所有英國官員都向中國同行表達了同樣的基本觀點：應及早作出有關香港的決定。然而鄧小平仍未準備好著手進行談判，他只是一再重複他對麥理浩講過的話：香港在 1997 年之後可以保留它的制度，中國會保護投資者的權益。^[17-46]

1980 年 12 月的政治局會議解決了對毛澤東的歷史評價問題，這為鄧小平處理香港問題提供了一個重要突破口。這一進展意味著，他不必再擔心那些反對收回主權後允許香港保留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不變的保守派。在建立好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首的新團隊後，鄧小平有理由相信，他的領導班子能夠具備管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城市的能力。

1981 年初，鄧小平同意開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列根 1981 年當上總統後，鄧小平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臺灣問題上很快取得進展，此時把工作重點轉向香港，可以使那些對中國政府在收復臺灣上表現軟弱感到不滿的愛國青年轉而關注收回香港主權的鬥爭，而鄧小平在這件事上穩操勝券。中國在邊境一側有大量駐軍，英國在香港的一小批軍隊不可能進行有意義的抵抗。中國還控制著香港的食物和用水。此外，中國在 1981 年初已經和包玉剛等香港商界領袖建立了工作關係。當初為解決臺灣問題提出的「一國兩制」政策，可以很容易地用來為中港關係提供框架。如果在安撫港人方面取得成功，這甚至可能有助於減少臺灣民眾對統一的恐懼。

港澳辦公室於 1981 年 3 月在北京召開了討論香港前途的會議。^[17-47]在這次會議上，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傳達了鄧小平的觀點：不收回香港，我們將無顏面對祖宗，面對十億中國人民和子孫後代，面對第三世界的人民。在章文晉傳達鄧小平的意見後，問題迎刃而解，誰也不敢再提在新界租約期滿後讓英國繼續管理香港的事了。^[17-48]

雖然英國不太可能派出軍隊保衛香港，但當時正值英軍考慮出兵福克蘭群島，中國不能排除英國有可能對香港作出同樣舉動。鄧小平一向會作最壞的打算，他解決了英國一旦出兵中國該如何應對這一問題——9月中旬，在瑪格麗特·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到訪北京前一周，鄧小平與李先念等人見面時說，中國要準備把使用武力作為保衛香港的最後手段。

鄧小平下定決心完全收回香港主權後，中國官員立刻開始準備文件草稿，供中國內部討論在 1997 年之後如何統治香港。鄧小平也閱讀有關香港的報道，並會見了更多香港商界領袖。例如，親北京的港商作為人大代表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期間，鄧小平專門與他們見面，交流有關香港的看法。^[17-49]

與其他中國官員一樣，鄧小平也擔心從 1979 到 1997 年這段時間裏英國有可能留下一些「毒丸」，使中國在 1997 年恢復行使主權後的統治問題變得複雜化。英國有可能讓英國公司參與大型公共項目，花光香港的資產，使政府債台高築。港英政府有可能大量批租土地，不給中國人在 1997 年之後留下多少收入來源。港英政府還可能為政府官員加薪，使中國在 1997 年之後難以平衡預算。當時，鄧小平還沒有預見到他和其他幹部後來才意識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權力。

1981 年 12 月 21 日至 1982 年 1 月 6 日的統戰會議提出了北京對香港前途的基本立場。這次會議結束後不久中英就開始了初步的談判。1982 年 1 月 6 日英國外交大臣阿特金斯（Humphrey Atkins）會見了趙紫陽總理。在這次會談中，北京首次做好了開啟談判並討論具體問題的準備。趙紫陽對阿特金斯說，香港仍將是一個自由港和商業金融中心，中國將保證香港繼續繁榮。訪問結束時兩國宣佈，作為對華國鋒主席 1979 年 11 月訪英的回訪，瑪格麗特·戴卓爾首相將於 1982 年秋天訪華，同時雙方將開始進行富有誠意的談判。^[17-50] 1982 年 3 月鄧小平正式批准了 1 月的統戰會議提出的基本方案，並把它提交給黨中央。

此後幾個月裏，鄧小平多次參與有關香港問題的討論，包括與香港大約 12 個團體或個人的會面，其中有包玉剛和另一位長期跟大陸友好的商人霍英東。^[17-51] 在會見英國官員時，鄧小平發誓，1997 年後將把政治權力交到港人手裏。一貫強調培養接班人的鄧小平說，在剩下的 15 年裏，香港的商業界、教育界和文化界領袖要推薦一些有前途的香港「愛國」青年，讓他們立刻開始準備 1997 年之後接手不同領域的職務，以保證平穩交接和穩定繁榮。^[17-52] 鄧小平會見的重要客人之一是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該校是香港高等教育的領頭羊，在培養未來政府官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 1982 年 4 月 6 日接見前英國首相希思時，鄧小平引用了 1 月會議提出的「十二條」，十分具體地表明態度：香港仍將是一個自由港和全球金融中心，它將由包括英國人和其他國家人士在內的香港人自己管理；它將由商人來領導，將容納來自所有社會階層的人；它將叫做「中國香港」，但一切商業活動照舊進行。鄧小平對希思解釋說：「我們新憲法有規定，允許建立特別行政區。」^[17-53]

戴卓爾首相訪華

戴卓爾首相在 1982 年 6 月份的福克蘭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後不久，於 9 月 22 日抵達北京。這次勝利使她變得過於自信，這讓她的顧問愛德華·尤德（Edward Youde）等人感到擔心。他們並沒有強而有力地對戴卓爾夫人解釋清楚，想讓鄧小平允許英國在 1997 年後繼續保留對香港的主權是多麼不可能。外交部的兩位主要中國問題專家珀西·柯利達和艾倫·唐納德（Allen Donald）為了避免對抗，確實試圖解釋清楚鄧小平的決心。^[17-54] 然而自信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錯誤地以為，中國拒絕考慮英國在 1997 年後繼續保留主權只不過是一個可以談判的條件。^[17-55] 戴卓爾夫人在北京首先會晤的是趙紫陽總理，但趙在與戴卓爾見面之前就對香港記者說，中國當然要收回主權，主權交接不會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他把這一基本立場首先透露給新聞界，意在向戴卓爾表明這種觀點不容談判。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時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17-56]

9 月 24 日上午，「鋼鐵公司」鄧小平和「鐵娘子」戴卓爾見面，兩人進行了兩個半小時的會談。戴卓爾夫人後來把這次會談描述為「生硬粗暴」。不過參加會談的英國官員證實，戴卓爾夫人過於誇張了與鄧小平之間的對抗，事實上對抗的感覺僅僅來自會談後戴卓爾夫人對媒體的講話以及中方的反應。據英方參加會談的人說，戴卓爾夫人的講話既雄辯又富魅力，儘管如此，鄧小平所擁有的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也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57] 鄧小平在開場白中宣佈，中國將在 1997 年收回主權，將支持香港的繁榮，並希望能夠得到英國政府的合作。^[17-58] 但戴卓爾夫人回應說，在英方看來，根據三個條約香港是屬於英國的，這些條約在國際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經雙方協議才能作出變動。她說，英國

在過去 150 年裏學會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錯。她又說，只有在作出保證香港繁榮穩定的安排後，才能談到主權問題；只有英國的統治能夠為香港的繁榮穩定提供保障：沒有英國的這種保障，商人不會再願意投資。不過戴卓爾夫人確實作出一個讓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權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她可以考慮向議會提出有關主權問題的建議。因此雙方應當通過外交渠道開始談判，尋求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

鄧小平斷然拒絕了她的建議。^[17-59]他說，有三個主要問題：主權，中國在 1997 年後如何治理以維護香港繁榮，中英兩國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 1997 年之前發生大的混亂。他說：「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的餘地。」他說：他不會做當年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李鴻章，主權意味著完全的主權：為了維護香港 1997 年後的繁榮，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數法律將繼續有效；中國會和香港市民進行廣泛協商，制定出對投資者——包括英國投資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讓英國政府或商業界滿意也是有限度的。鄧小平警告說，如果港英政府在 1997 年之前挑起嚴重對抗或從香港撤走大批資金，中國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鄧小平確實表示，他要與英國合作，他同意雙方應當立刻通過外交渠道進行磋商。^[17-60]但是他又補充說，如果雙方在兩年內無法就主權移交達成滿意的協議，中國將單方面宣佈自己的政策。^[17-61]駐北京的外交官大都知道鄧小平常用吐痰來強調重點：在場的人看到，鄧小平和戴卓爾會談時，不時往痰盂裏吐痰。^[17-62]

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結束會談走下外面的台階時，被一名記者的提問分神，腳下一滑導致膝蓋著地。這一插曲被電視鏡頭捕捉到並在香港的晚間新聞播出，後又在香港電視上反覆播出。這個畫面給人的印象是，戴卓爾夫人受到鄧小平強硬姿態的震懾，差點磕了個頭，幸虧有身邊的柯利達攙扶才沒有跪下。^[17-63]

後來戴卓爾夫人談到鄧時，仍然給了他正面的評價，認為他非常直率但並不粗魯。戴卓爾夫人離京前舉辦的答謝宴會上，由於鄧小平要去出席為金日成舉辦的宴會，趙紫陽總理成了主賓。戴卓爾在宴會講話中以更為和解的姿態對趙紫陽說，會談使她對中國有了更清晰的看法。她用了一句中國的成語：「百聞不如一見。」^[17-64]

由雙方代表擬定的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會談的公報中說：「兩國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香港前途舉行了深入會談。雙方領導人表明了各自對這個問題的立場。雙方同意把維護香港的穩定與繁榮作為共同目標，將在訪問後通過外交渠道開始舉行談判。」^[17-65]與鄧小平不同，戴卓爾夫人對英國在香港發揮的歷史作用感到自豪，而且確信以往的條約具有合法性。離開中國前，她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當她在香港的記者招待會上重複這些話時，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問題專家聽得不寒而慄，因為他們知道這些話會毀掉他們一直以來與北京達成的善意。不出他們所料，中方對此大發怨氣。在戴卓爾夫人訪華後的一周裏，香港股市下跌了 25%，恒生指數從 6 月的 1300 點跌至 10 月的 772 點。^[17-66]

戴卓爾夫人訪華後中英談判被推遲了，因為中方堅持談判協議的前提和基礎必須是中國 1997 年後完全收回主權，而戴卓爾夫人不願意接受這一條件。隨後中國發出了警告：1983 年 2 月底英國被告知，中方有關 1997 年後香港政策的單方面方案草稿已接近完成。實際上，假如不談判，中方將在 1984 年 9 月宣佈它自己的香港前途方案。^[17-67]北京的柯利達大使和港督尤德十分擔心中方會向 6 月份召開的全國人大提交他們的單方面方案，於是在 3 月初飛回倫敦與戴卓爾夫人協商。此時香港股市再創新低，乃至戴卓爾夫人也開始相信中方不會在主權問題上讓步。為了打破僵局，柯利達建議戴卓爾夫人致信趙紫陽總理，說明她可以重申她在北京說過的話，但在措辭上稍加改動為：假如能夠作出讓香港人民滿意的安排，她「準備向議會建議移交主權」。戴卓爾夫人接受了這一建議，此信於 1983 年 3 月 9 日發出。由於此信沒有滿足中方關於談判之前必須就主權問題達成一致的要求，中方沒有立刻作出答覆，過了兩個月才同意開始舉行談判。鄧小平後來對出席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說，他在談判議程的順序上鬆口，是為了讓英國人擺脫尷尬局面。雙方就下一步談判達成的議程是：第一，有關 1997 年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安排；第二，1997 年之前的安排；第三，主權問題。第一次談判於 7 月 12 日舉行，距戴卓爾夫人訪華已經過去了十個月。^[17-68]

為了給談判作準備，同時與香港各界的重要人物建立聯絡，並培養將於 16 年後接管香港的官員，鄧小平認為北京必須向香港派出一名更高級別的黨的幹部。這位派往香港的高官應該被授予相當大的自由，使他能夠與香港各界有影響力的人士公開對話，並直接向北京的最高層彙報。鄧小平需要的人要瞭解北京的想法，要能跟香港的領袖人物平等相處，還要有信心向大陸高層提供全面而坦率的報道。他想到的一個人還是許家屯。

1983 年鄧小平攜家人去上海過春節時，順道走訪了附近的江蘇，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一路陪同。鄧小平之前並不瞭解許家屯，儘管 1975 年鄧在全國進行整頓時，許家屯先是在南京、繼而在江蘇全省的整頓工作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在 1983 年春節見面時，本來的安排是許家屯用二十分鐘向鄧小平彙報江蘇省的發展情況，結果談話持續了兩個小

時。在許家屯的領導下，江蘇的國民生產總值在過去六年翻了一番；他們見面時江蘇的工農業產值在全國首屈一指。作為臨近上海的沿海省份，江蘇也開展國際貿易，許家屯是率先允許發展市場的人，為此還被江蘇一些行事謹慎的計劃幹部到陳雲那兒告過狀。事實上，陳雲曾要求把許家屯調離江蘇，但鄧小平看出他是一個大膽的改革派，堅持把他留在了那裏。

負責高層幹部任免的胡耀邦知道鄧小平十分賞識許家屯，於是在鄧與許家屯春節見面後不久，胡耀邦便向他提議由許家屯擔任香港的新職務。得到鄧小平同意後，1983年4月胡耀邦通知許家屯要把他調到香港全面負責大陸與香港的關係，為1997年的過渡作準備。^[17-69]1983年6月30日，中英第一輪談判結束後不久，許家屯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黨組書記，並被派往香港工作。許家屯的重要職責之一，是挑選香港有影響的人士，邀請他們訪問北京，他們在那兒將有機會見到鄧小平。^[17-70]

為赴任作準備的許家屯前往北京拜訪了他後來要在香港問題上與之打交道的領導人——除鄧小平外，還有李先念、趙紫陽、胡耀邦、楊尚昆、萬里、姬鵬飛和胡啟立。他發現他們全都敏銳地意識到，必須對駐港的中共組織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造才能領導香港的過渡。當時的中共組織成員多是廣州當地人，他們習慣於重複左派口號，幾十年來一直在批評香港商界和政界領袖。這群人在思考香港的未來時也缺乏想像力。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許家屯最終還是將香港的共產黨創造性地轉變成了一個新團體，使它能夠培養富於想像力和親北京的新成員，這些人將在1997年管理他們的故土香港。這些培養中的領導者未必是黨員，但他們願意與新的中共精英合作。

許家屯赴任前拜訪的幹部中也包括廖承志，但他在許家屯上任前的6月10日便不幸去世。後來鄧小平宣佈由李先念和趙紫陽負責香港事務。在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日常工作的是前外交部長姬鵬飛，香港則由許家屯負責。

許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他以這一身份出席公開場合，但他的權力卻來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務委員會書記一職，這也是公開的秘密。他的抵港引起了極大關注，因為他是到那時為止中共派駐香港的最高級別的官員。過去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都是有外交部背景的廣東當地人。許家屯講普通話，他的上任表明香港現在已被中央領導人視為國家大事。^[17-71]

許家屯離京赴香港之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對他說，他應當讓大陸增加對香港的理解。楊由於常在香港過冬，與當地知識界關係密切。作為回應，許家屯聘請楊振寧的弟弟楊振漢在香港組建了一個不大的獨立智庫，為中國官員分析及解釋香港的經濟及學術形勢。許家屯還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帶到香港，以便增進北京對香港及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的了解。

許家屯到達香港時，恰逢中英第二輪談判即將開始，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幫助北京的中方談判人員瞭解當地情況，為下一輪談判作準備。最初很多港人懷疑許家屯要加強中共對香港的控制，對他持有戒心。但是許家屯的開放態度和瞭解香港的真誠願望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他傳遞了這樣一個基本信息，中國將在1997年後收回香港，但是不必為此擔心，一切都會保持原樣。^[17-72]「1997之後會是什麼」這個謎語在當時的港人中間不脛而走，謎底則是「1998而已」。許家屯參觀學校、銀行和公司，經常在各種集會、慶典和體育活動中講話，與窮困市民交談，參觀各種類型的機構。他實際上成了影子港督，而且確實被人非正式地稱為「總督」。在新華社駐港分社的總部，他挑選了一些有前途的當地人加入他的團隊，使團隊人數從100人增加到大約400人。他把他們分成不同的小組，派去瞭解香港政府各個部門和新界的每個民政事務處。他們使許家屯能隨時瞭解所有領域的動態。在接管之前的15年裏，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見習政府」。^[17-73]那些能證明實力的人有望在1997年後擔任重要職務。

許家屯抵港三個月後返回北京，向趙紫陽和李先念彙報了香港的整體氣氛、經濟狀況和當地中共官員的素質。他的觀察讓北京的領導層感到意外。香港的中共黨員長期習慣於投北京之所好，總是大唱讚歌，說港人如何反帝，如何熱切期盼大陸來解放香港。即便那些想討大陸歡心的港商也說，港人是多麼熱情地期盼中共領導的前景。許家屯卻大膽說出了令人不快的事實，他彙報說，港人對共產黨有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們有時感到前途暗淡。^[17-74]他還說，香港華商的主流意見是，他們尊重港英政府和法治，懷疑北京是否有能力為香港提供良好的領導。此外，很多在1949年以後逃離大陸的香港商人認為絕對不能再相信共產黨。他們見識過共產黨在1950年代曾承諾善待與之合作的工商界人士，然而後來卻自食其言，對他們進行迫害，沒收了他們的企業。^[17-75]許家屯的報告讓李先念深感不安，他說，要把重新贏得香港的民心作為頭等大事。^[17-76]

許家屯的報告如同醒腦劑，但它並沒有改變鄧小平要收回主權的全面計劃。在無果而終的第二輪談判後，中國公佈了為1997年後的香港制定的十二條原則，意在提醒英方談判人員，如果在1984年9月之前達不成協議，中方將單

方面準備自己的方案。1983年9月10日，經過第三輪仍陷入僵局的談判之後，鄧小平會見了英國前首相希思。他對希思說，英國想用主權來換治權的策略是行不通的。他說，他希望戴卓爾首相和英國政府採取明智態度，不要把路走絕了，因為任何事也阻擋不了中國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權。鄧小平希望，英國在下一輪談判中應該改變思路，和中國一起制定出保證平穩過渡的方案。^[17-77]

第四輪談判仍然沒有取得進展，隨後港幣幣值跌至歷史最低水平，商店出現了搶購潮，大量資本開始從香港流向海外，有錢的家庭紛紛在加拿大等地購置房產。很多人認為，這是香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柯利達徵得戴卓爾夫人的同意後，建議在一個有條件的基礎上，探討中方提出的應該在1997年後做些什麼的問題。在第五輪談判中，中方對英國表現出一定靈活性感到高興，但仍然懷疑英國是在耍花招，談判依然沒有取得多少進展。^[17-78]

柯利達在第六輪談判中表示，英國真誠希望搞清楚中國在1997年以後的政策，如果能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英方願意在1997年之後放棄治權。這成了談判的轉機。第六輪談判之後，中共的媒體不再抨擊英國的立場。現在輪到中方提出他們的方案了，但是他們在第七輪談判中尚未準備提出新建議。從1984年1月25至26日展開的第八輪談判開始，雙方的會談變得更有成效，英方提供了他們如何治理這個全球化城市的詳細分析，中方把其中的很多內容納入了他們的文件。^[17-79]隨著談判的進行，雖然雙方尚未就主權問題具體達成一致，但中國將在1997年收回主權這一點上已經日趨明朗。

第12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傑佛瑞·賀維（Geoffrey Howe）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小平會談了兩小時。鄧小平強調了一些基本的關注，例如如何阻止英資公司和港英政府從香港撤資，如何阻止港英政府批租土地。鄧小平建議雙方成立一個聯合機構，隨時瞭解香港在1997年之前的形勢；成立一個北京、倫敦和香港官員的聯絡小組，共同處理一切問題。鄧小平對賀維外相明確表示，雖然香港的制度在1997年之後不會改變，但中國將在香港派駐軍隊。^[17-80]他為此也作出了一些程序上的讓步，希望由此可以在9月之前達成協議並且得到英國議會和中國全國人大的批准。賀維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早就明白的事情：「想達成一個能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雖然港人情緒低落，有些人甚至感到意外，但商業界還是鬆了一口氣，不確定因素終於被排除了。^[17-81]

然而，顯然不是每個人都明白了鄧小平的具體意圖。1984年5月25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的全國人大代表時，許家屯告訴他，一些幹部說了一些不符合他的政策的話。前國防部長耿飆對香港記者說，1997年後中國軍隊不會駐紮在香港。鄧小平聽後勃然大怒。他立刻接見了出席全國人大的香港代表和採訪大會的香港記者，向他們澄清任何可能的誤解。鄧小平厲聲說道：耿飆是在胡說八道，他關於將來不在香港駐軍的言論不是中央的意見。中國會向香港派駐軍隊。既然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為什麼不能駐軍？^[17-82]鄧小平很快又在電視上極為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觀點：1997年後中國將在香港駐軍。香港的大眾媒體一向把鄧小平視為務實的溫和派，這次卻被他的強硬講話搞得灰心喪氣，不過，這個問題逐漸離開了人們的視野。中國在1997年確實向香港派出了部隊，不過他們很少離開軍營，他們的存在從未引起多大關注。

1984年，香港正在等待聯合公報的公佈時，三位香港行政局成員飛往北京，表達了很多港人對中國治理香港能力的關切。鄧小平在1984年6月23日接見了他們，他開門見山地說，他歡迎他們作為個人來北京談一談、看一看。鄧小平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承認香港行政局擁有決定香港未來的任何權力。一些香港和英國的官員曾想搞「三腳凳」，讓港、英、中三方都有代表，然而鄧小平擔心這會讓談判變得複雜而緩慢，他明確表示，談判只能在英國和北京之間進行。

在會見中，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鐘士元表示，他懷疑中共下級幹部是否具備處理香港複雜問題的能力。鄧小平厲聲答道，這種觀點無異於說只有外國人能管好香港。他說，這種態度反映了殖民地心態的影響。鄧小平接著對這些人說，他們應當好好瞭解中國人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向他們保證，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將保持50年不變。他又說，作為愛國者，要尊重中華民族，支持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不要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他說，這與相信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甚至奴隸制無關。他還指出，在收回主權之前還有13年時間，中央和香港行政局議員一樣關心這段時間的穩定。鄧小平提到殖民心態後，三位香港行政局的議員不再爭辯。其中一人譚惠珠甚至主動表示，自己也是中國人。^[17-83]

為避免英國在剩下的時間轉移香港財富給社會造成麻煩，鄧小平提議成立一個由中、英、港三方組成的聯合委員會來處理1997年之前的問題。英國擔心這會影響他們有效治理香港的能力，沒有接受這種分散權力的做法。1984年7月，副外長周南向柯利達和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提出另一種選擇：成立一個沒有實權的中英聯絡委員會

以方便溝通。這一想法得到了雙方的同意，於是雙方開始著手起草最後文件。經過從 1983 年 7 月 12 日到 1984 年 9 月 6 日的 22 輪談判後，《中英聯合聲明》終於出台。

鄧小平在 1984 年 7 月 31 日會見外相傑佛瑞·賀維時，雙方就聯合聲明達成的正式協定已是呼之欲出。剛從北戴河度假歸來的鄧小平皮膚黝黑，神采奕奕。140 年來，中國的愛國者一直想收回香港主權，但始終沒有成功。鄧小平在英國的合作下和平達成了這一目標，當然中國很好地運用了自己的底牌。鄧小平甚至說了戴卓爾夫人幾句好話：他說，雙方的協議「為世界樹立了一個解決國與國之間歷史遺留問題的榜樣……戴高樂將軍結束了法國的殖民統治，現在我們可以說，瑪格麗特·戴卓爾首相結束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在慶賀《聯合聲明》的聚會上，鄧小平開玩笑說，他對身邊圍繞了這麼多英國騎士感到高興。一位英國官員記錄下了鄧小平的話：「我們認為英國人民和英國政府是值得信賴的。請轉告你們的首相，我們希望她能來簽署協議；請轉告你們的女皇，我們希望她能來中國訪問。」這位英國官員又說，鄧小平不但態度和藹，而且既熱情又彬彬有禮。^[17-84]次日，雙方正式同意成立聯絡組，分別在北京、香港和倫敦開會。

賀維外相隨後從北京飛往香港，率先宣佈了已經達成協定的消息。他向香港市民宣佈，香港將在 1997 年移交給中國，他們可以放心，香港會繼續保持其現有的社會和經濟制度，他手上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保證香港繼續實行自治。香港和倫敦的媒體都作出了積極反應，民眾也如釋重負，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終於結束了，他們相信內容詳盡的協定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奠定了牢固基礎。賀維外相在香港講話的當天，香港股市出現了自戴卓爾夫人兩年前訪華使股市大跌以來的單日最大漲幅。^[17-85]

隨後由英國外交官衛奕信（David Wilson）和中國外交部官員柯在燦率領的團隊花費了很長時間來敲定協議的細節。9 月 26 日，伊文思（Richard Evans）大使和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了最後文件。中方在附件中詳細列出了有關保留在港英政府工作的外國人和當地官員的十二條計劃。文件還同意保留現行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國際金融中心、海運系統和教育體系。中方同意這些基本條款將保持 50 年不變，而英國在 1997 年之前一直對香港承擔責任。^[17-86]10 月 3 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國慶觀禮團時再次向他們保證，北京的政策不會改變。^[17-87]12 月 18 日戴卓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的儀式上，她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了《聯合聲明》。^[17-88]

隨著《聯合聲明》塵埃落定，中國開始轉向制定《基本法》的工作，它實際上是 1997 年之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法。這部規定了未來北京和特區之間關係的基礎性法律是由中方的一個委員會起草的，該委員會由來自大陸的 36 人和香港本地的 23 人組成。許家屯負責挑選香港的代表，為了爭取那些可能反對中共統治的人，他挑選了香港主流社會中代表不同團體和觀點的重要人物。起草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結束那天，鄧小平為表示對他們的支持，和其他高官一起接見了全體成員並合影留念。^[17-89]

經過此後幾年為起草《基本法》而召開的十次全體會議的協商，所有重大問題都得到了討論：特區首長的性質以及向誰報告工作，立法會如何形成，香港是否擁有終審法院，法院和行政部門的關係。起草人團體高度多元化，有著十分不同的觀點，但是他們努力合作共事，因為他們深信維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是他們的共同利益。很多香港的華商對西方式民主並不比北京的中共領導人更熱心。但香港民眾對中共將如何統治香港十分擔心，因此很多香港起草人都支持李柱銘，他是一名大膽敢言的律師，為香港力爭更多的法律保障。香港的起草人尤其想確保香港高等法院——它因其公正性而在香港享有崇高威望——的裁決不會被北京的政治領導人推翻。為了增強港人對每一個決定的信心，中國領導人同意在每次全體會議後向大陸和香港的記者通報情況。^[17-90]

許家屯提醒過鄧小平和北京的其他高層領導人香港民眾對中共統治持有疑慮，但是港督尤德於 1986 年 12 月 5 日去世後幾周內，香港民眾所迸發出的對英國統治的擁護還是讓北京的領導人感到吃驚。尤德是個工作勤奮而又親民的總督，他的離世使他成為港英政府最優秀的公務員的象徵。當邊境的另一邊正在殘殺和挨餓的時候，他曾在亂世中維持著香港的安寧，因而他也代表了那些為這塊殖民地的繁榮而建立了公正的統治制度的英國官員。香港有數十萬人湧上街頭悼念尤德總督，同時表達他們對其他曾在此任職的英國官員的敬意。很多港人懷疑，1997 年後統治香港的官員能否保持現任政府的水平。

鄧小平意識到港人的情緒很不穩定。1987 年當港人對回歸的恐懼達到高點時，他為了安定人心，未準備講稿就親自到《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發表了講話。有隨行人員帶著痰盂來到會場。他首先說：「我有三個毛病，喝酒、吐痰、抽煙。」^[17-91]他說，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信心不會動搖，否則可能保不住現在的經濟發展勢頭，這反過來對香港也不是好事。他說，但是中國仍會繼續致力於改革開放。香港基本的政治和管理制度將保持 50 年不變。他又說，香港一直以來的制度就既不同於英國也不同於美國，不適合完全採用西方的制度搞三權分立。他然後

具體說明了港人可以期待的個人自由：1997 年以後仍會允許香港人罵共產黨，但是假如把言論變成行動，打著民主的旗號跟大陸對抗，北京就不得不進行干預。不過只有在發生嚴重騷亂時才會動用軍隊。^[17-92]鄧小平的講話直截了當，正是港人所希望聽到的。這番講話緩和了他們的擔憂，甚至結束了有關三權分立的所有討論。^[17-93]

1989 年 2 月 16 日在廣州舉行的起草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對即將公佈的《基本法》草案進行了最後表決。每個委員都要對《基本法》的 159 條逐條進行投票。有幾名委員已經去世，但是出席會議的 51 人中至少有 41 人在草案的每一條上簽了字。鄧小平次日接見了起草委員會，祝賀他們取得的成功。他把他們的文件稱為「富有創造性的傑作」。^[17-94]1989 年 2 月 21 日，《基本法》的初稿被公之於世。^[17-95]

在討論過程中，起草委員會中兩名親民主的委員李柱銘和司徒華試圖讓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由公投產生，但未獲得成功。最後全國人大常委會保留了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北京有權任命行政長官、派駐軍隊和對影響外交及國防的問題作出決定。香港有權保留它的政治制度 50 年不變。它仍將是一個開放的自由港；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享有言論自由，包括批評共產黨的自由；保留它的法院系統和當地法律，只要不影響中國的安全和外交，它有權作出終審判決。主張在香港實行全面民主的李柱銘和司徒華認為，《基本法》是對香港人民的背叛。但是在北京領導人看來，「一國兩制」的政策給予香港的自治權，遠遠超過了任何西方中央政府給予它所統治的地方的權力。^[17-96]《基本法》公佈後，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都得到熱情接受。

可是，表決剛過了四個月，香港的樂觀氣氛便被天安門廣場的悲劇徹底斷送了。香港不久之後將由一個竟敢在街頭向自己人民開槍的政權統治，這個噩夢籠罩了整個香港。1989 年 6 月 4 日，出於對爭取自由的北京抗議學生的同情，也是出於對自身未來命運的擔憂，500 萬香港居民中估計有 100 萬人走上街頭，這是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成千上萬有經濟能力的港人購買海外資產，送孩子出去留學，爭取外國公民身份。「六四」之前進展順利的中英關係也迅速惡化。^[17-97]甚至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工作人員也蜂擁加入抗議人群，而許家屯並沒有處罰這些抗議者。^[17-98]當香港商界領袖包玉剛和李嘉誠在「六四」後不久拜會鄧小平時，鄧依然態度強硬，沒有作出任何讓步。他說，對英國政府一定要硬碰硬。^[17-99]

許家屯在 1990 年 1 月被周南取代。許已經過了 70 歲的正常退休年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為那些批評北京鎮壓天安門示威運動的香港人辯護，而且眾所周知他和天安門鎮壓後被軟禁在家的趙紫陽關係密切。他過去在溝通北京與香港方面成就卓著，但在天安門悲劇之後，北京官員和港人之間出現的巨大裂痕是許家屯所無力彌合的。

周南會講英語，曾經作為外交部官員處理香港事務，他所受到的約束要嚴格得多，並以令人厭煩的照本宣科的方式忠實傳達北京的意見。許家屯在香港多麼深孚眾望，周南在香港就多麼不得人心。幾周後許家屯逃往美國，在那裏獲得庇護權並撰寫了自己的回憶錄。許家屯下台後，新華社很多像他一樣同情抗議運動的人也紛紛被大陸新派來的外事幹部所取代。

「六四」之後不久，中英關係中傑出的問題化解者柯利達秘密出訪北京，旨在避免兩國關係的破裂，這與斯考克羅夫特 (Brent Scowcroft) 及時密訪北京以期減輕美中關係受到的損害如出一轍。儘管天安門悲劇造成局勢緊張，中國外交部長和政治局委員錢其琛與英國外相韓達德 (Douglas Hurd) 仍在繼續密切接觸，力求克服《基本法》中一個已經成為爭論焦點的難題：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普選人數。天安門悲劇數月之後，1990 年 2 月 13 日至 17 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對《基本法》進行了最後表決，全國人大於 1990 年 4 月 4 日通過了《基本法》。^[17-100]

在天安門悲劇之前，英中兩國曾共同努力想實現一個所謂「直通車」的方案，即建立一個能夠順利延續到 1997 年之後的政治架構。在鄧小平退出政壇的 1992 年，英國派了一名重要政治人物彭定康 (Chris Patten) 出任香港新總督。之前在 1987 年至 1992 年擔任總督的衛奕信像他的前任們一樣，是一名熟悉中國的外交官。天安門悲劇引起騷動之後，衛奕信盡力保住了受到中國官員批評的香港新機場等項目，同時悄悄擴大選舉範圍，支持要求更多自由的人。儘管氣氛緊張，他仍能以專業的態度與中國同行維持著工作關係。

彭定康則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方式。^[17-101]他上任前沒有去北京；作為總督他高調鼓吹擴大自由，增加民選議員的數量。他沒有接受外交部資深官員柯利達的意見，後者認為彭定康忽略了中英之間的某些默契。彭定康在整個任職期間與中國官員的關係都極為對立。1997 年中方接收香港後，否定了彭定康的改革，他們譴責英國政府在統治行將結束時通過彭定康搞民主改革，是想強迫中國接受英國自己在統治香港的 150 年裏從未實行過的政策。喜歡彭定康的人說，他盡了最大努力表達香港人民的願望，為了自由勇敢戰鬥，他在這一過程中給香港人帶來的民主經驗，在 1997 年之後仍

是引領他們前進的火炬。香港和北京批評彭定康的人則指責他是在謀取私利——他回到英國後名聲大振，成了一個為自由而戰的人，而那些留在香港的人卻要收拾他在香港和中國之間造成的麻煩。

一些香港居民認為，是彭定康斷送了「直通車」，因為他在香港搞的民主改革並沒有延續到 1997 年之後。但是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儘管有彭定康任內造成的爭議，「直通車」還是存在的。鄧小平通過《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建立起來的制度，確實如他所說得到了落實。中國始終遵守著鄧小平的承諾，允許香港的資本主義和法律制度毫無中斷地繼續存在，允許「港人治港」。大陸城市變得更像香港了，而不是相反。香港居民可以繼續公開批評中共，出版在大陸被禁的報刊雜誌和書籍。香港民選議員的數量增加了而不是減少了。香港為自由和法治樹立起準繩，成為很多選擇在那裏生活的人的保護傘，也為住在大陸的人提供了標桿。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仍像過去一樣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一個崇尚言論自由和尊重法治的城市。

鄧小平經常說，他希望能活著看到香港回歸，但是他在 1997 年 2 月 19 日去世，當時距中國恢復行使主權僅差幾個月。如果他能活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他無疑會為自己在創立「一國兩制」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一國兩制使香港重新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它保留了另一種制度。鄧小平也會同意錢其琛外長對那一天的描述：「主權交接儀式的一整天都在下雨，但是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中國人都會覺得，這是為中國人洗刷恥辱的一場雨。」^[17-102]

遏制西藏的自治要求

鄧小平在 1978 年底成為頭號領導人後，希望設法改善北京領導層與藏人的關係。為此他試圖與一個他認為可能幫助實現這一目標的人重新建立聯繫，此人便是當時與八萬流亡藏人一起住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達賴喇嘛。鄧小平給恢復接觸設了一個很低的條件：1978 年 11 月 28 日，即華國鋒屈服於中央工作會議的新氣氛三天之後，鄧小平對長期向外界傳播中共觀點的著名記者亞奇·斯蒂爾（Arch Steele）說：「達賴喇嘛可以回來，但他要作為中國公民。……對於臺灣和西藏的上層人士，我們的要求就一個：愛國。」^[17-103]同月，鄧小平為了表示他同達賴喇嘛接觸的誠意，下令釋放了一批西藏的犯人。

鄧小平知道，完全消除藏漢對立是不可能的，但他想恢復 1956 年以前北京和西藏之間那種比較和平的關係。1956 年是關鍵的轉折點，這一年在四川藏區開展的「民主改革」點燃了藏人反抗的火焰，並在 1958 年蔓延至西藏地區，直到 1959 年才結束。當時一些最好戰的藏人翻山越嶺逃往印度北部，定居於達蘭薩拉。

毛澤東在 1950 年代曾與藏民建立了相對良好的關係，他在 1951 年讓剛滿 16 歲的達賴喇嘛在統治西藏上享有相當大程度的自由。和漢人聚居的中國其他地方相比，在只佔人口 7% 的少數民族地區，毛澤東願意暫緩對控制權的掌控。而與對待其他少數民族相比，他也願意給藏人更多的耐心，希望能爭取到達賴和其他藏族領導人的積極合作，最終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當達賴及其追隨者在 1959 年逃跑時，毛澤東甚至下令中國軍隊不要向他們開火，希望最終能讓達賴回心轉意。

1950 年 5 月中國軍隊佔領西藏（後來成為西藏自治區）的東部後，毛澤東把西藏領導人請到北京，與漢族官員簽訂了西藏「十七條協議」。據此協議，西藏接受中國對西藏的政治控制，但允許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藏人可以從事他們的宗教活動、保留寺院、使用自己的語言、維持自己的風俗。^[17-104]該協議確立了一個框架，規定藏人接受中國的主權，但中國同意達賴喇嘛無限期治理西藏本土（即後來的西藏自治區），大約 400 萬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這裏。毛澤東同意，只有在西藏地區的宗教和貴族精英同意的情況下，才會對自治區的社會和宗教進行變革。西藏「十七條協議」之後，達賴喇嘛領導的藏人仍然可以徵稅、調解糾紛、使用自己的貨幣、甚至保留他們自己的軍隊；共產黨則控制著外交、軍事和邊防。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之前，西藏在 1950 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為其宗主國時的特點，基本上是藏人治藏，中國政府只管外交。

1954 年至 1955 年，達賴喇嘛去北京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在北京時會見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與他們建立了親密的關係。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也以極大的敬意對待達賴，因為他不但是偉大的宗教領袖，而且是與北京簽訂了正式協定的西藏政府首腦。當時，達賴喇嘛同意成立一個以他為首的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也同意將軍隊減少到 1,000 人並不再使用自己的貨幣，儘管事實上最終西藏的軍隊規模並未被減少，而毛澤東也允許西藏繼續使用自己的貨幣。1948 年至 1950 年，中共在中國的大多數地區都成立了過渡政府，並在一兩年內建立了正式政府。1956 年 4 月

16 日，已從北京回到拉薩的達賴喇嘛以隆重儀式歡迎北京代表團的到來，他們將幫助建立臨時政府的框架，並計劃在兩到三年內變成正式政府。^[17-105]

中國政府與藏人之間的問題爆發於 1955 年以後，這一年全國各省領導人被要求加快農業集體化的步伐。毛澤東說，在條件成熟的少數民族地區也要開展包括集體化改革在內的「民主改革」，但在西藏暫不實行。西藏本土以外的 200 萬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雲南、青海和甘肅等地。四川領導人搞了一個計劃，不但要加速實現農業集體化，而且開始在四川的藏民和其他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主改革」。1956 年，四川藏區開始實行集體化改革，包括沒收一些寺院。這很快在當地引起嚴重的流血反抗，尤其是在集中了大多數四川藏人的康巴藏區。由於康巴的血腥報復和劫掠事件一向層出不窮，當地幾乎每個藏民家中都有槍支並知道如何使用，因而這裏引發的流血反抗尤為嚴重。康巴藏人最初取得了成功，但很快便被更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擊敗，於是他們在 1957 年到 1958 年帶著武器逃入西藏本土。1957 年正值冷戰高峰，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在科羅拉多訓練一小批康巴人，然後派他們潛回西藏搜集情報。^[17-106]北京要求達賴喇嘛將康巴人送回四川，但被達賴所拒絕。印度早先曾邀請達賴去印度定居，於是 1959 年 3 月達賴率領眾多驍勇好戰的藏人翻山越嶺逃往印度。此後的兩三年裏又有藏民追隨他而去。

1979 年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後，他在爭取藏人積極合作時所面對的困難要遠比 1950 年代的毛澤東嚴重。1959 年以後北京為加強控制，向西藏派去大批中共幹部，此舉激起了當地的反抗。文革期間在中國大多數地方，紅衛兵都被視為進行革命運動的小將，而在西藏，由於紅衛兵搗毀寺院和喇嘛廟、破壞藝術品，他們的行為則被看作漢族青年對西藏文化的毀滅。

1979 年之後，鄧小平力求彌合文革在西藏以及其他地方造成的創傷。他理解藏民對其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有著極虔誠的崇拜。他知道達賴喇嘛被藏民看作觀世音菩薩轉世，因此被視為一個神。十三世達賴喇嘛去世後，一個兩歲的男童在 1937 年被認定為轉世靈童，於是成為十四世達賴喇嘛。他精研西藏文化，後來成了極其虔誠而又博學的人。鄧小平 1978 年時希望通過藏族中間人與達賴喇嘛建立聯繫，達成一定的和解，減少中共幹部和藏民之間的對立。

鄧小平本人在 1950 和 1960 年代就與西藏有過交涉。1951 年派往西藏取得軍事控制權的中共軍隊，就是鄧小平麾下的西南軍區和西北軍區。當時藏族軍隊過於弱小，幾乎沒有進行武裝抵抗。1950 年代擔任總書記期間，鄧小平既貫徹過毛澤東對西藏本土較為「寬大」的政策，也執行過在四川等地的藏人中間強制搞集體化的政策。

1978 年，有很多原因促使鄧小平努力減少漢人與西藏少數民族之間的對立。更加安定的民族關係可以加強藏人與中國的紐帶，形成一個堡壘以對抗蘇聯可能對西藏的滲透；可以減少因藏族反抗漢人而觸發其他少數民族連鎖反應的風險；可以減少因為不斷與藏人衝突而給國家資源造成的緊張。大概最重要的是：當鄧小平要為實現現代化而與西方搞好關係時，良好的漢藏關係可以緩解外國人對中國處理西藏問題的方式的批評。鄧小平在 1975 年 12 月會見福特總統時，福特就提到過達賴喇嘛。他在 1977 年 9 月 27 日會見喬治·布殊時，布殊不但特別關心西藏和達賴喇嘛的命運，而且提出去西藏訪問的請求。由於布殊是「中國的老朋友」，鄧小平特准布殊成行。^[17-107]

1978 年底鄧小平開始聯絡達賴喇嘛的中間人。居住在印度的八萬藏民最不認同漢人統治——他們成分複雜，達成一致並不容易，而且與留在中國的很多藏民相比，他們更不願意在重要問題上作出妥協。此外，由於漢人不允許中國境內的藏民組織起來表達自身利益，印度北部達蘭薩拉的這個流亡團體便成為全體藏民的代言人，並且採取強硬的反華立場。

鄧小平和達賴喇嘛溝通的最佳渠道是達賴喇嘛的胞兄、會講漢語的嘉樂頓珠。鄧與嘉樂頓珠的會面是由新華社香港分社第二社長李菊生安排的，李之前在香港已經與嘉樂頓珠接觸過幾周。鄧小平在會見嘉樂頓珠時說，他希望達賴喇嘛能回來看一看西藏，如果願意也可以留下來。達賴喇嘛也可以先派代表，回來考察一下國內的形勢。鄧小平答應嘉樂頓珠，在達賴喇嘛回來之前，中國會做一些政治工作。^[17-108]

1979 年 3 月 17 日，鄧小平會見嘉樂頓珠幾天後，新華社宣佈「西藏自治區司法機關決定對所有參與過（1959 年）西藏暴亂的人給予寬大處理」。^[17-109]同日，在召開了西藏四個地區的會議之後，宣佈為文革期間受到錯判的許多西藏幹部平反。但是鄧小平在推動和解時依靠的是西藏中共幹部的報告，因此他並不清楚藏人反抗的嚴重程度和達賴喇嘛在全世界的巨大影響。在 1979 年 8 月會見美國副總統蒙代爾時，鄧小平對他說：「至於達賴嘛，這是一件小事……達賴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鄧小平又說，達賴想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不過是空想。^[17-110]

當時鄧小平有理由期待西藏的局勢將得到改善。他會見嘉樂頓珠後就作出了安排，由達賴喇嘛派達蘭薩拉流亡者代表團回來考察形勢，會見當地幹部。在此後幾個月裏，又有兩個達蘭薩拉的代表團訪問了中國。然而，給鄧小平出主

意的漢族幹部嚴重低估了藏民對漢人的抵觸情緒和達蘭薩拉藏人的到訪可能激起的對漢人統治的反抗。流亡藏人的一個代表團訪問青海省時，受到當地大批藏民的歡迎，他們欣喜若狂地表達對達賴喇嘛的擁護，這讓北京的官員既吃驚又尷尬。為避免再有不愉快的意外發生，漢族幹部馬上去問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前將軍任榮這個代表團訪問拉薩時會發生什麼情況。任榮預言不會出任何問題。然而，在拉薩爆發出的對達賴喇嘛的擁戴甚至更強烈。

任榮的誤判導致了他被胡耀邦撤職。胡指示讓任榮離開西藏，以免影響與藏人搞好關係的努力。取代任榮的是另一個同為將軍出身的漢人陰法唐，他不久就成了鄧小平在西藏的親信。陰法唐在西藏工作了 20 年，十分關心西藏的建設，從黨委書記一職退下後仍留在當地幫助建設學校。

達蘭薩拉藏人的三個代表團來訪的效果適得其反。鄧小平本來以為，在中共的領導下，西藏自 1959 年以來取得了相當不錯的穩定局面和經濟發展，流亡藏人代表團在西藏的所見所聞會給他們留下正面印象。然而恰恰相反，他們更加嚴厲地批評中國對待藏人的方式。

儘管三個代表團的訪問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鄧小平仍然努力彌合與藏人的分歧。他繼續執行修復西藏寺院和其他文化設施的政策。他指示新上任的總書記胡耀邦及副總理萬里帶領重要代表團到訪西藏，力求修復漢藏關係。

經過一兩個月的準備後，胡耀邦率領一個 800 人的代表團在 1980 年 5 月 22 日抵達西藏，準備於次日參加毛澤東在 1951 年作為懷柔政策提出的西藏「十七條協議」簽署 29 周年的慶典。胡耀邦花了一周時間瞭解情況並與當地幹部座談後，在一個 5,000 人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與會者多數為藏族幹部。他在題為「努力建議團結、繁榮、文明的新西藏」的講話中說：「我們的黨讓西藏人民受苦了。我們十分難過……西藏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顯著改善，我們難辭其咎。」他提出了六項任務：（1）讓西藏人民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2）減輕經濟負擔，三到五年內對西藏人免稅，免徵購；（3）農業生產實行承包到組；（4）努力發展農業和畜牧業；（5）促進教育，著手籌辦西藏大學；（6）加強漢藏團結，把大多數漢族幹部調離西藏，培養更多當地藏族幹部。^[17-111]

胡耀邦的講話是改善北京和西藏關係的一次大膽努力。胡耀邦講完話後，會場上對他這位新來西藏的英雄報以熱烈的掌聲。胡耀邦表現得十分誠懇，他真誠地看待西藏遭受的傷害，代表中共為西藏經受的苦難承擔責任，並說明了將來改進工作的方式。在 1987 年下台之前，胡耀邦一直支持與西藏和解的政策。

在胡耀邦去西藏之前，分佈於各省藏區的軍工廠壟斷著藏民所喜愛的氈帽、皮靴和其他貨物的生產。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後，軍隊的壟斷被打破，西藏政府下屬的工廠也得到允許生產這類產品。在胡耀邦 1980 年訪問西藏後的幾年裏，在提拔藏族幹部、改善藏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步。1978 年時西藏的幹部中只有 44.5% 是藏人，1981 年這一數字上升到 54.4%，1986 年時達到 60.3%。^[17-112]寺院獲准接納少量僧人，藏語得到了正式認可，對祈禱、朝拜和各種宗教儀式的壓制也減少了。

儘管胡耀邦試圖以誠懇的態度解決西藏問題，一年後他的努力仍以失敗告終，這既是因為他同時激起了西藏當地和北京的漢族幹部的抵制，也因為他的努力仍然未能讓藏人滿意。鄧小平受制於漢族幹部，達賴喇嘛則受制於達蘭薩拉好戰的流亡團體，兩人難以架起溝通的橋樑。

在那些努力維持西藏秩序的漢族幹部看來，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評他們對藏人過於嚴厲。為了給當地藏族幹部讓路，一些漢族幹部被調到其他地區，仍留在西藏的漢人大多反對胡耀邦的政策——漢族幹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學藏語，還要傾聽藏人的意見，這使他們難以保持維護政治秩序的權威。負責西藏治安的漢族幹部特別擔心藏人的喇嘛廟，它們在獲得更多的自由之後，成了西藏民族主義的溫床和組織藏人反抗的中心。（據 1950 年代末期的數字，在西藏自治區的全部 200 萬人口中有 15 萬僧人。）北京那些謹慎的幹部也像西藏的漢族幹部一樣，高調批評胡耀邦沒有認識到在外國人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危險。^[17-113]

達蘭薩拉的流亡藏人所要求的自治程度比臺灣得到的條件尤有過之，這是進一步加劇了緊張關係的另一個因素。他們要求在西藏實行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們還要求建立「大西藏」，將中國的所有藏區合併成一個政治上的新自治區。即使是最開明的北京幹部看來，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們認為合理的範圍。因此，談判毫無結果。

共產黨在 1980 年代給予藏人比 1950 年代更多的自治權，允許當地藏民使用自己的語言、服飾，在人民代表大會中有一定的代表。此外中共允許藏人比漢人多生孩子。藏人上高中和大學的入取分數也低於漢人。但真正重要的決策權掌握在拉薩的中共漢族幹部手中，而他們則要聽從北京的指示。

另一個難以克服的分歧是，藏人要求把西藏的疆域擴大到其他省份的藏人居住區。藏人在 7 世紀曾控制著幾乎和當時中國一樣大的區域，此後一些較小的藏民社區便一直保留在四川、青海、甘肅和雲南各省。即使是最開明的漢族幹部，也反對這種藏人對疆域的巨大擴張。

達賴喇嘛看了他派去考察中國藏人狀況的三個代表團的報告，在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後，他於 1981 年 3 月 23 日致信鄧小平說：「我們必須通過更好的相互理解，發展藏漢人民的友誼。」但是他又說：「實際上有 90% 以上的藏人都受到身心摧殘，生活在焦慮之中。這種情況並非自然災害所致，而是人為的。」^[17-114]北京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對此作出答覆。

北京的官員拖了大約四個月，直到 1981 年 7 月 27 日胡耀邦在北京會見嘉樂頓珠時，才表明了他們對達賴此前來信的觀點。胡耀邦在 1980 年去西藏時被授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以贏得藏人的善意。但是這次會見的情況不同：他接到的指示是傳達中國的新政策，要對西藏的分裂活動加強控制。胡耀邦向嘉樂頓珠列出了北京歡迎達賴回來的具體條件：達賴喇嘛可以享有 1959 年之前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訪問西藏；他可以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政協副主席。

藏人知道，接受這些條件可以使達賴喇嘛得到榮譽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政治權力仍牢牢掌握在漢人手中，因此他們拒絕了。達賴喇嘛決定不回國。鄧小平要促成雙方更親密、更積極的關係的努力落空了。但他和達賴喇嘛都不想把關係搞得更僵。達賴在當年 10 月派了一個談判小組前往北京，這個小組雖然也未能彌合分歧，但避免了達賴喇嘛和北京領導人公開決裂。^[17-115]

1981 年至 1982 年的溝通失敗後，鄧小平把西藏問題放到了一邊，直到 1984 年中國國市場化進程得到更廣泛的民眾支持，這為處理西藏問題提供了新的前景：經濟增長和西藏與其他省份不斷加深的聯繫——其中也包括市場聯繫——將成為新的著眼點。1984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6 日——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四年之後——北京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正值鄧小平在廣東宣佈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肯定了進一步開放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獲准去西藏的遊客和外地商人寥寥無幾，而在這次會議之後，商人可以幾乎不受限制地去西藏做生意。鄧小平希望，通過把藏人與全國的經濟聯繫在一起、加快西藏的經濟發展，能像其他地方一樣，增加藏人對政府的擁護。他確實把發展西藏經濟放在了全國重點工作中很優先的位置。中央鼓勵富裕的省份為西藏提供財政援助，派遣懂經濟的幹部幫助推動西藏發展，由此加強西藏和各省政府的聯繫。

作為減少分裂主義危險的一種努力，1985 年有 4,000 名西藏的優秀中學生被送到其他省份的學校以獲得更好的教育機會，俾使西藏和全國其他地方進一步聯繫在一起。1984 年北京與西藏流亡團體也舉行過若干次會談，但未取得任何進展。

這些會談失敗後，達賴喇嘛為打破與北京關係的僵局，試圖通過向西方尋求支持對北京施壓。他向各國派出信得過的年輕人介紹西藏的境況，例如洛地嘉日被派往華盛頓，數十年間都在推動藏人的事業。然而這些年輕人沒有一個能與達賴喇嘛本人的影響力相比。達賴喇嘛會講英語，能夠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動西方人，讓很多西方人覺得那正是他們在自己物質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質。他們把達賴視為一個為爭取民族自由而與中國壓迫者不懈鬥爭的和平主義者。沒有任何其他亞洲領袖贏得過那麼多虔誠的西方追隨者。達賴喇嘛的名望，使只佔中國人口 0.3% 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極大關注，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少數民族，包括那些人數遠多於藏族的少數民族。不過，儘管有外國對達賴喇嘛的普遍支持，沒有任何外國政府正式承認西藏。而在中國政府看來，達賴喇嘛偶爾高調承諾願意接受中國的主權，卻不願意達成對他有約束力的協定。中國逐漸認為他因受制於流亡印度的八萬極端分子而沒有任何談判的空間。通過中共宣傳工具瞭解西藏的中國漢族民眾則相信，中國政府已經提供了慷慨的財政援助，西藏人卻不知感恩。隨著矛盾的加劇、西藏的漢族幹部收緊控制，藏人更把漢族視為壓迫和反對西藏的人。

達賴喇嘛在爭取歐洲人、美國國會議員、人權活動家和外國非政府組織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西藏的僧人變得頭腦發熱，他們大膽施壓要求更多的自治。1987 年 9 月 27 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講話後不久，拉薩僧人的示威演變為一場騷亂。很多藏人樂觀地以為，他們在西方人的支持下能夠強迫中國政府讓步。然而恰恰相反，北京的官員進一步加強了控制。1988 年 6 月達賴喇嘛在歐洲議會演講時重申藏人應當有權決定與西藏有關的一切事務，沒出幾個月，拉薩就在 12 月又發生了一次嚴重騷亂。1989 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了達賴喇嘛，也讓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導致中共領導人收緊控制。

達賴喇嘛在國外的成功使得西藏僧人的反抗有增無減，這促使中國領導人想方設法利用外國團體孤立達賴喇嘛。有些外國團體對中國的壓力作出了讓步，但總體而言，中國的做法反而增加了外國人對達賴的關注，加強了外國對中國的批評。在西藏，僧人日益增多的反抗導致中國官員強化西藏的治安力量，對寺院實行更加嚴厲的管制。

中國官員指責外國人權團體的援助是出於削弱中國的目的。當外國人批評中國不給予藏人更多自治權時，有的中國官員則反唇相譏，說他們的政策要比美國當年驅逐和消滅美洲土著居民的做法人道得多。

鄧小平和達賴喇嘛無法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但雙方都想避免全面衝突。1988年初北京釋放了數位因從事政治活動而被捕的僧人。中國在1988年4月宣佈，只要達賴喇嘛願意放棄爭取獨立的做法，他就可以回西藏居住。達賴喇嘛則繼續說，他接受中國的主權，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人獲得更多自由。

1989年1月，鄧小平為了控制騷亂，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黨委書記——胡錦濤。胡錦濤和不同的幹部談話，但其基本目標反映了鄧小平的政策：發展經濟，擴大漢語教育，加強外部聯繫，和一些藏人展開合作，保持對分裂主義活動的嚴密控制。1989年春天，在北京學生示威的同時，西藏再次發生了騷亂，對此胡錦濤宣佈實行戒嚴。

1989年初，當西藏的另一位宗教領袖、在藏人中信徒人數居第二位的班禪喇嘛去世時，又出現了一線希望。達賴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領袖身份前往北京參加葬禮的邀請。北京的判斷是，達賴總體上比藏人流亡團體態度更靈活，鄧小平或許可以在達賴喇嘛來訪時與他啟動有益的會談。但是達蘭薩拉的流亡團體明白北京的領導人想拉攏達賴，說服了達賴喇嘛不要前往。這次邀請被拒絕後，鄧小平和他後來的接班人便放棄了與達賴合作的努力，使打破僵局變得遙遙無期。有觀察家認為達賴喇嘛錯過了一次在消除分歧上取得進展的良機。此後，雖然達賴喇嘛數次派代表去中國磋商，但雙方都沒有在基本立場上讓步。

1980年代中期以後形成了一種一直延續至今的惡性循環：達賴喇嘛在國外的名望鼓舞著當地藏人反抗，從而導致北京的鎮壓；而外國人知道了鎮壓的情況後會譴責北京，這又鼓勵了藏人的反抗——如此反復不息。但是，藏人和漢人都很清楚始於1980年代中期的對外部市場的開放以及對西藏的經濟援助給西藏帶來的長期後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經濟獨立性的衰落。在1950年代，定居拉薩的外地人多為北京派去的中共漢族幹部和軍隊。1980年代中期以後，居住在拉薩的外地人幾乎全都是商人，他們都想利用中國對西藏的經濟援助所帶來的商機。很多人是來自鄰近窮困省份的回族或其他少數民族。過去外地人幾乎從來不住在西藏的農村，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外地人的數量大有超過藏人之勢。^[17-116]由於越來越多的藏族青年為了自己的前程而學習漢語和接受漢族教育，無論是藏人和漢人都能看到，長遠的趨勢是將有更多的藏人學說漢語、上漢族學校、接受漢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並融入外部的經濟，雖然他們不會放棄自己的藏族身份和忠誠。

自從鄧小平1980年派胡耀邦去西藏以來，中共再沒有作過重大努力使藏人和北京達成和解。流亡藏人與北京領導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續，前者決心建立擁有真正自治權的大西藏，後者則相信通過發展經濟、推動藏人接受漢族的教育和文化，將使西藏進一步融入全國的經濟和文化。一些外國人和北京領導人之間的對立也在繼續，前者想幫助藏人得到更大的自治，後者則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對阻止外國人這些做法的能力變得更加樂觀。

[17-1]關於中國領土糾紛的說明，見 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2]關於臺灣和中美關係的一般背景，參見 Ralph Clough, *Isl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Twayne, 1994);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ichard C. Bush, *Untying the Knot: Making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Michel Oksenberg, "Taiwan, Tibet, and Hong Kong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p. 53-96;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 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3);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 - 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7-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日，頁141。

[17-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9日，頁151。

[17-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9年1月16日，頁164-166。

[17-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9年1月9日，頁467-468；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The Secret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London: John Murray, 1993); LWMOT, tape 19, p.21.奧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卸任後，在1981年秋天到1982年夏天間聚談了39次，記錄下他們在美中關係正常化過程中的經歷。

[17-7]Robert A. Madsen, "Chinese Chess: U.S. China Policy and Taiwan, 1969-1979," Ph.D. thesis, Trinity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1999, pp. 274-275.

[17-8]Tucker, *Strait Talk*, p. 108.

[17-9]與英國前首相希思（Edward Heath）的談話，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年9月10日，頁931-932。

[17-10]Tucker, *Strait Talk*, pp. 132-133.

[17-11]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18-220. 另參見 John H.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An Insider's Account of Normaliz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pp. 197-198.

[17-12]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2nd ed., 1995), pp. 371-372; 《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181-185。

[17-13]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199-201.

[17-14]新華社，1981年9月30日。

[17-1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年6月16日，頁748-749。

[17-16]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 182.

[17-17]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527-531.

[17-18]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4-185;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1-215; Alexander M. Haig, Jr., *Caveat: Realism, Reaga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17-19]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1-215;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6-187.

[17-20]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15-222.

[17-21]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22-226. Holdridge 陪同布殊訪華。

[17-22]類似的解釋見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 240;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90-258.

[17-23]關於協議具體內容的談判是在恒安石大使和中方對等官員之間進行的，中方將談判結果送鄧小平批准。

[17-24]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30–241;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89–200. 三個公報收入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265–272 及 Holdridge, *Crossing the Divide*, pp. 263–279。

[17-2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4 月 28 日，頁 971。

[17-26]2008 年 12 月與美國國防部官員 Eden Woon 的訪談。

[17-27]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pp. 677–679.

[17-28]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 66。

[17-29]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 66。對香港工作的一般介紹，見宗道一等編：《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香港：三聯書店，2007），頁 265–267。我關於香港問題的討論大大得益於衛奕信爵士、Sin Por Shiu 和 Dalena Wright 對香港局勢的深刻見解。

[17-30]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56。

[17-31]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32]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and an Assessment of the Sino-British Negotiation over Hong Kong," unpublished paper,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006; Steve Shipp, *Macao, Chin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Colony's Transition to Chinese Rule*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7).

[17-33]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56–57。

[17-34]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248。

[17-35]作者 2008 年 11 月對 Edgar Cheng 的採訪，他是包玉剛的女婿，經常陪同包玉剛拜訪鄧小平。

[17-36]後來寫就的文件強調鄧小平政策的一致性和連續性；有些文件甚至認為他已經作出香港回歸的決定。但當時公佈的文件不支持這種觀點。當時尚未就這個作出決定。

[17-37]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38–40.

[17-38]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65–66。

[17-39]據中共駐港最高官員許家屯說，1983 年時香港大約有 6000 名中共黨員。見 Jiatun 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50, 93-070, 93-073, 93-091, 94-001, 94-010, 94-016, and 94-017, 1993–1994, 後來結集出版，見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

[17-40]這在許家屯的著作中說得很清楚。許在 1983 年由北京派去香港領導中共的工作，他敢於向北京提供香港 1980 年代初輿情的更準確的報告，中共駐港最高官員許家屯說，1983 年時香港大約有 6000 名中共黨員。見 Jiatun 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50, 93-070, 93-073, 93-091, 94-001, 94-010, 94-016, and 94-017, 1993–1994, 後來結集出版，見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

[17-41]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pp. 14–15.

[17-42]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54–55.

[17-43]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London: John Murray, 1994).

[17-44]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56.

[17-45]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57.

[17-4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1 年 4 月 3 日，頁 729。

[17-47]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17-48]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回歸》，頁 70；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p. 21.

[17-49]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66–67.

[17-50]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67–68.

[17-51]Sin Por Shiu, "The Macao Formula," p. 22. 另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2年5月21日、6月2日、9月24日，頁824、826、854–855。

[17-52]齊鵬飛：〈鄧小平與香港「後過渡時期」的中英外交鬥爭〉，《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59–71。

[17-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2年4月6日，頁812–813。

[17-54]2007年11月作者對唐納德（Alan Donald）爵士的採訪，他於1974年至1977年擔任港府顧問，1988–1991年任駐華大使，曾負責為1982年戴卓爾夫人的訪華作準備。

[17-55]2007年11月作者對唐納德（Alan Donald）爵士的採訪，他於1974年至1977年擔任港府顧問，1988–1991年任駐華大使，曾負責為1982年戴卓爾夫人的訪華作準備。

[17-56]Frank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New York: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1996), pp. 11–12;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85–86.

[17-57]Cradock, *Experience of China*, p. 179. 在她的回憶錄中，戴卓爾夫人用戲劇性的對抗來形容與鄧小平的會面。又見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New York: HaperCollins, 1993). 儘管如此，當時的外交官們說雙方都在正常外交會談的範圍之內表現得慎重、理性。

[17-5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87–88.

[17-59]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8. 作者對唐納德的採訪。

[17-60]SWDXP-3, pp. 23–25.

[17-61]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9.

[17-62]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7.

[17-63]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 11; 對唐納德的採訪。

[17-64]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91–92.

[17-65]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89.

[17-66]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94, 97.

[17-67]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99–102.

[17-6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01–107. Mark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China's Triumph and Britain's Betrayal* (New York: J. Wiley, 1994), p. 64; 對唐納德的採訪。

[17-69]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頁1–12。

[17-70]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13–114.

[17-71]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頁3；許家屯：《許家屯回憶與隨想錄》（Brampton, Ont.: 明鏡出版社，1998）。

[17-72]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13–114.

[17-73]Roberti, *The End of Hong Kong*, p. 155.

[17-74]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May 14, 1993,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56, July 16, 1993.

[17-75]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May 27, 1993,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50, July 16, 1993. 當地一句俏皮話將私營企業形容為「聯合國」，因為這個詞的意思可以是聯接、合併或者國有化，也就是沒收。

[17-76]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冊，頁12–28。

[17-7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3年9月10日，頁931–932。

[17-7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29–132;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p. 19–20.

[17-79]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32–146.

- [17-8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4月18日，頁970–971。
- [17-81]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48–153.
- [17-82]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June 1, 1993, translated in JPRS-CAR, 93-070, September 21, 1993;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92–9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5月25日，頁978。
- [17-83]宗道一等編：《周南口述》，頁263–269; SWDXP-3, June 22–23, 1984, pp. 68–71.
- [17-84]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 154–174.
- [17-85]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63–174;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 27.
- [17-86]《聯合聲明》的文本和附件見 Ching, *Hong Kong and China*, pp. 81–96;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205–223.
- [17-8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10月3日，頁998–999; SWDXP-3, October 3, 1984, pp. 80–84.
- [17-88]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pp. 106–109, 199–204;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125–126.
- [17-8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7月5日，頁1058; 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145–148.
- [17-90]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香港問題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170–171。
- [17-91]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191–192.
- [17-92]SWDXP-3, pp. 214–220;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頁172–173。
- [17-93]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頁185。
- [17-94]SWDXP-3, pp. 340.
- [17-95]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頁198。
- [17-96]Roberti, *The Fall of Hong Kong*, pp. 280–291;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頁166–207。
- [17-97]Qian Qiche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F.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254–255.
- [17-98]Xu, "Selections from Serialized Memoirs," *Lianhebao*, September 3, 1993, translated in JPRS-CAR, 94-015, March 8, 1994.
- [17-9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90年1月18日，頁1306–1307。
- [17-100]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pp. 257–260; 李後：《百年屈辱史的終結》，頁205–207。
- [17-101]彭定康的解釋見 Chris Patten, *East and West: China,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A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8).
- [17-102]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 Diplomacy*, p. 279.
- [17-10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11月28日，頁442。關於這個時期的西藏工作，我發現以下著作對我最有幫助：Melvyn C.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Tashi Rabgey and Tseten Wangchuk Sharlho,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the Post-Mao Era: Lesson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4); 丹曾編：《當代西藏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我也要感謝與 Melvyn Goldstein 的多次交談，他無私地向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傳授有關西藏的知識。另見陳為人：〈胡耀邦與西藏〉，收入蘇紹智、陳一諮、高文謙編：《人民心中的胡耀邦》（Carle Place, N.Y.: 明鏡出版社，2006），頁166–185；

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Mississauga, Ont.: 明鏡出版社，2006）；Barry Sautman and June Teufel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6); 及 Robert Barnett and Shirin Akiner, eds.,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達賴喇嘛在 1992 年 9 月 11 日寫給鄧小平和江澤民的信中概述了對西藏與中國關係的看法，該信見 Andy Zhang, *Hu Jintao: Facing China's Challenges Ahead* (San Jose, Calif.: Writer's Club Press, 2002), appendix 5, pp.133–148. 關於西方對西藏的看法，見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0).

[17-104]Melvyn C. Goldste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98–99.

[17-105]丹曾編：《當代西藏簡史》，頁 132–146。

[17-106]中央情報局官員 John Kenneth Knaus 講述過這方面的計劃，見其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17-10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2 月 1 日–5 日、1977 年 9 月 27 日，頁 134–135、207–208。

[17-10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 年 3 月 12 日。

[17-10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 年 3 月 17 日。

[17-110]Memc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8/27/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Atlanta.

[17-111]鄭仲兵主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卷）（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1980 年 5 月 21、22 日，上卷，頁 482–483。

[17-112]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p. 126.

[17-113]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 207–208。

[17-114]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p. 67.

[17-115]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pp. 69–71.

[17-116]Xiaojiang Hu and Miguel A. Salazar, "Market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ivate Business in Lhasa," in Sautman and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pp. 166–190; June Teufel Drey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und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Sautman and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pp. 128–151; also Xiaojiang Hu, "The Little Shops of Lhasa, Tibet: 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ket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第 18 章

為軍事現代化作準備

1977 年夏天鄧小平復出後，開始著手和葉劍英等老幹部一起為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打基礎。然而未過一年這項工作便被推遲，因為他斷定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必須立刻準備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1979 年 3 月對越戰爭結束後，他認為近期再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對現代化軍事裝備的大規模投入可以繼續推遲，以集中力量搞民用經濟。但是鄧小平確實重新恢復了他在 1975 年啟動的軍隊改進工作：軍隊裁員，招募受過更好教育的軍人，全面加強紀律和訓練。這樣一來，等到他退休的時候，中國不但能具備更強大的經濟基礎，而且會有一支更精幹、更加訓練有素的軍隊，這支軍隊將有充分的準備，可以更有效地運用那些在他退出舞台之後才得以購進的現代武器。^[18-1]

在 1977 年，鄧小平表面上仍要服從尚任中央軍委主席的華國鋒，但實際掌管軍隊的是他和葉帥這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華國鋒當過公安部長，但是除了抗戰時參加過游擊隊、林彪事件後擔任過廣州軍區政委外，並未實際在軍隊工作過，缺少領導軍隊的經驗。以軍事經驗、知識、在軍隊高層中的威望而論，他都無法與鄧小平或葉帥相比。因此，1981 年 6 月當華國鋒正式靠邊站、鄧小平成為中央軍委主席時，這不過是正式承認了自 1977 年以來鄧和葉已在領導著軍隊的事實而已。^[18-2]軍事政策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鄧小平並不迴避中國軍隊的問題。他說：「指揮現代化戰爭，包括我們老同志在內，能力都不夠。要承認這個現實。」^[18-3]他知道中國在軍事技術上已經大大落後，需要調整戰略以應付主要對手蘇聯。他還知道，林彪時期把軍隊幹部派到地方任職，分散了對軍事問題的注意力。

在鄧小平失去權力的 18 個月裡，他對軍隊的擔心並不是「四人幫」會建立穩固的勢力，因為他們只在張春橋領導的解放軍總政治部確有一些根基。這段時期讓他感到的不安的，是浪費了本來可用於整頓和改善軍隊的兩年寶貴時間。1975 年鄧小平和葉帥任命的軍隊領導人並未完成他們早先確定的裁軍目標：原計劃是於 1976 年底之前裁減 26%，但實際軍隊人數只減少了 13.6%。^[18-4]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曾直言不諱地談到毛澤東時期給軍隊造成的問題，儘管他將其歸罪於林彪。

鄧小平在 1977 年分管的工作包括軍事、科技、教育和外交，這使他理所當然地重視提升軍隊的科技水平。他在兩年前就提出要把教育和訓練放到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高度來認識，但當時他沒有機會加以落實。在 1977 年 8 月 23 日的中央軍委座談會上，他重申了這一觀點並強調其重要性。他所指出的提高教育和訓練，不僅是指加強紀律和政治教育，也是要讓軍隊領導人認識到，他們需要怎麼做才能改進自身的專業技術知識、進行軍事演習以準備與擁有現代技術的敵人作戰。^[18-5]

鄧小平和葉帥在 1977 年繼承了以彭德懷為領導的一批軍隊領導人的遺志，這批人在 1950 年代就曾試圖建設一支更加專業化的軍隊，但這個目標從未得到毛澤東的完全認可。^[18-6]彭德懷過去曾想得到蘇聯的技術援助。鄧小平在 1977 年很清楚西方不願意出讓尖端軍事技術，但他一直抱有希望，至少能從西方獲得民用技術的幫助，這也可以間接幫助軍事現代化，甚至能在不放棄獨立的條件下獲得一些軍事技術。

為了達到建立一支專業化軍隊、逐漸為其配備現代裝備這一目標，鄧小平和葉劍英首先要撤掉那些已經變得「軟、散、驕、懶」的人，為老幹部建立退休制度，為裁軍提供一個框架。同時，他們還要大力加強軍事訓練和演習，以確保精簡後的軍隊的戰鬥力。^[18-7]

鄧小平和葉帥要為每個軍事單位選定一個領導班子，讓他們致力於把解放軍改造成一支更加現代化的軍隊。鄧小平希望招募教育水平較高的年青人，包括能夠在新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學習的大學生。為了選拔能幹的青年人，他採用了包括筆試在內的一套錄用標準。

軍事院校是提升訓練的核心。鄧小平說，軍事院校要聘用優秀教師，他們不但要有很高的學術素養，還要有意願來熟悉實際作戰條件，其工作精神能為學員樹立榜樣。^[18-8]1977 年 8 月 23 日鄧小平對中央軍委會說，部隊過去是在戰

鬥中得到鍛煉，根據戰場表現提拔幹部。「現在不打仗，你根據什麼來考驗幹部，用什麼來提高幹部，提高軍隊的素質，提高軍隊的戰鬥力？」^[18-9]

明治時期的日本領導人認為，現代化不僅是學技術，還要進行「啟蒙」。鄧小平也同樣認識到有效的軍事現代化需要新的眼光和全面的知識基礎。因此軍隊開始向一小批有才華的入伍青年教授外語，隨同國內第一批留學生派到國外。他們學習的不是軍事專業的課目，而是更廣泛的課程，如管理、科技、國際關係等等。

同時，對臃腫落後的軍隊進行裁員仍是頭等大事。1977 年 12 月軍隊裁員的新方案準備就緒，中央軍委批准通過了《關於軍隊編制體制的調整方案》，其中描述了現代軍隊需要什麼樣的體制。在 1978 年 3 月 20 日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鄧小平宣佈了讓 50 萬部隊幹部轉業的計劃。^[18-10]

在三中全會上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鄧小平於 1979 年 1 月 2 日第一次向軍隊發表講話，他在中央軍委召開的高級幹部座談會上坦率地說：

我們軍隊成堆的問題——不是這個人那個人的問題，而是機構臃腫，人浮於事。這才是最根本的。現在這種臃腫的狀況，使好多事情辦起來不便利。一個指揮機構打麻將有五六桌，你怎麼辦事呀！——我們的軍隊名譽也搞壞了一點。——我現在實在想當顧問，——但現在不可能。我希望一九八五年當顧問，真的，不是假的。有什麼不好啊？還可以多活幾年。無非是沒有秘書，車子還是有坐的。——幹部年輕化，首先是一些老同志要反對，原則擁護，具體反對。^[18-11]

在消除軍隊的臃腫問題方面，鄧小平取得了顯著進展。他在 1975 年著手啟動這項工作時，中國的軍隊人數是 610 萬人，1979 年降為 520 萬，1982 年又下降到 420 萬，到 1988 年時只剩下了 320 萬。^[18-12]裁軍工作在 1978 年底因準備攻打越南而中斷，而戰爭過後的幾年內仍未能恢復，因為仍要派駐軍隊在中越邊境參與小規模的軍事衝突。

攻打越南：1979 年 2 月 17 日—3 月 16 日

1978 年夏天，蘇聯和越南不斷加強合作，使中國官員擔心越南軍隊可能利用便於調動摩托化部隊的旱季進攻柬埔寨。越南在 1977 年 7 月已經佔領了老撾，而 12 月就將進入旱季。

鄧小平曾對美國人說，為遏阻蘇聯的擴張，必須展示不惜一戰的決心。柬埔寨已經成為中國的附庸國，如果中國對入侵柬埔寨的行為不作出強硬反應，蘇聯和越南就有可能自信地以為它們可以擴張到泰國和馬六甲海峽。如果越南打算入侵柬埔寨，蘇聯很可能會送去更多的人員和軍事裝備幫助它進行侵略。鄧小平堅信，中國必須對越南入侵柬埔寨作出強硬反應。

柬埔寨領導人波爾布特在 1978 年夏天已經認識到越南威脅的嚴重性，他請求鄧小平派「志願軍」幫助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就像毛澤東當年對抗南韓和美國對北韓的入侵一樣。儘管波爾布特對人民的暴政受到西方的強烈譴責，鄧小平還是準備與他合作。鄧小平認為，波爾布特是唯一能夠有效抵抗越南的柬埔寨領導人。

然而鄧小平並不想出兵柬埔寨，他認為這會讓中國陷入代價高昂的戰事而難以自拔，乃至對這個地區的事態失去控制力。他更希望打一場「速決戰」，就像 1962 年中國軍隊在中印邊境取得的成功那樣。他想迅速而短暫地攻入越南，向越南和蘇聯證明繼續擴張將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中國很多高層的軍方和文職官員都懷疑攻打越南是否明智。有些人覺得，中國剛開始搞現代化，把建設現代工業亟需的稀缺資源挪作他用並不明智；有人擔心中國軍隊尚未作好適當準備；還有人從原則上反對進攻一個共產黨友邦；有人認為軍事攻擊將導致越南長期敵視中國。

還有一些官員擔心，這有可能把蘇聯的龐大軍力拖入衝突。鄧小平本人則相信，蘇聯當時處在與美國談判「戰略武器限制條約 II」（SALT II）的最後階段，不太願意因捲入亞洲的陸地戰爭而使談判破裂。^[18-13]但是考慮到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鄧小平徵求了其他老幹部對蘇聯可能干涉的看法。陳雲作了仔細評估後認為，蘇聯在中蘇邊境——這是最有可能進攻中國的地方——的兵員嚴重不足，進攻中國需從歐洲調兵，而這得一個月才能完成。陳雲的結論是，如果作戰時間很短，蘇聯插手的機會極少。

聽了陳雲的評估後，鄧小平宣佈作戰時間不會長於 1962 年攻打印度（33 天）。只打地面戰，不動用空軍。^[18-14]鄧小平知道當時越南飛行員在訓練上強於中國，況且中國也沒有接近越南的機場。再者，避免空戰可減少蘇聯介入的機會。鄧小平仍然很擔心蘇聯可能作出的反應，他從靠近中蘇北部邊境的伊犁撤走了大約 30 萬中國平民，並命令情報人員密切監視蘇軍在邊境地區的一舉一動。^[18-15]

鄧小平遭到了中央軍委其他成員的普遍反對，因為他們覺得中國軍隊沒有作好作戰準備。人民解放軍還沒有從文革的破壞中復原，紀律渙散，訓練不足。除了 1978 年在邊境線上與越南有 1,100 多次小摩擦之外，中國軍隊自 1962 年中印邊境衝突以來從未打過仗；而越南軍隊卻跟法國、南越和美國軍隊打了幾十年仗。他們還擁有蘇聯現代裝備，而且蘇聯在 1975 年美國越戰失敗後一直為越南提供大量經濟援助。^[18-16]

最終，鄧小平的權威和他認為必須對蘇越威脅作出強硬反應的信念，勝過了其他人對打越南的顧慮。北京的一些幹部相信，鄧小平發動並具體指導了這場戰爭是為了使他在掌權後加強對軍隊的個人控制。還有人認為，鄧小平知道美國因為與日本和南韓是盟國而向它們無償提供技術，所以他要向美國表明中國打越南就是要與蘇聯劃清界線，不存在與蘇聯人修好的可能。儘管沒有可靠的證據來證明鄧小平到底如何權衡這些不同的考慮，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鄧小平對越南的野心很惱火，他對蘇聯在該地區的擴張深感擔憂。

廣州和昆明兩大軍區與總參謀部研究了增加邊境駐軍的可能需要。但是直到 1978 年 9 月的中央軍委會議之後，他們才開始制定對越作戰計劃。^[18-17]在這次中央軍委會議上，首先由總參的情報部門通報了中越邊境軍事摩擦增加的情況，兩個相鄰的軍區——廣州軍區和昆明軍區得到命令集結兵力為打越南作準備。從 11 月 23 日開始，空軍、海軍、總參作戰部和情報部的高級將領開了為期一周的會議。會後，東北、華北和西北的軍區全部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嚴密監視蘇聯可能的軍事反應。

11 月，11 個大軍區中有 10 個軍區的軍隊開始向靠近越南的邊境集結，這些軍隊多數來自廣州和昆明軍區。中越邊境長達 1,300 公里，大約一半位於雲南境內，由昆明軍區管轄。另一半在廣西，由廣州軍區管轄。中國軍隊被部署在整個邊境線上，就像國共內戰和南北韓戰爭時一樣，中國軍隊向越南邊境的調動都是在夜間進行，以便做到出其不意。美國方面估計參戰軍隊至少 45 萬，其中包括在中國境內提供後勤支援的人，越南的估計則是 60 萬人。^[18-18]

12 月 8 日，中央軍委下令廣州和昆明軍區在 1979 年 1 月 10 日前作好進攻越南的準備，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 12 月 11 日開始部署部隊。不久後的 12 月 21 日，許世友在臨近越南的廣西南寧設立了總指揮部，在那裏和他的部下制定了具體的進攻計劃。^[18-19]

同時，中央軍委預計越南即將入侵柬埔寨，因而在 12 月 20 日召集了一個座談會，由軍隊領導人細緻評估了越南的動向，並審查了進攻計劃。不出所料，12 月 25 日越南的 12 萬大軍入侵柬埔寨，並在 12 天後佔領了金邊。

除了為進攻越南作準備外，鄧小平還作了外交努力。他分別於 1978 年 11 月和 1979 年 1 月向李光耀和卡特通報了進攻越南的計劃。1979 年 2 月初訪美回國途中他在日本停留，把進攻越南的打算告訴了日本人，勸說日本不要向越南提供財政或其他援助。他在東京時還會見了美國駐日大使邁克·曼斯菲爾德。鄧小平知道他能影響美國國會的觀點，便把已經對日本和卡特說過的話又對他說了一遍：越南和蘇聯計劃包圍中國，中國打越南是要給它一個教訓。^[18-20]

在籌劃進攻越南的那段日子，鄧小平忙於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以及為承擔頭號領導人的責任作準備，但是他仍抽時間領導著與對越戰爭相關的外交和軍事準備工作。戰事一開始，他每天都深度投入到軍事指揮之中。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和薛立泰後來研究鄧小平在打越南中發揮的作用時得出結論說：「無論是這次進攻的戰略思考還是戰爭目的及規模的確定，都是來自鄧小平本人。他選定自己最高級的戰將擔任戰場司令員，動員相關各省支援戰鬥，批准作戰細節，下達作戰命令。這是一場鄧小平的戰爭。」^[18-21]在整個戰事期間，鄧小平一直提供全面的領導——有人說他對中國軍隊的調動熟悉到排級。^[18-22]

就像中國的許多司令員一樣，鄧小平想打一場殲滅戰。當年打淮海戰役時，軍隊的目標是把國民黨軍隊殲滅在長江以北；同樣，鄧小平想迅速攻入越南，以速戰速決的方式殲滅越南軍隊的主力部隊，這次決定性戰役可以使越南威脅中國的能力拖後許多年。越南的軍官曾跟中國人密切合作抗擊美國，對這種戰略自然不會感到意外。他們迅速將主力部隊從中越邊境撤到河內附近，而他們在柬埔寨的軍隊則按兵不動，讓熟悉當地地形和居民的地方部隊和民兵與中國人周旋。

中國軍隊選在越南進入旱季、中蘇北部邊境烏蘇里江上的冰開始融化之後進攻越南，此時蘇聯軍隊無法從北部利用冰面越境進攻中國。^[18-23]2 月 9 日至 12 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作出了進攻決定，2 月 13 日鄧小平會見了他的柬埔寨盟友西哈努克親王。2 月 16 日，距發動進攻只有 17 小時前，由華國鋒主持會議，鄧小平向中央高層幹部通報了作戰計劃。^[18-24]由於華國鋒難以擺脫參與作戰準備過程的干係，因此即便發生嚴重問題，他也無法批評鄧小平。

2 月 17 日黎明，大約 20 萬中國軍隊從分散在整個邊境的 26 個地點同時向越南境內發起進攻。進攻之前中國就在邊境不同地點發動襲擊以分散越南的兵力。中國要用優勢兵力集中奪取俯瞰五個越南省會城市——諒山、高平、老街、河江和老山——的山頭，他們預計幾天之內就能攻下這些地方。

鄧小平的這次入侵行動發生在一個戰略時刻：不到三周之前他剛成功地出訪美國，並在日本作了短暫停留。鄧小平的出訪使蘇聯擔心美國可能向中國提供情報，假如蘇聯採取行動，美國有可能支持中國。布列茲尼夫甚至給卡特打電話，想讓美國保證不會暗中幫助中國。但是卡特向他作出保證後，布列茲尼夫疑心猶在。^[18-25]

中國軍隊一攻入越南後就發現，越南人的有效抵抗超乎他們預料。中國軍官因準備不足而陷入慌亂。入侵的中國軍隊都被安排了具體任務，然而他們缺少情報，與上級通訊不暢，無法迅速採取行動。各部隊之前的協調也很差，供給線拉得太長，只好派一部分軍人回到中國搞物資供應。中國軍隊用炮兵支援部隊推進，試圖集中優勢兵力對付抵抗。然而與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時不同，那時共產黨軍隊能依靠當地老百姓的幫助，而越戰中的越南當地民眾卻在為越南軍隊提供情報和後勤支援。

中國預計一周內拿下全部五個省會城市，但直到開戰三周後他們才攻下諒山。而最慘烈的戰鬥就發生在諒山附近，中國軍隊在這裡集中兵力要取得對通向南邊河內的要道的控制權，向越南人表明他們可以威脅到越南的首都。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了五個省會，但傷亡人數遠高於越南。據估計，中方在這次戰鬥中有 **25,000** 人陣亡，**37,000** 人受傷。^[18-26]

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國立刻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的基礎設施。鄧小平曾保證，戰鬥不會長於1962年33天的中印戰爭。中國軍隊從越南撤軍始於3月6日，3月16日完成撤軍行動，距離入侵時間不過29天。^[18-27]

在入侵越南之後的宣傳中，無論對內對外，中方都把它稱為「自衛反擊戰」。中方辯解說，這是對1978年越南人在邊境多次襲擊作出的回應。駐紮在邊境地區並要對付越南人襲擊的軍官以及他們的上級，都不難理解「反擊戰」的必要。還有些中國官員也像鄧小平一樣，為越南不顧中方警告對華人進行迫害和驅趕感到憤怒。但是也有一些中國高級軍事將領從未對這場戰爭表示支持。

鄧小平聲稱中國已經給了越南一個教訓，但西方的軍事分析家在評估了這場戰爭後認為，事實上是久經戰火考驗的越南人給了中國一個教訓。^[18-28]正如軍事分析家所指出的，這場戰爭暴露出中國軍隊除了缺少現代武器外，還有很多弱點。中國軍隊從11月到次年2月匆忙開戰，意味著它沒有作好充分準備。中方的指揮和控制功能薄弱，而且缺少準確的情報。具體說來，兩大軍區的指揮部在越南作戰時缺乏相互協調，互相不瞭解對方的行動；它們分別給下級單位下達任務，卻不知道另一方的下級單位在做什麼。解放軍很難為它的表現感到自豪；有些司令員抱怨說，應當允許他們一直打到金邊，奪取全面勝利。軍隊的很多將領，包括葉帥和粟裕在內，雖然沒有公開說出自己的觀點，但他們完全反對打這場仗，他們覺得中國受到的包圍還沒有危險到非要發動這次進攻。^[18-29]民眾也有自己的懷疑：北京民主牆上的一些大字報指出了中國軍隊的糟糕表現，有些人甚至批評鄧小平發動這場戰爭。^[18-30]

但是，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對外國客人，鄧小平都說中國完成了它所宣佈的攻佔五個省會城市的軍事目標，更重要的是達到了整體戰略目的，即向蘇聯和越南表明，蘇聯在這個地區進一步擴張要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李光耀認為：「西方媒體認為中國的懲罰行動是失敗的。但我相信它改變了東亞的歷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們越過柬埔寨再進攻泰國，中國將會發動攻擊。蘇聯人不想在亞洲一個遙遠的角落陷入長期戰爭。」^[18-31]事實上，蘇聯九個月後對阿富汗的入侵確實給蘇聯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此，即使中國沒有進攻越南，此後蘇聯在東南亞擴張的危險也會變得很低。

中國軍隊的官員試圖掩蓋戰爭成本，但1979年的國防經費支出是223億元，大大高於1978和1980年；與越南接壤的省份所承受的負擔使這場戰爭的成本更高。西方分析家估計，僅戰爭的物資裝備成本一項就高達55億元。^[18-32]外交人員關心的則是另一種成本：這次進攻使中國難以站在一個有原則的立場上批評西方干涉別國內政。國內批評對越戰爭失敗的意見未見公開，而中國和越南在1990年代恢復關係時一致同意不再提過去的衝突。^[18-33]官方的三卷本《鄧小平軍事文集》收錄了他從1978年到1979年的26篇講話，其中只偶爾提及中國的對越戰爭，但沒有一篇講話與這場戰爭直接有關。^[18-34]有些中國人把攻打越南稱為「中國最後的戰爭」。鑒於中國沒有關於這場戰爭的公開討論，不妨把它稱為「中國被遺忘的戰爭」。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對攻打越南是否明智表示過懷疑。但戰爭之後，鄧小平確實利用軍隊在越南戰爭中的糟糕表現強化了他自1975年就開始的工作：讓無能的軍官退休，嚴肅紀律，增加軍事訓練，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軍官。他指示解放軍認真分析戰爭中暴露的弱點。中國軍隊終於開始正視美國軍事分析家指出過的很多問題：戰爭前後情報質量低下，各單位之間通訊不暢，裝備質量差，軍隊領導沒有能力提供全面協調。^[18-35]

戰爭之後，鄧小平指示中國軍隊在中越邊境駐紮大量軍隊，對越南人進行騷擾。正如鄧小平對到訪的美國參議員傑克遜（綽號「鏢車」）所說，他要殺一殺越南人的氣焰，繼續教訓一下他們膨脹的野心。^[18-36]此後幾年裡，至少有 14 支師級部隊被選派輪流駐守於中越邊境附近老山的中國一側。^[18-37]越南則在它的北部邊境駐紮了 80 萬軍隊以防中國進攻。越南人口大約只有中國的二十分之一，它在此後十年為保衛其邊境耗費了大量資源。

在此期間，中國利用中越邊境上不斷的小型衝突來訓練自己的軍隊，衝突的規模偶爾能達到動用一個師的兵力。在 1980 年代，中國大多數步兵部隊都曾被輪流派往邊境參與小型衝突。有軍事分析家指出，與世界上最驍勇善戰的地面部隊打仗，為中國軍隊提供了極好的訓練。大量中國軍隊的駐守也使蘇聯在為越南提供更多援助時變得更加謹慎。

越南對較弱小的東南亞國家的威脅，加強了後者與中國合作對抗這種威脅的願望。越南的侵略行為也導致東南亞各國加強了東盟組織的合作。^[18-38]當越南在 1984 年奪取柬埔寨一條通往泰國的要道而威脅到泰國的安全時，中國發動了自 1979 年以來最大的一次邊境攻擊，迫使越南人撤退。^[18-39]鄧小平在 1979 年攻打越南以及在中越邊境不斷進行的軍事活動，增強了其他東南亞國家抵抗越南野心的信心，它們知道中國會像幫助柬埔寨和泰國那樣幫助它們。

就像下圍棋一樣，鄧小平要阻止蘇聯和越南佔據有利空間圍住中國，同時又要護住自己的眼位。他在 1984 年盡力護住了眼位，阻止了越南進入泰國進而染指重要的馬六甲海峽。在鄧小平看來，到 1980 年代初時，包圍中國的威脅已經被消除。

越南對柬埔寨的佔領和中越邊境不斷的軍事摩擦讓它不堪重負。早在 1979 年 8 月鄧小平會見來北京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蒙代爾時就已經看到了這種可能。他對蒙代爾說：「越南現在的處境還不算太難，不會接受政治解決。或許，越南人的麻煩多到無法承受時，他們就會接受了。」^[18-40]他對蒙代爾說，越南背著沉重的雙重負擔，它要佔領柬埔寨，又要在中越邊境維持一支 60 萬到 100 萬的大軍，越南人遲早會認識到，蘇聯不可能滿足他們的所有請求。

鄧小平的話是有遠見的：1988 年越南從柬埔寨撤走了一半軍隊，第二年又撤出了其餘的軍隊。越南未能實現它稱霸東南亞的野心。鄧小平退休時越南已不再威脅東南亞各國，而是開始謀求與諸國建立友好關係。1980 年代初，正是由於越南對這個地區的威脅才導致東南亞各國加強東盟合作。有意思的是，1990 年代越南自己也開始努力與東盟改善關係，並在 1995 年被接納為東盟的成員國。

減少蘇聯的威脅

毛澤東曾說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鄧小平有時也重複毛的這個說法。但在解放軍從越南撤兵後，他有理由變得更加樂觀：中蘇開戰的危險本來就不大，在他的努力下又進一步降低了。早在 1977 年 12 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會上講話時就說過，由於蘇聯仍在忙於擴大它的戰略部署，美國則處於守勢，因此「可以爭取延緩戰爭的爆發」。^[18-41]進攻越南時有一點已經變得很清楚——中國決心捍衛它在東南亞的利益，這使蘇聯不敢在東南亞貿然與中國對抗。東歐的問題、漫長的中蘇邊境線、再加上鄧小平攻打越南九個月後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這些事已經讓蘇聯人疲於應付，而且由於中國已同美國實現邦交正常化，蘇聯領導人拿不準如果它進攻中國，美國是否真的會袖手旁觀。

鄧小平通過展示中國的決心，打消了蘇聯急於在越南建立軍事基地的想法，他接著又開始進一步緩解與蘇聯的緊張關係，以便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18-42]短暫的對越戰爭剛結束，鄧小平就指示外交部長黃華「就懸而未決的問題與蘇聯進行談判，改善兩國關係，簽署相關文件」。^[18-43]中國從越南撤軍剛過兩周，黃華外長就在北京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謝爾巴科夫（Yuri Scherbakov），提議就兩國關係正常化舉行新的一輪會談。^[18-44]從 1979 年 4 月到 10 月中旬，中蘇兩國為改善兩國關係舉行了五次副外長級的會談。中方在這些會談中表示，希望討論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和兩國的貿易與科學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阻礙。^[18-45]

1979 年 8 月 29 日第一個中國代表團赴蘇聯之前，鄧小平指示說，代表團要向蘇聯轉達改善中蘇關係的兩個條件：一是蘇聯要從蒙古撤出軍隊，二是不幫助越南佔領柬埔寨。鄧小平還建議雙方同意不在邊境地區駐紮軍隊。他指示王幼平，中國代表團不能示弱，不要急於達成協議。他說，來個馬拉松也沒關係。^[18-46]

從 1979 年 9 月 25 日到 12 月 3 日，中國代表團與莫斯科的對手舉行了數輪會談。對於中方一直立場堅定的兩個條件，蘇聯並沒鬆動，但兩國 20 年來第一次舉行的這些談判是在友好氣氛中進行，蘇聯給予了熱誠的接待。雙方一致同意，蘇聯將派代表團去北京做進一步的會談。^[18-47]

莫斯科會談幾周之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使蘇聯代表團出訪北京被推遲，但也進一步降低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可能。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不久，鄧小平加上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第三個條件，蘇聯必須從阿富汗撤軍。要等到將近十年以後蘇聯才打算同意這三個關係正常化的條件，但鄧小平並不著急。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短期目標：減少與這個他認為最危險的超級大國發生衝突的危險，使中國可以集中精力發展民用經濟。^[18-48]鄧小平在 1980 年 3 月的一次重要講話中說：「冷靜地判斷國際形勢，多爭取一點時間不打仗還是可能的。」^[18-49]不久之後鄧小平說得更具體，他說，中國有能力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內避免戰爭的危險。^[18-50]

鄧小平為緩和蘇聯關係緊張所作的努力使蘇聯更容易以同樣的姿態作出回應。1982 年 3 月 24 日，布列茲尼夫在塔什干講話中承認了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並表示願意與其改善關係。鄧小平對這種語氣的變化很快作出了反應，他指示錢其琛外長對這一講話作出積極的回應。鄧小平斷定，蘇聯要極力趕上美國的軍力發展，又佔領著阿富汗，它感到緩和蘇聯關係符合它的戰略利益。^[18-51]布列茲尼夫在不久後的 11 月 10 日去世時，鄧小平指示黃華參加了他的葬禮，這是要與蘇聯修好的又一個姿態。^[18-52]

除了與蘇聯談判之外，鄧小平還試圖把美國拉進來以降低蘇聯和越南擴張的危險。他知道美國當時沒有興趣捲入亞洲的地面戰爭。為了不使蘇聯稱霸越南附近的海域，如果能讓一家美國石油公司在那裡鑽探石油，豈不是一著妙棋？1979 年 1 月之後，作為經濟調整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減少了與國際石油公司合作的計劃。1979 年 3 月 19 日，中國一個石油代表團訪美期間僅簽訂了一份合同，而合作方就是美國的阿科公司。它是唯一一家提議在海南和越南之間鑽探石油的美國公司。中國授予阿科公司在南中國海的一個區域專享的勘探權，那裡距越南的飛機航程只有不到 30 分鐘。既然有一家美國大公司在近海搞石油項目，鄧小平有理由預期蘇聯對越南港口的使用會更加慎重。中方在中國軍隊撤出越南三天後簽訂了這份合同。

鄧小平還要確保中美安全合作引起了蘇聯的注意。當裝載著監視蘇聯核武器動向的美國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的停機坪時，中方讓飛機停靠在蘇聯航空公司的飛機旁邊，有意使蘇聯明白那是什麼設備；當這些設備運往靠近蘇聯邊境的新疆時，中方故意不加隱瞞，意在讓蘇聯不敢對中國貿然發起可能把美國牽扯進來的攻擊。

和美國的軍事合作

鄧小平從未表示過他有跟美國結盟的考慮，就像過去的毛澤東一樣，他希望中國在安全問題上完全獨立。但他確實想通過中美合作獲得更多現代軍事技術。事實上，1979 年 1 月鄧小平會見卡特總統時，就提到過從美國轉移軍事技術的可能性。從中國進行越戰準備直到作戰期間，卡特都顯得並不願意合作，但鄧小平從越南撤軍後，有關這種合作的會談有所升溫。鄧小平沒有表現得很急迫，但每次有機會他都會提到分享軍事技術的問題。美國注意到了這一點：當鄧小平在 1979 年 8 月底會見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對於美國決定不向中國提供高速計算機感到失望時，蒙代爾答覆說，美國準備了一份能向中國但不能向蘇聯出售的技術清單。^[18-53]

蒙代爾極為成功的訪華之後，美國決定派國防部長哈樂德·布朗去北京討論安全問題。這次訪問計劃有助於推動技術轉移的進程，儘管美國不會向中國出售尖端武器，但同意以個案方式考慮出售若干軍事設備——蘇聯在 1979 年 12 月入侵阿富汗，這支持了那些希望通過加強美中合作向蘇聯施壓的人。1980 年 1 月國防部長布朗抵達北京時，中方已研究了美國在武器出售方面的相關決策程序，搞清楚了美國考慮向中國出售技術的範圍。中國向美方提供了他們希望得到的技術的清單，並同意以商業方式評估具體個案。為了強調美國在向中國實施技術出售上的積極考慮，布朗舉出了向中國提供陸地衛星 D 型（Landsat-D，一種收集自然資源信息的衛星）的例子，美國後來把它提供給中國而沒給蘇聯。在這次會談中雖然取得了一些合作上的進展，但中方並不想依靠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他們仍然拒絕美方關於增加磋商和軍艦互訪的建議，不接受兩國建立熱線電話。^[18-54]

國防部長布朗對鄧小平解釋說，蘇聯過去一年的一些行動在美國民眾眼中是負面的，美國目前正加大國防投入，加強太平洋艦隊，在中東增加兵力佈署。鄧小平在 1978 年 5 月就曾對布熱津斯基提出意見，認為美國未對蘇聯的舉動作出足夠的回應；他在 1980 年 1 月又向布朗表示，他贊成美國現在更積極地應對蘇聯的威脅。但是鄧小平說：「如果這事做得更早一點，那就更好了。……我個人的判斷是，長期以來西方沒有對蘇聯的行動作出有效的反應。」他說，他不反對與蘇聯簽訂條約，但是這對限制蘇聯沒有多大價值：「對付蘇聯只有一種方式」，這需要的就是展示武力。鄧小平在會見中還提到另一些問題。他很高興美國現在開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這是他早就主張過的。他認為各國應當向阿

富汗提供幫助，使其成為蘇聯的泥潭，就像他在邊境牽制住越南人一樣。他婉轉地提醒布朗中國在購買戰鬥機方面的興趣，說：「我不會再提購買 F-15 或 F-16 戰機的事」，但他補充說，「技術轉移的範圍太窄了」。^[18-55]

副總理兼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飆被選定回訪華盛頓。耿飆在江西蘇區、長征、抗戰和內戰期間一直在軍隊工作。1950 年至 1965 年他擔任過大使（在斯堪的納維亞、巴基斯坦和緬甸），任職時間長於其他任何中國外交官。1980 年 5 月耿飆在華盛頓與卡特總統以及萬斯國務卿的繼任者埃德蒙·馬斯基（Edmun Muskie）會面，但他的主要東道主是國防部長布朗。他和布朗國防部長探討了假如蘇聯從中東向印度洋和東南亞方向擴張，美中兩國對蘇聯威脅作出有效反應的具體方式。耿飆的言論反映著鄧小平的觀點，他說，中國在邊境一帶成功牽制了 60 萬越南軍隊，這既削弱了越南控制柬埔寨的能力，也阻止了越南控制馬六甲海峽。

耿飆訪美之行完成時，兩國間的技術交流開始起步，在戰略問題上也有了更廣泛的合作基礎。這些會談也使中國後來有了向美國派出中國軍事院校代表團和軍事後勤專家的安排。美國陸海軍高層官員也回訪了中國。^[18-56]中美兩國的軍隊交流在 1980 年代迅速增多，包括中美國防部長的互訪，美國向中國的技術轉移和武器出售，以及學術專家和考察代表團的互訪。雖然這些互動無法跟美國與日本和南韓軍事交流的層次相比，但雙方確實形成了良好的工作關係。這些交流因 1989 年的天安門悲劇戛然而止，直到 20 年後也未能完全恢復。

推遲軍事現代化

在鄧小平認為同蘇聯交戰的可能性減少後，他開始不再把國家資源投向軍事現代化，而是轉向其他三個現代化，尤其是陳雲倡導的優先領域——農業和輕工業。軍事現代化可以等一等。1979 年 3 月 19 日，中國從越南撤軍三天後，鄧小平在中央軍委科學技術裝備委員會的會議上說：「看來，世界大戰十年打不起來，不必那麼急。現在軍隊的數量也太大，首先要將規模縮小……不要項項都搞，要集中搞幾項。」^[18-57]鄧小平眼光長遠，但他或許還是低估了中國現代化所需的時間，儘管中國發展迅速。他談到要在 2000 年實現現代化。

然而軍隊高層並沒有那麼多耐心。很多人自 1950 年代以來就等著獲得現代軍事裝備，而他們屢屢失望，先是因為大躍進和文革，現在則是因為鄧小平要先搞民用經濟。鄧小平必須對失望的軍官一遍遍作出解釋，為什麼首先發展民用經濟、再搞軍事現代化是符合國家利益的。鄧小平有資深的軍人背景，因而他大概是當時唯一一個具有權威、決心和政治技巧並能以此避免這些軍官對政策發起嚴重抗議的領導人。

在 1979 年和 1980 年初這個關鍵時期，鄧小平仍然擔任總參謀長，身邊是一群既對過早退休的前景不快、又對新武器研發將被拖後的消息不滿的將軍們。此後，接任總參謀長一職的楊得志，也接過了繼續解釋為何要推遲軍事現代化先搞好民用經濟的責任。楊得志承認：「廣大官兵……希望迅速改變我們的經濟、軍事技術和裝備落後的狀況……這種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國防現代化迅速取得很大進步是不可能的。」^[18-58]曾短暫擔任過國防部長的耿飆和 1982 年被鄧小平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張愛萍（1975 年後一直主管軍事科技工作）也得向不滿的軍隊幹部解釋鄧小平的戰略。張愛萍在 1983 年 3 月說得直截了當：「軍隊要考慮其他部門的需要……把預算嚴格控制在有限的資金所能允許的範圍以內。」^[18-59]

因此，整個 1980 年代中國政府一直在減少軍費在預算中所佔比例。儘管中國的數據不完整——因為它不包括軍事工業的收入和預算外收入，但根據官方數字，軍費開支從 1979 年開始改革時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4.6% 不斷下降到 1991 年的 1.4%。^[18-60]1980 年代，中國購買外國武器的花費只及越南的六分之一、臺灣的一半，但中國的人口卻分別是越南的 20 倍和臺灣的 50 倍。^[18-61]此外，考慮到 1980 至 1989 年的通貨膨脹為 100%，美國分析家估計這十年的國防預算名義上增加了 30%，但軍隊可以使用的資金其實是下降了。^[18-62]

鄧小平的軍隊領導班子

所有中共領導人都不斷說「黨指揮槍」，但毛澤東和鄧小平很清楚，在關鍵的權力鬥爭中軍隊主要領導人的忠誠至關重要。因此鄧小平既要通過正式制度控制軍隊，也要抓個人控制。他對自己未被任命為總理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但他認為在制度上獲得對軍隊的控制權十分重要。1980 年 12 月華國鋒靠邊站後，鄧小平成了中央軍委主席；這一職

位使他對軍隊事務掌握著無可挑戰的控制權。1987 年鄧小平放棄了黨的副主席和副總理的職務，但他一直保留著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直到 1989 年秋天才把它轉交給江澤民。

鄧小平選拔黨政官員時任人唯賢，不管他們的來歷、親疏或是由什麼人推薦。對軍隊高級職務他也是選賢任能，但個人忠誠也同樣重要。軍隊中最可靠的人際關係是內戰時在同一野戰軍服役的戰友關係。就像林彪用了很多四野的人擔任軍隊最高職務一樣，當鄧小平在 1980 年能為各軍兵種任命自己的班子時，11 個大軍區中有 5 個司令員是他在二野的同志，包括至關重要的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18-63]鄧小平在擔任最高軍事首長期間一直依靠自己過去的部下。1980 年代後期的中央軍委六名非文職成員中有一半是二野的人，包括國防部長秦基偉和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另外三個位置中三野和四野各有一人。^[18-64]鄧小平在 1988 年授銜的 17 名將軍中有 10 人來自二野。

擔任軍隊關鍵職位的，即便不來自二野，也是對鄧小平抱有個人忠誠的人。華國鋒正式卸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1980 年 12 月）後，鄧小平任命楊尚昆擔任了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也是四川人，比鄧小平小三歲，1956 年到 1966 年鄧小平擔任總書記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與鄧有過密切的工作關係。長久以來達成的信任使他與鄧交往自如。楊尚昆在 1982 年 9 月被提拔為負責日常工作的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他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實際上成了鄧小平在中央軍委的代言人，他代表鄧小平的觀點，向鄧小平彙報軍委其他成員的看法。鄧小平相信楊尚昆能管好軍隊，這使他得以脫身去處理其他問題。

1980 年 2 月，鄧小平完成權力過渡、任命了自己的人以後，遂辭去總參謀長職位，將軍隊的日常工作交給了楊得志。楊得志在攻打越南時曾指揮昆明軍區的軍隊，對鄧小平忠心耿耿。1982 年鄧小平任命張愛萍擔任國防部長；由於林彪墜機後國防部長一職的權力被削弱，又任命張擔任了中央軍委副秘書長。1975 年張愛萍在鄧小平手下工作時曾經卓有成效地搞過軍事科技計劃。他對高技術武器研發的戰略意識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使他成為為中國軍隊遴選重要項目、為高技術研發打基礎的最佳人選。

擴大國防戰略

鄧小平從毛澤東那裡繼承的國防戰略，嚴重依賴於兩種極端方式的結合：「人民戰爭」和核武器。「人民戰爭」是指動員地方民眾騷擾和消耗裝備更精良的入侵之敵，這在抗戰時期曾被有效地用於對付日本的長期佔領。它也使蘇聯在 1969 年進攻中國時不敢長期佔領，而且確實仍是讓蘇聯不敢再發動進攻的一種有效方式，從而使蘇聯進攻的可能性變得更低。由於缺乏雄厚的經濟基礎，毛澤東不能指望在所有領域實現軍事現代化，所以他把資源集中用於他認為最關鍵的領域：導彈和核武器（中國於 1964 年試爆第一顆原子彈，1967 年試爆第一顆氫彈）。^[18-65]毛給自己的繼承人留下了一個不大的核武器庫，它在數量和技術質量上都無法與美國或蘇聯相比；還有一些中程導彈和衛星技術（中國在 1970 年發射了第一顆衛星）。^[18-66]導彈、衛星和潛艇的研究在文革期間普遍受到保護。^[18-67]儘管如此，中國的軍事技術在文革時期只取得了有限的進步，大大落後於互不示弱而有巨大軍事投入的美國和蘇聯。

鄧小平上台時，蘇聯在遠端戰機和導彈上取得的進步，使毛澤東從邊境遷往內地的「三線」工業頓顯其防禦能力不堪一擊。但和過去的毛澤東一樣，鄧小平相信即使敵人擁有佔優勢的軍事技術，「人民戰爭」和核武器的威脅可以降低中國受到攻擊的可能性。但是中國也要針對蘇聯的技術進步作出調整。^[18-68]鄧指示中國軍隊要作好準備，打一場「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這一概念由淮海戰役的功臣、後來領導研發先進武器的粟裕於 1977 年提出。在 1980 年秋天的一次會議上，中國的軍事領導人開始就中國的戰略指導路線形成了共識，即不再被動地誘敵深入，而是準備進行更為積極的防禦。^[18-69]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在 1981 年 6 月比較具體地闡述了「現代條件」的含義。在受到全面軍事入侵的情況下，就像毛澤東時代一樣，要用人民戰爭去消耗敵人。但是宋時輪說，還要有另外一些對策，因為中國不能放棄城市，也因為現代技術需要更長的供應線、對工業基地的保護、陸軍和空軍等多兵種的協作、更強的專業化。因此，（1）解放軍要用陣地戰阻擊敵人，使其無法深入中國腹地；（2）不但要以步兵，而且要用包括空軍在內的多兵種對抗敵人；（3）要準備保護戰場之外漫長的後勤補給線；（4）軍隊應當放棄毛澤東時代由政委承擔的政治工作，把這些工作移交地方，軍隊只集中精力完成軍事任務。這些分析並不是由鄧小平提出的，但是他支持解放軍為了適應這些「現代條件」，而對現有指導思想、體制、訓練和徵兵方案進行調整的努力。^[18-70]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並沒有參加美國與蘇聯的專家投入大量精力開展的那些關於如何阻止核戰爭的複雜討論和計算。但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赴國外攻讀西方戰略思想的研究生和青年學者陸續回國，開始向國內介紹這些更加深奧的

新知識。自從發展出核武器以後，中國一直在計劃獲得二次打擊能力。隨著新知識的引入，現在他們拓寬了思路。中國不再只強調「人民戰爭」和核打擊，開始考慮發展能防止戰爭升級為全面核衝突的有限核打擊和戰術核武器的可能性。

[18-71]

鄧小平從毛澤東那兒繼承下來一支海軍，它規模很小，而且已經完全過時。1975 年鄧在毛手下主政時，蘇振華領導的海軍提出過一個新的發展計劃。1978 年之後，由於對外貿易尤其是石油、無煙煤、和鐵礦石進口的大幅增長，中國的計劃幹部開始更加關心保障中國海上運輸線的安全。中國還開始了在渤海灣和南海擴大海上能源的勘探，這使得保護有爭議海域的勘探成為必需。^[18-72]但是當中國開始考慮發展應對這些新挑戰的能力時，鄧小平卻要求有所節制。他在 1979 年 7 月對海軍幹部的講話中，仍對發展海軍的計劃作了限制，他說，海軍的作用是防禦性的，旨在保護中國近海，中國沒有任何稱霸的野心。^[18-73]

甚至在十分優先的軍事領域——導彈、衛星和潛艇——重點也仍是放在技術研發而不是大規模的生產上，只期望在必要時能夠迅速生產更多武器。1980 年中國試射了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並在不久後開始部署。中國早在 1958 年就開始了研製核潛艇的工作，1982 年成功試射了第一枚潛基彈道導彈。^[18-74]在鄧小平時代，這類系統的部署一直以適度的規模進行。^[18-75]鄧小平時代結束後，針對李登輝總統 1995 年試圖搞臺獨的舉動，此類研發和生產的步伐愈發加快。

1984 年之後，由於蘇聯在阿富汗越陷越深，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也讓它不堪重負，中央軍委正式表達了鄧小平本人早先得出的結論：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的危險性很低。鄧小平在 1985 年對中央軍委的講話中總結了他對全球性威脅的看法，他說：「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他說，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能力發動大戰，但不用擔心，它們都「受到了挫折，都沒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動」。^[18-76]這使鄧小平可以繼續壓低軍費開支，把資源用於發展民用經濟。

儘管與超級大國發生全面戰爭的危險已經減少，但鄧小平和他的同事擔心，隨著兩極世界被多極世界所取代，小範圍戰爭的危險卻在增加。日本、印度、越南、南韓和歐洲加強了它們在世界舞台上的經濟和軍事地位。因此解放軍要把計劃和訓練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國周邊地區的小規模衝突上，與和超級大國的全面戰爭相比，中國的軍力更適合應付這一類衝突。大軍區經過裁軍之後從 11 個減為 7 個，它們要針對邊境地理和氣候以及潛在對手的性質進行計劃和戰備。軍隊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資金研發適合地區戰爭的關鍵技術，如坦克、大炮、航空電子設備以及指揮和控制系統。軍事戰略家在制定計劃時的指導思想是鄧小平所偏愛的速決戰。他們仔細研究了其他國家運用這種戰略的經驗，尤其是英國在福克蘭群島的作戰和以色列對黎巴嫩的入侵。快速反應可以使其他國家和世界輿論來不及對結果作出反應。^[18-77]

精簡軍隊

1980 年 3 月 12 日，鄧小平確立領導地位後不久，向中央軍委常委說明了他對軍隊問題的整體看法。他說，軍隊面臨四個問題：第一，「消腫」；第二，改革體制；第三，訓練；第四，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軍隊要提高戰鬥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腫』不行。……減少軍隊人員，把省下的錢用於更新裝備，這是我們的方針。如果能夠節省出一點用到經濟建設上就更好了。……我們這次精簡，主要是減少不必要的非戰鬥人員，減少統率機構、指揮機構人員。最主要的是減少幹部。」^[18-78]

中共領導層早就在考慮為軍界和政界的高級幹部規定強制性退休年齡，但一直未能建立這種制度。鄧小平說：「要有退休制度……軍隊幹部的退休年齡要比地方幹部小一些，因為軍隊要打仗。」^[18-79]退休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幹部沒有任期限制，並且他們因為「對革命的貢獻」而覺得自己理應享有這樣的待遇。雖然所有重要的軍事決策都是由鄧小平拍板，但他花費時間精力最多的還是裁減軍隊老幹部的問題。鄧小平解釋說，就軍費而言，「世界各國軍費用到人頭上的並不多，主要是用在裝備上。我們有一個很不好的情況，主要是人頭上花錢多。我們指揮機構的人太多，戰鬥部隊並不多」。^[18-80]實際上，鄧擔任頭號領導人期間，在幾乎所有軍隊幹部會議上都會談到退休問題。

在整個 1980 年代，鄧小平繼續從事著他在 1975 年開始的工作，讓幹部制訂新的裁員編制表，然後落實政策，堵上那些精明的幹部可能為規避政策而發明出來的漏洞。他鼓勵地方單位為軍隊的退休老幹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工作。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願讓老幹部保留他們在軍隊中享有的很多特權——住房、用車、醫療，甚至優厚的收入。鄧在 1982 年成立中央顧問委員會後，軍隊中的很多老領導成了該委員會的成員。

1985 年 6 月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提出要將解放軍裁員 100 萬，有人認為這會削弱軍隊的戰鬥力，使中國在衝突中處於劣勢。鄧小平回答他們說，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為了使部隊有效地作戰，縮小規模也是必要的。^[18-81]但是他保留很多召之能戰的老兵作為預備役部隊。大規模的軍隊裁員始於 1985 年，到 1988 年基本完成。從 1980 年到 1989 年，地方單位在上級的要求下總共為 154 萬名軍人提供了地方上的職位。^[18-82]1982 年農村公社制度的終結，使很多過去能為復員軍人提供機會的職位也隨之消失。^[18-83]為了幫助復員軍人就業，鄧小平提出由軍隊提供更多的職業培訓，使軍人退役後能在地方經濟中發揮作用。^[18-84]

為了給復員軍人找到就業機會，鄧小平提出了特殊培訓課程。他在 1980 年 3 月對中央軍委常委說：「我建議組織各種訓練班進行訓練，訓練什麼呢？就是準備到哪個行業就專門學習哪一行的業務。」^[18-85]鄧小平還繼續他在 1975 年開始的恢復和擴大軍事院校的工作。其中最頂級的院校是 1985 年 9 月成立的中國國防大學，用於培養有前途的軍官。1980 年 3 月鄧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重要講話中說，「不打仗，部隊軍事素質的提高就得靠訓練」。但是與美國和蘇聯軍隊相比，中國針對高技術戰爭開展的部隊培訓計劃仍處於早期發展階段。^[18-86]

軍工企業的「軍轉民」

鄧小平成為中國頭號領導人時，深知生產大多數軍用裝備的地方工廠和直接受軍隊控制的軍工企業都是靠政府財政過日子。這些企業效率低下，無法生產能夠與先進的軍事大國相媲美的武器裝備。因此他關閉了效率低下的工廠，並對另一些工廠加強監督使其提高效率。

為達到這些目標，鄧小平鼓勵地方軍工企業和軍隊工廠生產更多有市場競爭力的民用產品。鄧甚至在三中全會以前就提出了這種戰略，他說，中國應當擺脫嚴格劃分軍事與民用產品這種無效率的蘇聯模式。^[18-87]新政策要致力於滿足受到抑制的對基本消費品的需求，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為那些原本可能會下崗的人繼續提供就業崗位。

這些企業受到的競爭壓力反映在大量工廠的關閉上：從 1979 年到 1982 年，接近一半的地方軍工企業要麼關門，要麼開工率大幅降低。^[18-88]1980 年代後期仍在開工的企業成功地轉向了民品生產，尤其是電子消費品，但也生產其他各種商品，如鋼琴、冰箱、洗衣機、嬰兒車、獵槍，甚至客機。^[18-89]為了使軍工企業對市場作出更好的反應，很多企業獲准成為不受政府控制的營利性公司。^[18-90]1978 年，與軍工相關的國營企業生產的軍品佔其全部產值的 92%，民品只佔 8%；到 1982 年這些工廠生產的軍品比重下降到 66%；1992 年鄧小平退下來時又進一步降至 20%。^[18-91]

此外，鄧小平還要求軍隊把部分設備和技術轉向發展民用經濟。例如，鄧小平在 1984 年 11 月 1 日中央軍委召開的座談會上提出，軍用機場可以向社會開放，海軍港口可以軍民兩用。隨著新政策的落實，部隊單位把食堂變成了餐館，招待所改為酒店，供應中心成了商店，軍隊醫院向地方開放，接受平民付費看病。從 1985 年到 1990 年，軍隊企業的產值增長了 700%。^[18-92]

為單一軍工向多樣化轉變提供機會的另一個領域是農業。軍隊的國營農場受到鼓勵開展多種經營，在市場形成後把其部分產品在地方食品市場上出售。由於軍隊佔用著數量可觀的土地，它們也把土地出租給開發商和其他政府單位或企業，甚至成為這些企業的股東。當外國公司尋找設廠地點時，很多部隊農場用它們價值不菲的地產作為資本入股，成立可以得到西方技術的合資企業。^[18-93]

軍轉民的商業活動使部隊幹部有機會改善單位的住房、醫療和娛樂設施，離退休人員也可以獲得住房補助和其他好處。軍事單位賺了錢，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條件也得到了改善。^[18-94]這些新的收入來源可以使官兵也成為鄧小平改革的受益者。

鄧小平面對的最大問題之一，是讓內地的地方軍工企業和軍隊工廠適應新的市場經濟。處於中國腹地的工廠運輸成本太高，幾乎不可能讓它們變成能夠在開放市場上與沿海企業競爭的營利性企業。1978 年時一半以上的國防工業位於內地的「三線工廠」，這是當年毛澤東為降低受到外來攻擊的威脅而遷過去的。現在中國已經與各國建立了和平的關係，有些工廠、或至少是工廠的一部分，獲准搬回沿海地區，這使它們不但能減少運輸成本，而且可以更好地利用商業機會、外國的技術和管理方式。^[18-95]例如，為軍隊生產電子產品的內陸工廠在深圳成立分支機構生產收音機、電視機、計算器以及其他內銷和外銷的電子消費品，這樣既可以更快地引入外國技術、打入民用市場，還可以把新技術轉移到仍留在內地的工廠。

在 1978 年，中國的軍事技術遠比民用技術發達，但是鄧小平很關心技術軍轉民的「溢出」作用，也關心國外發達的民用技術如何向中國的軍事工業「溢入」。例如，鄧小平很想學習日本二戰後如何迅速將軍事工業轉為民用工業。^[18-96]但是他也從日本的經驗學到了利用「溢入」效應。1978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他建議中國學習日本在二戰後對造船技術的利用：日本通過生產過程的轉型在民用船舶製造上取得了巨大進步，這使之後的日本不但能造船，而且能夠為海軍建造現代軍艦。^[18-97]

1982 年中共十二大後，大批軍企轉為民企身分，並獲得了在市場上賺錢的機會，這一變化在 1985 年以後有助於減小軍隊的規模。例如，大批鐵道兵和工程兵成了鐵道部和首都建築公司的下屬單位。在十年內把深圳從一個小鎮變為大城市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地方建築公司，主要就是由過去軍隊的建築單位在軍轉民之後成立的。

在這些變化發生之前，制訂科技規劃相對容易，然而向國際民用技術開放所導致的複雜性卻要求全新的更為廣泛的協調能力。1982 年一個新的機構「國防科工委」成立了，以便為規劃民用和軍用技術的迅速發展提供全面協調。1986 年又制定了「863 計劃」，協調民用和軍事先進技術的研發。^[18-98]

1980 年代軍隊運作的商業化是個混亂無序的過程，它對試圖控制這一過程的官僚機構而言無異於一場噩夢。但它最終也帶來了鄧小平所設想的很多好處。它減少了軍隊對政府財政的需求，滿足了受到壓抑的消費需求，使企業變得更有效率，改善了軍官和普通士兵的生活條件，為復員軍人提供了就業機會，使民用技術的進步及生產效率的提高能夠被應用於改進軍工生產。儘管如此，這仍然僅僅是個開始。雖然鄧小平在 1980 年代對國防工業和軍企的調整取得了一定進步，但軍企從內陸地區向沿海的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的過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

不論軍隊商業化有多少好處，把軍隊與私人利益攪在一起，也造成了腐敗和貪婪的機會，背離了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的精神。很多軍隊領導人對非法斂財的行為及其對愛國主義戰鬥精神的侵蝕深感擔憂。被這些問題困擾了幾年之後，較下層的軍事單位收到了禁止參與商業活動的命令；然而較高層的、專業化的商業活動仍在繼續。儘管有很多解放軍企業以失敗告終，也有一些在改革開放早年成立的合資企業發展得非常成功，少數企業後來還成了世界級的國際公司。

軍隊現代化的基礎

1991 年的波斯灣戰爭使中國領導人看到，外國的軍事技術在 1980 年代取得了多大進展、中國已經變得多么落後，而鄧小平在這個時期卻限制軍事預算，將資源轉向民用經濟。但是，通過把軍事衝突的風險控制在低水平上，鄧小平成功推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沒有危及國家的安全。

然而，在 1995 年，當鄧的接班人面對李登輝總統可能會宣佈臺灣獨立這一切實的可能時，他們斷定這一危險已足以促使中國必須作好軍事準備，不僅要攻打臺灣，還要阻止美國在可能的衝突中支持臺灣。中國需要阻止美國的軍艦、飛機和軍隊接近臺灣，以增加美國武力干涉的成本。從 1995 年開始，由於江澤民在軍事現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軍費的增加遠高於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國接近臺灣所需要的能力。由於中國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國也開始發展海軍，致力於成為一個全面的軍事大國。鄧小平既不是這一過程的啟動者，也沒有為他的接班人制訂建立現代軍隊的計劃；但是他給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規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對現代戰爭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軍隊，以及一個更強大的民用經濟與技術基礎，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繼續致力於軍事現代化。

[18-1]作者感謝以下研究中國軍事的專家的意見：Kenneth Allen, Dennis Blasko, John Corbett, Andrew Erickson, David Finklestein, Taylor Fravel, Paul Godwin, Ellis Joffe (已故), John Lewis, Nan Li, David Shambaugh, Eden Woon, Larry Wortzel, and Xue Litai。對中國軍隊的一般介紹可參見 James C. Mulvenon and Andrew N. D. Ya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s Organizat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2)。對中國戰略思想的全面評估見 Michael D. Swaine and Ashley J. Tellis, *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對 80 年代中國國防的一般介紹見 Paul H. B.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3)。有關中國軍隊的一般性著作見 David Shambaugh,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Progr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beyond the Great Wall and the Long M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7年7月23日，頁164–165。支紹曾、雷淵深：〈中央軍事委員會〉，收入《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編：《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18-3]SWDXP-2, p. 75.

[18-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鄧小平軍事文集》（三卷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第3卷，1977年8月23日，頁62–6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鄧小平在197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417–419。

[18-5]《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1977年8月23日，頁53–72。

[18-6]見 Ellis 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rlan W. Jencks, *From Muskets to Missiles: Polit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the Chinese Army, 1945–1981*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2).

[18-7]參見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18-8]SWDXP-2, pp. 75–79.

[18-9]SWDXP-2, p. 74.

[18-10]《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1978年3月20日，頁95。

[18-11]《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1979年1月2日，頁144–145。

[18-12]這些數字引自 Ji You, *The Armed Forces of China* (London: I. B. Taurus, 1999); <http://www.chinatoday.com/arm/index.htm>, accessed September 30, 2010; "The 'Inside Story' on the Reduction in the Size of the PLA," *Wen Wei Po* (Hong Kong), April 29, 1987; Ellis Joffe, "Radical Reforms Underwa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9, 1985; John D. Friske, ed., *China Facts and Figures Annual*, vol. 17 (1993) (Gulf Breeze, Fla.: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93), p. 61.

[18-13]Harlan W. Jencks, "China's 'Punitive' War on Vietnam: A Military Assessment," *Asian Survey* 20, no. 10 (October 1980): 965–989. 越南人對這場戰爭的看法見 Henry J. 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in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3), pp. 217–240; Edward C. O'Dowd, 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ocuments on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1979 (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2,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9): 3–100; and Edward C. O'Dowd, e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ocuments on 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1979 (I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4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9): 3–116. 對這場戰爭的政治視角的比較，可參看 Scobell, *China's Use of Military Force*, pp. 119–143.

[18-14]Edward C. 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Chinese Cadres and Conscripts in the Third Indochina War, 1978–1981," Ph.D. th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4, p. 132.

[18-15]鄧小平在總結這場戰爭的講話中說，他們在籌劃戰爭時最擔心的問題就是蘇聯可能的反應；他們的判斷是，蘇聯介入的可能極低。見〈鄧小平在中越邊境作戰情況報告會上的講話〉，1979年3月16日，未公開的講話，藏於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18-16]John Wilson Lewis and Litai Xue, *Imagined Enemies: China Prepares for Uncertain Wa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7–133.

[18-17]Xiaoming Zhang,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Decision to Go to War with Vietnam,"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 no. 3 (Summer 2010): 3–29.

[18-18]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99, 106–109, 171.

[18-19]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對這場戰爭的概述見 Edward C. O'Dowd and John F. Corbett, Jr., "The 1979 Chinese Campaign in Vietnam: Lessons Learned," in Laurie Burkitt, Andrew Scobell, and Larry M. Wortzel, eds.,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Carlisle, Penn.: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3), pp. 353–378.

[18-20]與 Mark Mohr 2007 年 10 月的通信，他當時是國務院官員，也是曼斯菲爾德與鄧小平會談時除黃華外長和譯員冀朝鑄之外唯一在場的人。

[18-21]Lewis and Xue, *Imagined Enemies*, p. 127.

[18-2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 年底、1979 年 1 月 2 日，頁 459–460、462–464。

[18-23]Michael Leifer, "Kampuchia, 1979: From Dry Season to Dry Season," *Asian Survey* 20, no. 1 (January 1980): 33–41.

[18-24]King Chen, "China's War against Vietnam, 1979: A Military Analysis," occasional paper,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1983, pp. 1–33; 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18-25]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63.

[18-26]Xiaoming 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A Reassessm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4 (December 2005): 866–867.

[18-27]Kenny, "Vietnamese Perceptions of the 1979 War with China," p. 228; 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114–132.

[18-28]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165–166. 關於弱點部分，詳見 Lewis and Xue, *Imagined Enemies*, pp. 132–133; 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pp. 869–874.

[18-29]2006 年秋天在北京的採訪。

[18-30]作者感謝 Michael Lampton，這是他當時在北京的觀察。

[18-31]Kuan Yew Lee,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pp. 669–670.

[18-32]James C. 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hinese Military-Business Complex, 1978–1998*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p. 53. 國防開支每年大約增長 10%，但 1979 年因對越戰爭增長了 559 億元，大約比平均年份多出近 50 億元，前者佔全年軍費預算的四分之一。1978 年的國防開支是 1678 億元，1979 年 2227 億元，1980 年 1933 億元。對越戰爭的額外支出由南部的廣東、廣西和雲南等省承擔。數據見財政部長張勁夫在 1979 年 6 月 21 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上關於 1978 年決算和 1979 年預算的報告，見"Quarterly Chronicle and Documen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79 (September 1979): 661–663; 以及財政部長王丙乾 1980 年 8 月 30 日向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所做的財政工作報告，見"Quarterly Chronicle and Document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4 (December 1980): 799–802.

[18-33]M. Taylor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7.

[18-34]《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

[18-35]對解放軍學到的教訓的說明，見 O'Dowd and Corbett, Jr., "The 1979 Chinese Campaign in Vietnam: Lessons Learned," pp. 353–378.

[18-36]1978 年 2 月 16 日杰克遜參議員會見鄧小平時。（出自 2010 年 10 月與 Dwight Perkins 的通信，他是代表團成員之一。）

[18-37]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 101.

[18-38]Zhang, "China's 1979 War with Vietnam," pp. 867–888.

[18-39]O'Dowd, "The Last Maoist War," pp. 179–184.

[18-40]Meeting with Vice President Mondale, August 27, 1979; Memc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8/27/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Atlanta.

[18-41]SWDXP-2, p. 92–93.

[18-42]他在許多場合都說過同樣的話。例如在 1980 年 1 月 16 日一次中央幹部工作會議上，見《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65。

[18-43]Huang Hua, Huang Hua Memoi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8), p. 294.

[18-44]沈志華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 406–407。

[18-45]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72.

[18-46]沈志華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頁 408。

[18-47]沈志華編：《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頁 408–411。

[18-48]SWDXP-2, p, 224–226, January 16, 1980.

[18-49]SWDXP-2, p. 270, March 12, 1980.

[18-50]張星星：〈中國軍隊大裁軍與新時期經濟建設〉，《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頁 21–28。另參見 Huang, Huang Hua Memoirs, p. 291。

[18-51]正如前面提到的，鄧小平願意採取主動以減少衝突的危險，但是他仍然堅持為全面恢復正常關係蘇聯必須離開阿富汗並從中蘇邊境撤軍，越南也必須離開柬埔寨。這些條件直到 1980 年代末才成熟。見 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

[18-52]正如前面提到的，鄧小平願意採取主動以減少衝突的危險，但是他仍然堅持為全面恢復正常關係蘇聯必須離開阿富汗並從中蘇邊境撤軍，越南也必須離開柬埔寨。這些條件直到 1980 年代末才成熟。見 Qichen 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4.

[18-53]Memc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8/27/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18-54]Memcon,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the President, 1/8/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Brown (Harold) Trip file, box 69, Jimmy Carter Library.

[18-55]Memcon,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the President, 1/8/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Brown (Harold) Trip file, box 69, Jimmy Carter Library.

[18-56]Memcon,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Vice Premier Geng Biao, 5/29/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Geng Biao Visit file, box 70, Jimmy Carter Library; Memcon, Meeting between Secretary of Defense Dr. Harold Brown and Vice 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eng Biao, 5/27/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Geng Biao Visit file, box 70, Jimmy Carter Library; Memo, Brzezinski to Carter, Summary of Dr. Brzezinski's Conversation with Vice Premier Geng Biao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29/80,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zezinski Material, Far East, Geng Biao Visit file, box 70, Jimmy Carter Library.

[18-57]《鄧小平軍事文集》，第 3 卷，頁 154–155、168–174。

[18-58]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pp. 58–59.

[18-59]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pp. 60–61.

[18-60]Information Office, State Council, 2008 nian Zhongguo guofang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in 2008) (Beijing: January 2009), appendix 5, at http://www.gov.cn/jrzq/2009-01/20/content_1210075.htm, accessed April 9, 2011.

[18-61]William H. Overholt,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pp. 340–344.

[18-62]Robert J. Skebo, Gregory K. S. Man, and George H. Stevens, "Chinese Military Capabilit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hina's Economic Dilemmas in the 1990s: The Problems of Reforms, Modern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 665.

[18-63]Cheng Li and Scott Harold, "China's New Military Elite," *China Security* 3, no. 4 (Autumn 2007): 79. 對政治接班的一般論述見 Michael D. Swaine,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China: Leadership, Institutions, Belief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92). 對野戰軍人事背景重要性的介紹，一本早期的全面研究是 William W. Whitson, with Chen-hsia Huang,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18-64]Cheng Li and Lynn White, "The Army in the Succession to Deng Xiaoping: Familiar Fealties and Technocratic Trends," *Asian Survey* 33, no. 8 (August 1993): 772.

[18-65]Morton H. Halperin, *China and the Bomb* (New York: Praeger, 1965).

[18-66]Evan A. 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ic Competition from the Nuclear Age to the Information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67]但是鄧小平在 1975 年必須解決負責導彈和航天工業的七機部的派系鬥爭，見 *Ibid.*；另見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87–112。

[18-68]Feigenbaum, *China's Techno-Warriors*. 對中國在邊境地區的行動的論述見 Fravel, *Strong Borders, Secure Nation*.

[18-69]M. Taylor Fravel, *Active Defense: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18-70]Ellis 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A Doctrine for Modern Wa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2 (December 1987): 555–571; Harlan W. Jencks,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Wishful Thinking, National Suicide or Effective Deterrent?"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8 (June 1984): 305–319; Paul H. B. Godwin, "Mao Zedong Revisited: Deterrence and Defense in the 1980s," in Godwin, ed.,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1980s*, pp. 21–40. 另參見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Soci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Confidential Intelligence Report 1205-AR, December 6, 1985, available in DNSA.

[18-71]Joffe,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pp. 85–86; Godwin, "Mao Zedong Revisited."

[18-72]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pp. 568–569; John Wilson Lewis and Litai Xue,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lexander C. Huang, "The PLA Navy at War, 1949–1999: From Coastal Defense to Distant Operations," in Ryan, Finkelstein, and McDevitt, *Chinese Warfighting*, pp. 241–269.

- [18-73]《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1979年7月29日，頁161。
- [18-74]Joffe, "People's War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p. 565.
- [18-75]發展核潛艇和潛基彈道導彈計劃的具體內容見 Lewis and Xue,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 [18-76]SWDXP-2, p. 284.
- [18-77]Skebo, Man, and Stevens, "Chinese Military Capabilitie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p. 663–675.
- [18-78]SWDXP-2, pp. 269–275.
- [18-79]SWDXP-2, pp. 269–275.
- [18-80]《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1980年10月15日，頁179。
- [18-81]SWDXP-2, p. 284.
- [18-82]張星星：〈中國軍隊大裁軍與新時期經濟建設〉，頁7。
- [18-83]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1–124.
- [18-84]SWDXP-3, p. 104–105, November 1, 1984;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年11月1日，頁1011–1012。
- [18-85]SWDXP-2, p. 271, March 12, 1980.
- [18-86]SWDXP-2, p. 271, March 12, 1980. 對1980年代軍隊教育的一般介紹見 William R. Heaton,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Godwin, *The Chinese Defense Establishment*, pp. 121–137; Dennis J. Blasko, Philip T. Klapakis, and John F. Corbett, Jr., "Training Tomorrow's PLA: A Mixed Bag of Trick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 (June 1996): 488–524.
- [18-87]《鄧小平軍事文集》，第3卷，頁130。
- [18-88]Lewis and Xue, *China's Strategic Seapower*, p. 100.
- [18-89]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pp. 91–104.
- [18-90]John Frankenstein and Bates Gill, "Curr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Defence Indust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6 (June 1996): 394–427.
- [18-91]Tai Ming Cheung, *Fortifying China: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Modern Defense Econom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6. See also Frankenstein and Gill, "Curr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Defence Industries," pp. 394–427.
- [18-92]Cheung, *Fortifying China*, p. 57. 這個時期的大趨勢見 pp. 50–77。事實上，對所有這些活動難以進行監督，尤其對於基層單位，因此並不存在準確的數字。
- [18-93]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8-94]Mulvenon, *Soldiers of Fortune*, pp. 59–63.
- [18-95]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s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82.
- [18-96]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s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5 (September 1988): 382; Cheung, *Fortifying China*, pp. 60–63.
- [18-9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6月28–29日，頁334–335。
- [18-98]Cheung, *Fortifying China*, pp. 52–100.

第 19 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 年 8 月 18 日，一位中國公民對中共幹部作出了嚴詞批評，堪稱鄧小平時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評之一。他指責他們「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位公民是誰？鄧小平。^[19-1]他和毛澤東一樣，也希望確保中共幹部能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當鄧小平在 1980 年 8 月說這番話時，東歐的共產黨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講話前一個月，波蘭團結工會發動了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罷工。很多中共領導人最初同情團結工會，認為工人應當有自己的組織，但他們也擔心如果中國工人罷工會發生什麼情況。鄧小平和胡耀邦試圖打消幹部們對出現類似混亂的擔憂，他們說，中國的領導層不同於東歐，不必屈服於蘇聯不得人心的要求。此外，中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改革受到了勞動人民的歡迎。^[19-2]但是鄧小平和胡耀邦也非常擔心，所以他們決定要降低這類問題在中國發生的風險，他們要擴大自由，使人民有機會對幹部表達合理的意見，努力解決使群眾有意見的問題。

鄧小平 8 月 18 日的講話是他對允許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調表態。在講話中，他對民主作了積極評價。他沒有走到主張實行投票選舉或改變中共角色這一步。事實上，他用「資產階級思想」、「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一類套話批評了西方民主。但是，鄧小平將批評的鋒芒主要指向了「封建主義」——極左思想的代名詞——及其對敢講話者的迫害。他主張擴大自由，要求黨的領導人傾聽批評意見，這使知識分子產生了期待，以至多年以後他們仍把這篇講話視為希望的燈塔。

講話過了幾周後，波蘭的亂局仍在持續，中共上層的氣氛也開始發生變化。領導層擔心鄧小平給了抗議者太多鼓勵，中國的局勢也有可能很快像波蘭一樣失控。鄧小平講話剛剛一個月，胡喬木給胡耀邦總書記寫了一封長信，希望明確支持對騷亂作出更堅定的回應。胡喬木的信也反映了陳雲的觀點，雖然陳雲從前當過上海的工會領袖，但他在江西蘇區時就對工人說，現在是無產階級掌權，工會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增加生產。胡喬木在信中警告說，獨立的工會可以使異見分子團結在一起，造成大麻煩。

胡耀邦較為同情中國獨立工人組織的發展，沒有給胡喬木答覆。他仍然相信波蘭給中國的真正教訓是必須加快改革開放。^[19-3]然而風向已變。10 月 9 日，胡喬木的信發出兩周後，中央書記處將此信稍加修改後下發各單位。保守的中宣部部長王任重指示說，不要再討論鄧小平的 8 月講話。在 1980 年 12 月 25 日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也變了卦，宣佈進行政治改革要慎重。^[19-4]

鄧小平對 1980 年波蘭罷工的反應，類似於 1956 年毛澤東對匈牙利和波蘭起義的反應。先是允許開放言論，意在幫助改正官僚體制中最嚴重的弊端，爭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變的批評者。但是一旦發現對黨的敵意威脅到了黨的領導，就要進行壓制。鄧小平知道，毛澤東在 1957 年開展無情的反右運動斷送了知識分子的擁護，因此他在 1980 年試圖走溫和路線，既要限制言論自由，又要讓知識分子繼續積極支持現代化。

鄧小平沒有像 1957 年的毛澤東（在鄧的幫助下）那樣開展全面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但他顯然進行了壓制。在 1980 年 12 月的講話中，鄧小平沒有直接否定自己 8 月的講話，他繼續從正面使用「民主」一詞，但他仍舊堅持「民主集中制」，即黨的決定一旦作出，黨員就要執行。此外，胡喬木的信下發後，鄧小平小心地不再像 8 月那樣寬厚，他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鄧並沒有放棄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想法，但只有在斷定時機成熟後他才會重提此事，而這個時機直到 1986 年才到來。

老幹部退休

在 1980 年 8 月 18 日的講話中，鄧小平還談到了另一個容易引起分歧的問題：「（老同志）現在第一位的任務，是幫助黨組織正確地選擇接班人……讓比較年輕的同志走上第一線，老同志當好他們的參謀。」^[19-5]當時還沒有關於退休年齡的規定，很多老幹部在找接班人的問題上拖拖拉拉。他們在事業高峰期趕上文革，被革職近十年，因而認為自己為黨的事業作出了個人犧牲，現在終於能讓他們發揮渴望已久的作用，但剩下的時間又沒有幾年了，因此不想放棄權力。再者，這些老幹部也不想放棄官員的特權：住房、帶司機的專車、勤務人員、重要會議上的座次和氣派的宴會。

此時中共還沒有為高級幹部建立全面的退休政策。如何處理下級幹部的退休事務不是問題；上級幹部制定規章，下面執行就是。麻煩在於如何對待北京的高層領導人。關於需要制定有關退休的一般原則，黨的領導人能夠達成共識，但是棘手之處在於細節：中國正進入一個關鍵時期，需要這些老幹部訓練和培養新一代接班人，如何處理這幾百名老幹部的退休問題？

在 8 月 18 日的講話中，鄧小平對他的計劃作了說明。成立一個地位很高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讓老幹部擔任榮譽職務，繼續享受與職務掛鉤的各種特權。老幹部不難看出鄧小平是要讓他們變得「有名無權」——早在 1975 年 7 月鄧小平就對軍隊的退休問題提出過類似方案。後來，政治局的老幹部確實變成了中顧委的核心成員。

此時，鄧小平本人也打算在幾年內退休。8 月講話的幾天後，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他是否會辭去副總理職務，鄧小平說：「不但我辭職，我們老一代的都不兼職了。……過去……實際上存在領導職務終身制，……（這個）制度上的缺陷在 60 年代還看不出來，那時我們還年輕。……所以我們說，老同志帶個頭，開明一點好。」^[19-6]

幾周以後，鄧小平又對老一代不「開明」表示氣惱。12 月 25 日，在為籌備六中全會和十一大而召開的一次為期十天的會議結束時，鄧小平說：「中央在最近一年中多次強調，老幹部要把選拔和培養中青年幹部，作為第一位的、莊嚴的職責。別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作自我批評，這項工作做不好，就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19-7]

1982 年 2 月中顧委正式成立，鄧小平希望其成員辭去（在黨和政府中的）正式職務。規定中顧委成員要有 40 年的黨齡和領導經歷，鄧小平是第一任主任，有參加政治局常委會議的特權。^[19-8]中顧委的全部 172 名成員保留全薪、級別和各種待遇，但不再在正式決策部門任職。^[19-9]鄧小平宣佈，中顧委只會存在十到十五年。他解釋說，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它的委員擁有過渡期所需要的特殊革命經驗。

鄧小平讓老幹部有名無權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很多老幹部，包括陳雲、王震和宋任窮，都成了中顧委委員，但仍然保留著過去的職務。他們退休後，趙紫陽說，在 1980 年代，他和胡耀邦雖說是總書記，其實只是大秘書，因為在這十年裏實權一直掌握在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六人小組」（薄一波、彭真、鄧穎超、宋任窮、楊尚昆和王震）手裏。鄧小平雖然位高權重，但也沒有絕對權力強迫其他所有人退休。事實上，1982 年 3 月，面對來自老幹部的壓力，黨刊《紅旗》雜誌宣佈，由於黨和國家規模之大，讓「二三十名老同志留在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是必要的。^[19-10]但是鄧小平確實確立了在這些老革命辭世後將取消中顧委的原則。以後所有的職務也都會有任期限制。中顧委按原定計劃於 1992 年解散，它給了老幹部榮譽地位，減少了他們的權力，但並沒有使他們完全放棄權力，直到鄧小平在 1992 年完全退休。

《苦戀》和文化限制

胡喬木在 1981 年 7 月請鄧小平拍板決定，剛拍攝完成的電影《苦戀》是否可以公映。提請鄧小平注意是因為它的內容很有爭議性，而且有可能成為近年來最熱門的影片之一。這部影片根據同名劇本拍攝，電影劇本《苦戀》於 1979 年 9 月刊登在《十月》雜誌上，講述一名藝術家在日本佔領時期被迫逃離中國，在海外過了一段好日子後，1949 年決定回來報效祖國。因為有海外經歷，這名藝術家總是受到懷疑與迫害，但他始終忠於自己的國家。藝術家的女兒打算出國時，他不願讓她走，失望的女兒對父親說：「你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你嗎？」兩人談話後不久，這位藝術家死在逃避紅衛兵迫害的路上。在鄧小平觀看的電影版本中，父親思考著女兒的問題，在雪中蹣跚而行，最後倒地而死，他的身體在雪地上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鄧小平看過電影後說，它「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他承認電影拍得不錯，但這只能使它更加危險：「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呢？」^[19-11]鄧小平的這個結論，為那些試圖對文革受難文學進行區分的宣傳幹部提供了一個指導原則。^[19-12]給整個黨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個人不好的可以放行。

鄧小平想製造一種比毛澤東時代更自由的氣氛，因此劇本作者白樺儘管受到批判，鄧小平仍允許他留在黨內。當時，另一位著名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以生動的第一手資料寫下有關腐敗幹部的文章，鄧小平也允許他保留黨籍。甚至胡喬木這位正統思想的捍衛者也說，中央的文件要放棄「文學為政治服務」這種讓很多知識分子反感的說法，他的替代說法是「文學為人民和社會主義服務」，這擴大了可以接受的作品範圍。^[19-13]

但是，描寫過去的小說數不勝數，要把可允許的作品和不能允許的作品截然分開是不可能的。分歧依然嚴重。鄧小平批評《苦戀》十幾天後，在中宣部召開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鄧力群和胡喬木試圖借助鄧小平對《苦戀》的評語，築起一道抗擊批評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文學作品的強大防線。但同樣是在這次會議上，1950年代的「文藝沙皇」周揚卻發表了贊成文藝多樣化的講話，講話令人振奮，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文革期間受過衝擊的周揚，如今倡導的是他25年前作為「文藝沙皇」會批判的文學。他在座談會上問，是讓文藝變成死水一潭好呢，還是讓它成為滾滾長江好？他自問自答：當然是滾滾長江好，儘管會帶來一點兒泥沙。

與會者對周揚的熱烈支持使胡喬木處境難堪，他承認同志們有不同觀點。但他堅持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他本人、鄧力群和鄧小平在整個1980年代用來批評那些他們認為過分迷戀西方自由的領導人的概念——是一項重要的任務。^[19-14]

王震強化對中央黨校的控制：1982—1983

中國的年輕人和很多知識分子在1978年以後感受到了西方吹來的令人振奮的自由之風。但是高層官員對於應該讓民眾享有多大自由卻存在著內部分歧。他們中間很多人受過政治迫害，誰也不想回到1949年之前或文革期間的混亂狀態。在高層官員中，胡耀邦最同情想得到更多自由的知識分子和希望有更多靈活性的地方幹部，但他不斷遭遇保守派的壓力，後者害怕寬鬆氛圍帶來的後果。鄧小平則是只要認為必要的時候就會加強紀律，但他繼續支持胡耀邦，哪怕在胡受到保守派批評時。

一個重要戰場是中央黨校。1978年12月以後，作為中央黨校實際校長的胡耀邦很少有時間過問那裏的事，但是得到他支持的教員以及他所倡導的黨校的自由探索精神，繼續滋養著有前途的年輕幹部的成長。黨校理論部的學者因在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和批評「兩個凡是」中發揮的作用而享有盛名。三個聲譽正隆的學者——吳江、孫長江和阮銘，在副校長馮文彬的支持下繼續推動言論自由，這讓擔心黨的紀律和原則受到損害的黨內老幹部深感不安。去黨校講過課的鄧力群向王震和陳雲彙報了黨校的情況，他們對在寬鬆氣氛中不斷增長的對中共的批評尤其不滿。1981年8月中組部派了一批人去黨校調查上述三位學者，陳雲也給黨校培訓部主任寫信說，黃埔軍校培養出了紀律嚴明的青年軍官，他希望黨校也要培養紀律嚴明的黨員幹部，而不是鼓勵批評中共的人。

1981年中央黨校需要任命新校長時，胡耀邦支持任命項南，他是個思想開明、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共幹部，後來擔任了福建省委書記一職；陳雲則支持任命王震，以對學校的寬鬆氣氛加以限制。^[19-15]讓王震這樣一個對外部世界所知不多、被看作粗人的人來領導國家最開明的一批學者，這讓有求新思想的黨員感到憤怒。^[19-16]但是鄧小平批准了對王震的任命，於是王震在1982年接管了黨校。

王震一上任就將馮文彬、阮銘和孫長江撤職。阮銘獲准移民美國，他在那裏詳細地寫下了這段經歷。^[19-17]孫長江被安排到首都師範大學這所二流學校教書。（有一次，孫長江開玩笑說，他要感謝王震讓他去了最小的大學，而沒讓他去最大的小學。）^[19-18]吳江則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

王震清除了他認為思想過於寬容的教員後，並沒有在黨校發揮多少作用。陳雲雖然政治上保守，但他也重視教育水平，讓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蔣南翔擔任了黨校事實上的負責人。蔣南翔既提高了黨校的知識水平，也對思想表達的自由作出了限制。人們普遍認為，對黨校教員的整肅和思想路線的轉向是對胡耀邦的間接批評，因為正是他首先創造了更為寬鬆的氣氛。

王震和陳雲也支持對中宣部加強控制。陳雲說，搞不好經濟工作和宣傳工作這兩件事，黨的領導就難以為繼。王震和陳雲認為接替胡耀邦中宣部長職務的王任重是個合格的保守派，可是王並沒有證明自己是個能幹的領導人，於是鄧小平在1982年3月23日任命鄧力群，取代了王任重。

毛澤東曾在 1975 年支持「四人幫」進行嚴厲的思想控制，同時讓鄧小平全面主持政府工作。與此類似，鄧小平在 1982 年讓鄧力群抑制對黨的批評，同時讓胡耀邦繼續主持黨的工作。^[19-19]儘管鄧小平並不在意要一絲不苟地堅持意識形態的正統性，但他決心避免讓寬鬆的環境招致人們發表文章和小說詆毀黨的作用。

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

另一個戰場針對的是胡耀邦給予地方幹部靈活性的做法，這場鬥爭因陳雲在 1983 年 3 月 17 日批評胡耀邦而達到頂峰。1983 年 1 月趙紫陽出訪非洲 11 國，為期一個月，胡耀邦接過了趙紫陽在政府中的部分工作。胡的作風比趙紫陽隨意得多，例如，他知道煤炭短缺後，便跑到礦區鼓勵人們盡其所能增加產量。他沒有考慮到採煤時可能發生的問題，比如對環境的嚴重破壞，也沒有預料到私人礦主經常不採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結果發生了許多礦難。在慎重的計劃工作者看來，胡耀邦是個不守紀律的鼓動家，他不充分考慮行動的後果，也不嚴肅看待他們精心制定的經濟計劃。

陳雲聽到胡耀邦不夠尊重經濟計劃的彙報後很不高興。他在 3 月 14 日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鄧小平。^[19-20]第二天鄧小平便把胡耀邦、趙紫陽和胡喬木叫來，批評了胡耀邦不嚴謹的領導方式。^[19-21]1983 年 3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召開的聯席會議上，趙紫陽沒有點胡耀邦的名，但嚴厲批評了他的活動，認為這干擾了有序的經濟管理。胡耀邦的友人認為趙在 1984 年 5 月寫給鄧的信裏對胡的批評大大超出必要，儘管趙後來對此予以否認。^[19-22]

在 3 月 17 日的這次會議上，陳雲還談到了十個問題：

- (1) 1980 年提出調整經濟是對的，沒有調整就不會有今天這樣好的形勢；
- (2) 2000 年之前的這個時期要分成兩個十年，頭十年是打基礎，後十年振興。如果前十年不謹慎，後十年就困難了；
- (3) 可以利用銀行貸款或出售黃金暫時彌補預算赤字，但不能年年出現赤字；
- (4) 必須嚴肅看待各部委，尤其是綜合部門，有關經濟形勢的意見；
- (5) 說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 156 個項目走了彎路是不對的；
- (6) 與李先念協商後在 1973 年至 1974 年購入的黃金儲備是必需的，不算多（陳雲當年初作出的購買黃金的決定被視為一項極為明智的決定，因為此後十年黃金價格暴漲）；
- (7) 國家計委要從各部委和地方集中資金，搞重點建設；
- (8) 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對財經工作都要管，但重點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 (9) 對亂上項目、亂用基建投資的現象，必須制止；
- (10) 中央書記處（當時由胡耀邦領導）對經濟問題要研究，但方法要改進，特別要瞭解綜合部門的情況。

仍然支持胡耀邦的鄧小平顯然對陳雲批評胡耀邦感到不安，會議一結束鄧小平就說，今後由趙紫陽領導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全面負責經濟工作，其他人不要插手。^[19-23]

雖然陳雲的十點意見都是針對保持對經濟的控制提出的，但最後幾點也是對胡耀邦的強烈批評，而且是在間接批評鄧小平推動經濟過快發展的政策。鄧力群未經授權，當天就把陳雲的講話內容透露給了新聞單位。鄧小平把鄧力群叫去，批評他這種違反黨紀的做法。然而危害已經造成：胡耀邦在黨內的權威被削弱，有些幹部開始懷疑胡在自己的位子上還能呆多久。^[19-24]一些和胡耀邦一起工作並且同樣贊成擴大言論自由的幹部對鄧力群十分氣憤。

胡耀邦處境艱難。北京的「婆婆」太多，胡耀邦處在他們的壓力下很難真正控制黨組織。他有名義上的權力，也有鄧小平為他撐腰；他仍在主持會議，領導日常工作。但是他把大量時間用在了北京以外。他去全國各地視察，鼓勵當地幹部努力克服現代化的障礙。在胡當政的幾年裏，他總共走訪了 1,703 個縣，佔全國全部縣的 80% 以上；走訪了全國 183 個地區中的 173 個。1987 年 1 月被革職之前，他還打算視察餘下的 10 個地區。^[19-25]

在這段時間裏，要避免使陳雲和鄧小平的嚴重分歧被他們手下的要員覺察到是不可能的，兩人不和的謠言也傳到了香港的媒體。對於自己的得力幹將遭到痛批、開展工作的權威被削弱，鄧小平不可能感到愉快。^[19-26]陳雲當初是支持任命胡耀邦當總書記的，但當他看到胡耀邦更願意回應鄧和鄧的政策而不是他本人的，心中自然不悅。但是這兩位黨的領導人都知道，公開鬧翻會招致外界的強烈攻擊，這將毀掉黨，因此兩人都很節制，不把他們之間的分歧公之於眾。

反對精神污染及其反響

1983 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論家再一次從哲學角度主張擴大思想自由的範圍，令保守派擔心共產黨的權威受到了那些不把對黨的忠誠視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戰。《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在 1983 年 1 月寫道：「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意味著堅決拋棄十年內亂期間的『全面專政』和殘酷鬥爭；拋棄把一個人神話而把人民貶低的個人崇拜；堅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19-27]不久後，在 3 月 7 日中央黨校紀念馬克思逝世 100 周年的會議上，周揚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說，不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異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幹部濫用權力，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存在異化。胡喬木和鄧力群試圖阻止發表周揚的講話，但它還是刊登在 3 月 16 日的《人民日報》上，引起了巨大反響。^[19-28]將人道主義和異化視為普遍原則的觀點，在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看來是對黨的最高權威的根本挑戰。在西方觀念中，超驗的神可以批判世俗統治者，但這並不是中國的傳統。

鄧小平沒有匆忙終止一切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的討論，但他在 1983 年 9 月份決定對寬鬆的氣氛加以限制。他讓胡喬木準備一篇講話，對他稱為「精神污染」的觀點採取了更強硬的路線。^[19-29]鄧小平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各種問題，但是他宣稱，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異化」是指工人因為其勞動受到追逐利潤的資本家的剝削而產生的一種感受，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並不存在這種問題。鄧小平主要針對的是那些攻擊中共權威的人。^[19-30]

鄧力群批評胡耀邦把愛國主義放在共產黨之上，但鄧小平本人並未區分兩者的先後。假如讓鄧小平表達自己的看法，他也許會說，在數百年的時間跨度內愛國主義會綿延不絕，但至少近幾十年內沒有什麼可以取代共產黨，對黨的完全支持是絕對必要的。鄧小平說，有些在文革中受過罪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暗中搞秋後算賬的活動，有些人充滿狂妄的野心，對這些人必須撤職和開除出黨。基本問題是什麼？「黨的紀律鬆弛，甚至保護了一些壞人。」鄧小平的解決辦法是，思想工作要幫助教育人們「正確看待過去，理解當前，堅定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信念」。^[19-31]北京的幹部知道，就像陳雲在 3 月份的講話一樣，鄧小平的講話也包含著對胡耀邦含蓄的批評，因為胡耀邦一直主張為知識分子擴大自由的範圍。

1983 年 10 月 12 日，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把批評擴大為一場全國範圍的反對精神污染的政治運動。鄧小平很不願意搞政治運動，這會打亂正常工作，讓所有可能受到批評的人產生對立情緒，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運動以外的辦法去遏阻「精神污染」。這是鄧小平 1978 年上台以來發動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但是為了避免重蹈過去政治運動極端化的覆轍，鄧小平一開始就警告說：「過去那種簡單片面、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決不能重複。」^[19-32]

儘管鄧小平發出了警告，一些奉命搞運動的幹部還是採用了他們所熟知的恐嚇式批判。但是也有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幹部試圖淡化批判。當一些局級負責人開會討論如何反駁「人道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同樣會存在「異化」的觀點時，農村問題的重要顧問杜潤生問他們是否知道「異化」的含義。大多數人承認不太清楚，杜潤生對他們說，那麼你們怎麼能讓農民明白什麼是異化？杜潤生說，在農村搞這種批判運動是很荒謬的。萬里也認為不應當在農村搞這種運動。趙紫陽說，不要讓運動干擾經濟。方毅則認為不應當讓運動干擾科技領域的工作。當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在軍隊中開展這場運動。這些幹部成功限制了運動的範圍。鄧小平既覺得有必要限制對黨的批評，又知道對政治運動存在著普遍反感，他想在這兩者之間達到平衡，因此沒出一個月他便讓這場運動偃旗息鼓了。1984 年 1 月 3 日，胡喬木在一篇長文中對異化作出權威闡述，基本上結束了這場運動，但此文也為言論自由設定了界線。^[19-33]

在很多知識分子心中，鄧力群要對這場運動負責。結果是他退居守勢並作了自我批評。他被批評為又一次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19-34]像很多知識分子一樣，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以及鄧小平的長子鄧樸方，批評鄧力群把這場運動搞得超出了鄧小平的本意。鄧力群明確表示，發動政治運動的人是鄧小平。他拒絕保護上級領導的行為並未被迅速遺忘：15 年後給鄧小平開追悼會時，鄧樸方明確表示不歡迎鄧力群參加。在敢言的知識分子的壓力下，胡喬木後來甚至承認反精神污染運動是一個錯誤。其實鄧力群也認識到反精神污染的鬥爭沒有達到目標，他在 1984 年 3 月 14 日對胡喬木說，「反對精神污染將是一場長期的鬥爭」。^[19-35]

為了讓那些被已經終止的運動灼傷的知識分子放下包袱，從 1984 年到 1985 年鄧小平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因堅定的信念與勇氣而受到很多知識分子敬佩的王若水得以繼續撰寫人道主義的文章，甚至在 1984 年 1 月受到批評後，他仍在香港發表了一篇文章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直到 1987 年夏他才被開除出黨。

鄧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運動的寬容態度使作家們受到鼓舞，他們再次信心大增。1984 年 12 月 29 日至 1985 年 1 月 5 日中國作協召開第四屆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組織者竟然敢不邀請胡喬木和當時仍是中宣部部長的鄧力群到會。

胡啟立在會上發表講話，照本宣科地表達了黨要限制言論自由的觀點，但他到會的事實本身就給了與會者一定信心。不出預料，胡耀邦與會、加之會議沒有制止直言不諱的批評讓保守派感到憤怒。大膽的作家們選出被胡喬木和鄧力群批評過的、1930 年代就已成名的小說家巴金擔任作協主席。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過去的右派、也是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最敢言的批評者之一劉賓雁當選副主席。劉賓雁利用這次會議批評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運動中攻擊過他的人。

夏衍在評價這次會議的重要性時宣稱，這次大會堪稱作家們的遵義會議。就像毛澤東在 1935 年 1 月的遵義會議上擺脫了蘇聯的控制一樣，中國作家在這次會議上擺脫束縛，宣告了自身的獨立。^[19-36]這類言論激怒了保守派。出席會議的很多人都是黨員，但李先念從他的女婿、與會的部隊作家劉亞洲那兒瞭解到會議情況後，把它斥為一次反黨會議。胡喬木和鄧力群也被作家們的叛逆精神所激怒。鄧力群稱之為一次「群魔亂舞」的會議。1985 年 1 月 2 日會議仍在召開時，得知會議進展的鄧小平把胡耀邦叫去作了一次私下談話，要求他對這些風氣加以控制。^[19-37]

作協會議對中共權威的放肆挑戰讓鄧小平十分惱火。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在爭取知識分子的人心上過於寬宏大量，卻未能使黨的紀律得到加強。此外，胡耀邦的寬容使鄧小平顯得像是一個專橫的、過分嚴厲的專制主義者。^[19-38]

同時，為了讓保守派和知識分子取得一定共識，胡喬木協助胡耀邦起草了一篇發言稿（〈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由後者在 1985 年 2 月 8 日中央書記處的報刊工作會議上發言。^[19-39]這篇講話稿的基調是保守的，但胡喬木試圖在保守派和知識分子之間取得平衡。胡喬木寫道，既要反對精神污染，又要避免使用或盡量少用「精神污染」這種說法。^[19-40]據說鄧小平對胡喬木改變調子，及其在限制對中共權威的挑戰方面作出讓步也感到不滿。^[19-41]

在這種更加自由的氣氛中，30 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於 1985 年 3 月發表了〈第二種忠誠〉一文。他在文中對兩種黨員作了對比，一種黨員對上級領導唯唯諾諾，另一種黨員具有良知、獻身於黨的理想。劉賓雁這篇文章深深觸動了那些曾經為是否執行黨在大躍進和文革時期的政策而受到內心煎熬的人，對試圖擺脫中共的、富於理想的青年也產生了巨大影響。一貫堅信黨的紀律至關重要的鄧小平認為劉賓雁的觀點是在挑戰黨的領導，結果，劉賓雁在 1987 年被開除出黨。但是與毛澤東不同，鄧小平並不是一個喜好報復的人。他在 1988 年允許劉賓雁和王若水出國。同時，鄧小平也完全知道鄧力群的所作所為讓知識分子離心離德的程度，於 1985 年 7 月撤去了鄧力群的中宣部部長一職，取代他的是當時在家鄉貴州擔任省委書記的朱厚澤。^[19-42]

朱厚澤不能完全控制中宣部，因為那裏仍有許多保守派，但是他的任職對於追求更多自由的人來說是一次重大勝利。熟悉中宣部的幹部說，誰當了中宣部部長誰就會變得保守，因為他的職責是維護黨的正統思想——但只有朱厚澤是個例外，他宣佈了新的「三寬政策」：寬鬆、寬容、寬厚，這讓希望表達不同意見的黨員為之一振。

朱厚澤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間都挨過整，但由於他在領導貴州這個落後省份上取得的成就，被選定為有前途的省級領導人。1978 年中央黨校重新開學後他參加了第二屆為期一年的培訓班，而當時領導中央黨校的人正是胡耀邦（朱在黨校的同學之一，是 2002 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錦濤）。朱厚澤到北京上任後，支持思想開放的、有創造性的著名作家王蒙擔任文化部長。^[19-43]鄧力群等保守派理論家認為，朱厚澤允許方勵之、王若望和王若水等人享有更多自由，會讓事情變得更糟。^[19-44]他們擔心這終將導致混亂。朱厚澤的做法讓大膽敢言的知識分子歡欣鼓舞，卻讓鄧力群及其支持者心灰意冷。

鄧小平繼續做著一件幾乎不可能辦到的事：既要堅持黨的紀律，又不徹底疏遠知識分子。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3 日舉行的全國黨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將社會主義的積極力量與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作了比較。^[19-45]他說，通過保留土地公有制和企業國有制，中國能夠「消除資本主義……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宣傳，一定要堅決反對」。^[19-46]但是他仍然試圖阻止對知識分子的全面批判。他說：「我們仍然堅持『雙百』方針，堅持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項自由，堅持對思想上的不正確傾向以說服教育為主的方針，不搞任何運動和『大批判』。」^[19-47]

準備交接班：1985

1985 年到來之前，鄧小平為了解決已經拖延了一段時間的上層交接班問題，提議在 1985 年召開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這比規定的時間 1987 年提前了兩年。由於其他人強烈反對更改黨代會的正常會期，鄧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3 日召開了一次特殊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宣佈重要的人事退休與潛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會議的共有 992 名幹部，規模幾乎和黨代會一樣大。^[19-48]由於會議沒有選舉中央委員的正式權力，因此在 9 月 16 日，即代表會議開幕

之前召開了中央四中全會以接受辭職，又在代表會議閉幕後的 9 月 24 日召開五中全會宣佈了新的任命。沒有人公開討論過鄧小平的交接班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在四個月前的 5 月 10 日胡耀邦接受陸鏗——過去的右派、香港半月刊《百姓》的副主編——採訪時，就已經有各種傳聞了。

採訪刊登出來後，鄧小平讓喬石轉達了他對胡耀邦的不快。他對喬石說，胡耀邦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開明的領導人。^[19-49]此外，當陸鏗問胡耀邦「鄧小平為何不在自己身體尚好時就把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交給你」時，胡耀邦沒有斷然否認他想從鄧小平手中接過這一可以使他成為第三代領導人的關鍵職務，而是回答說，鄧小平一句話就能解決軍隊的問題，我得說五句。^[19-50]

鄧小平雖然讓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慮退休，但他不想讓別人催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調行事。他知道胡耀邦過於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慮全盤計劃的平衡，因此已經失去陳雲等保守派的支持。在他們看來，胡耀邦以他的寬容大度贏得了知識分子的人心，卻把限制知識分子的任務留給別人去做。胡耀邦的對手私下蔑稱其為「蟋蟀」——「瘦小，機靈，總是上竄下跳」。^[19-51]胡耀邦的支持者以為，胡耀邦可能確實在黨的代表會議上被任命為中央軍委主席了，只是他没接受罷了。^[19-52]鄧小平後來對楊尚昆說：「我有什麼錯誤的話，這個錯誤就是看錯了胡耀邦。」^[19-53]

在黨的代表會議上沒有明確討論接班問題，但在很多與會者看來，鄧小平當時已經決定讓比他年輕 15 歲（而胡比鄧年輕 11 歲）的趙紫陽作為主要候選人。趙紫陽在城市經濟改革上成績斐然，而且他不疏遠保守派領導人，具備領導人的氣質。鄧小平很少公開表揚哪一個幹部，但是他在會議期間接見幾位作家時公開表揚了趙紫陽，還特別提到他擁護四項基本原則。^[19-54]

在代表會議之前的四中全會上，總共有 64 名擔任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的老幹部宣佈退休，約佔全部委員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 9 名政治局委員。這 64 人中有 61 人都過了 67 歲。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葉劍英，由於沒有提名其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數從 6 人減為 5 人，除了鄧小平以外，還有陳雲、李先念、胡耀邦和趙紫陽。

在選拔新的新高級官員時，主要的考慮一是年齡，二是教育程度。由政治局和書記處操辦的選拔過程十分慎重，從 1985 年 5 月份開始持續了數月。在中央委員會新當選的 64 名委員中 76% 有大學文憑，平均年齡 50 出頭。政治局實際上以那些老幹部的更年輕、教育程度更高的追隨者取代了他們本人：姚依林與陳雲關係密切，胡啟立跟胡耀邦關係很好，田紀雲是趙紫陽的人，喬石是彭真的人，李鵬則是鄧穎超的養子。^[19-55]

在這些較年輕的新高幹中，58 歲的李鵬和 57 歲的胡啟立，被視為總理和總書記的潛在人選。水利工程專業出身的李鵬確實在 1987 年 11 月當上了代總理，後來又成為總理並且一直幹到 1998 年 3 月。胡啟立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80 至 1982 年任天津市委書記，後回到北京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他會講英語，眼界開闊。^[19-56]他於 1951 年畢業後在北京大學當了五年共青團書記，1977 年清華大學恢復教學後他成為校黨委副書記。

在當選候補委員的年輕幹部中，還有江澤民和胡錦濤。他們在 1985 年後能夠出席政治局會議，只要黨認為他們有前途，不犯大錯誤，就有望登上更高的職位。

鄧小平要求新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年輕幹部和其他新領導人學習老幹部們建設黨、團結國家、至今仍在為四化努力工作的精神。他要求他們為人民服務，求真務實，公私分明，學好馬列，研究和適應不斷變化的新情況。^[19-57]事實上這些新的領導人成了老幹部的學徒，他們會受到培養和考驗，以便將來擔任更高的職務。

這一次的大輪家是鄧力群，知識分子都把反精神污染運動歸罪於他（雖然有人認為鄧小平才是始作俑者）。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後不久，鄧小平就批准了胡耀邦主張鄧力群不再擔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通知，通知於 1985 年 9 月 28 日發出。據政治嗅覺靈敏的知識分子推測，這是要讓他為那場不得人心的運動承擔責任。按照慣例，這種人事變動應事先通知政治局常委，可是這一次常委們並未得到通知。^[19-58]但由於陳雲的緣故，通知在發出半小時後被撤回。事實上，鄧力群的研究室又過了兩年才終於被解散，在這之前鄧力群一直在位。

政治改革：1986—1987

1986 年 6 月 10 日，在與趙紫陽、余秋里和萬里等人開會時，鄧小平談了三個需要處理的重要問題：農業、外匯和政治改革。這也是 1980 年以來他第一次談到政治改革。鄧小平說：「1980 年就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沒有具體化，現在應該提到日程上來。不然的話，機構龐大，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這邊往下放權，他

那邊往上收權，必然會阻礙經濟體制改革，拖經濟發展的後腿。」他又說，必須精簡政府機構和人員，減輕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19-59]

時機似乎終於成熟。1985 年的巴山輪會議標誌著經濟體制改革基礎研究的結束，需要進行一些政治體制的變革以配合新經濟體制的發展。1980 年時鄧小平及其身邊的幹部擔心中國會發生類似於席捲東歐的示威。1986 年，他們則為亞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緊張。繼年初將馬科斯總統趕下台的「人民力量」運動之後，這股浪潮已驅使蔣經國在鄧小平召開 6 月代表會議的三個月前宣佈要研究政治體制改革。若在此時向國內外公眾表明大陸和臺灣一樣開放，豈不是明智之舉？

在對待抗議活動時，鄧小平像其他中共領導人一樣，既要嚴加控制，同時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隨著有關示威活動的消息四處傳播，鄧小平繼續向中國民眾解釋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優於資產階級民主；他指出資本家剝削工人，實行三權分立的國家難以及時作出決策。但是鄧小平也決心走在群眾運動的前面，適時進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作出指示，要認真研究各種政治體制，搞清楚哪一些體制持久，哪一些體制垮台及其中的原因。

選擇一位能在實施未來政治體制改革中擔當重任的人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的領導人，是順理成章的。假如胡耀邦是鄧小平的接班人，那麼他自然會是這個小組領導人的合理人選。然而鄧小平在 1986 年 5 月告訴胡耀邦，在定於 1987 年秋天召開的十三大以後他將卸下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不出鄧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說他也會從總書記的位子退下。鄧小平說，胡可以繼續工作，但發揮的作用要小一些。鄧小平解釋說，是否讓胡耀邦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到時候再說。^[19-60]

此時，趙紫陽已被指派全面負責為黨的十三大準備文件。很多人預計他大有機會在十三大之時成為主持日常工作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 1986 年 9 月又讓趙紫陽負責研究政治體制改革，人們估計他有可能負責領導未來的政治改革。趙紫陽是一個合適的人選，因為他和他的智囊團已經研究過各種經濟體制。他在領導研究經濟體制上的經驗，使他很適合思考與經濟變化相配合的政治改革。

1986 年 6 月 28 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示說，在籌備將於一年後召開的十三大時，中央書記處必須制定一個計劃，用一年時間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然後提出行動綱領。他提醒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19-61]趙紫陽和他的部下要在 1987 年 7 月拿出文件初稿，在 8 月或 9 月召開的七中全會上進行討論，以便最後一稿能在 10 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公佈。^[19-62]

在為研究政治改革設定進程時，鄧小平強調黨政職能分離的必要性，這是他早在 1941 年就贊成的觀點。^[19-63]事實上，1980 年代當時那種黨政重疊的制度是在 1950 年代形成的，旨在解決一個現實問題：中共掌權後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級幹部不是黨員，因此每個政府部門都成立了黨組織以確保黨的控制。但是到了 1980 年代幾乎所有擔任重要職務的政府官員都是黨員，因此很多人覺得沒有必要再保留黨的監督。此外，很多人認為黨多出來的一層監督使各部委或各省領導人無法以及時、靈活的方式協調各自單位的工作。理順政治體制，正當其時。^[19-64]

於是，趙紫陽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在 1986 年 9 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員有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和彭沖。這個小組配備了一班人馬，下設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趙紫陽給政治局常委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胡耀邦寫信提出了人選名單。按鄧小平的指示，趙紫陽在信中闡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為現代化服務，為長治久安提供保障。鮑彤被任命為體改辦主任，他在 1980 年由中組部派去為趙紫陽工作後，已經證明了自己是個得力助手。^[19-65]

雖然鄧小平所希望的政體改革的目標範圍相當有限，但他給了趙紫陽很大權力，讓他研究各種政治體制，聽取國內不同專家團體的意見。前《人民日報》記者吳國光是體改辦的成員之一，他後來在普林斯頓大學寫的博士論文就是以 1986 年至 1987 年的中國政治改革作為題目，他指出了鄧小平和趙紫陽的政體改革觀的不同。鄧小平希望通過高度積極的人員提高管理效率，趙紫陽則想更大範圍地減少黨在經濟和社會單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鄧小平較為狹小的目標，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員士氣的方式。作為探討這個問題的小組成員，他們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何種機制能讓下級表達意見。^[19-66]

從 1986 年 11 月到 1987 年 4 月，體改辦和不同的幹部專家一共組織了三十多次研討會。^[19-67]雖然報告的定稿需要鄧小平批准，但趙紫陽和鮑彤有權力選擇參加會議的專家。他們所選的專家包括瞭解東歐國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和 1949 年前後中國政治體制的人。體改辦評估了黨、政府和全國人大的作用，聽取了處理過不同地區實際問題的地方幹部的意見。政體改革小組還致電中國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館，讓它們收集有關不同政體的信息。新華社和中共駐港機構

也協助搜集了世界各國政治實踐的信息。雖然之前討論經濟體制改革時邀請了很多外國專家，但並沒有請他們參加討論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研討會的發言者對於「政治改革」的涉及範圍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詞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懷抱希望的知識分子和學生，他們回應鄧小平的號召，對政治體制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他們謹慎地重複著鄧小平對效率的強調，但是一些知識分子也提出了一些遠超出行政效率的問題，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鮑彤在公開講話中有意識地引用鄧小平的話，以表明自己是在遵令辦事。但趙紫陽和鮑彤顯然堅信黨應當放棄對政府、企業和學術機構的嚴密監督。他們認為，這樣其實可以使黨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領導。^[19-68]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觀調控間接引導經濟一樣，黨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總體性的指導。

1987年1月，在學生示威受壓、胡耀邦下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開始後，北京的政治氣氛轉趨保守。為應對這一股寒流，趙紫陽請胡喬木和鄧力群參加了政治改革研討小組的會議，以便讓思想正統的老同志也能在討論中充分表達意見。^[19-69]新的氣氛限制了有關政改的討論，但並未使其停滯。趙紫陽在1987年2月4日提議加強工會的獨立作用，給其更大的活動空間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還記得在1949年前後的一段時間，工會曾受到鼓勵發揮更大力量抵制資本主義趨勢，因此他預期黨在未來會重新鼓勵獨立工會，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主。研究者也討論了改變全國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從一個徒具形式而無實權的橡皮圖章轉變為一個能夠代表不同觀點進行有意義討論的權力機關。^[19-70]

鄧小平在1987年3月與喀麥隆總統保羅·比亞（Paul Biya）的會談中說，政治體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穩定，是否有益於國家的團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產力能否持續發展。^[19-71]他沒有提到擴大自由或傾聽民眾的聲音。但是鄧在1987年4月28日跟趙紫陽見面時明確表示，雖然要繼續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希望繼續考慮政治改革。趙紫陽對收緊的政治氣氛有所擔心，請求鄧小平同意重印1980年8月鄧支持政改的講話。鄧小平答應了這一請求。

鄧小平在審閱趙紫陽十三大報告的草稿時，更加明確地拒絕了知識分子提出的擴大自由的要求：「我們的改革的主要目標，是保證行政機構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對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應該同法制結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們才能有一個穩定的環境。」^[19-72]很多知識分子在1986年底一廂情願地希望可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該願望在1987年並未實現。聽過鄧小平的意見後，趙紫陽在5月13日發表了有關中共十三大籌備工作的講話，這次講話標誌著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表明十三大將把政治改革計劃列入會議內容。但至少就當時而言，政治改革並不包括擴大民主實踐的步驟。

學生運動和胡耀邦的落馬

1986年春天，菲律賓的「人民力量」運動把腐敗的馬科斯總統及其妻子艾美黛趕下了台，由此觸發東亞各國的學生示威，中國電視上的這些新聞也點燃了中國學生的抗議活動。中國在1980年初只有大約350萬台電視機，隨著電視機產量的爆炸性增長，到1985年初已超過4,000萬台。^[19-73]1986年的中國電視觀眾從電視上瞭解了國內外大事，包括經蔣經國在1986年9月允許反對黨的合法存在。國外的學生運動和臺灣的大選激動人心：中國的學生也開始呼籲「人民的力量」，要求實行西方式的民主。

1986年的學生示威活動是自1976年「四五」運動以來出現的第一次大規模學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學生示威漸趨平靜幾周之後，趙紫陽對新加坡副總理吳作棟說，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後，過去跟外界沒有多少接觸的學生缺少判斷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國和日本更發達，有些人便得出錯誤的結論，主張中國應當全盤西化，不理解這在國情十分不同的中國是不可能的。趙紫陽承認一些學生得出這種結論不足為怪，因為在1978年以前社會主義制度確實有一些失誤。他批評有人放鬆了黨對遊行示威的管制。^[19-74]但他並沒有提到要為此負責的人——胡耀邦。

在整個20世紀，中國的學生示威大多發源於北京，可是這一次卻始於安徽省省會合肥以及相鄰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國際知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時任中國科技大學（位於合肥）副校長的方勵之在這些地方發表的演講。方勵之是一名充滿活力的演說家，不管他在哪裏發表激進言論都會聽眾如雲。例如，1986年11月18日他在上海同濟大學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沒有哪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成功的。」他又說，現在的中國政府是現代形式的封建主義。他向聽眾講述了歐洲中世紀的科學家如何衝破教義傳統的束縛，並嘲笑毛澤東稱讚沒有受過教育的人們富有智慧。他斥責了胡喬木，說如果他懂天體物理學，那麼科學家會歡迎他講話，不然的話他還是少說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開會議上，安徽

省前省委書記、最開明的高層領導人之一萬里想限制一下方勵之，說他已經給了方勵之足夠多的民主。方勵之則回答說，萬里當副總理並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他無權決定允許多少民主。

如果方勵之的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識分子，不難及時把他打壓下去。然而方勵之是十分傑出的科學家，是中國試圖培養的知識分子的楷模。他 16 歲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後來成為中國最年輕的正教授。1986 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訪學數月後歸國，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吸引一大批熱情的追隨者。當時還不是互聯網時代，但聽眾把他的講話錄音和講稿向各地的朋友傳播。1986 年 12 月 4 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之後，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示威。

在 12 月 8 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胡為了安撫學生，承認大學的條件確實有待改善——這成為後來保守派批評他對示威學生太軟弱的理由。第二天是 1935 年「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的紀念日，武漢、西安和合肥的學生再度走上街頭。雖然中國的電視台封鎖消息，但學生們熱切地收聽美國之音（VO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有關示威的新聞。

鄧小平在搞四個現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會先富起來。但在大多數學生看來先富起來的卻是最不該致富的人——貪婪的個體企業老闆和腐敗的官員——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學多年以後為國家利益而工作的幹部。學生的生活條件往往很糟糕，八個人擠在一間狹小的宿舍裏。他們能通過錄取率極低的高考必是經過多年的艱苦學習。考上好大學的優秀學生，對靠關係得到更好的機會、過著優裕生活的高幹子女感到憤憤不平。^[19-75]此外，當時仍不允許大學畢業生自主擇業，而是由國家分配工作，進行分配的部分依據則是分管學生工作的政工幹部所寫的評語。很多學生覺得別無選擇，只能去討好這些政工幹部，而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往往專橫跋扈、不學無術。^[19-76]

在方勵之點燃了喚醒學生的星星之火後，示威活動蔓延至北京和其他大約 150 個城市。各地領導人承擔著控制學生運動的責任。12 月 18 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澤民市長出現在大批學生面前。他一開口講話就有學生發出質問，還有些學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於是他停下講話，請學生中間的一些人上台陳述自己的觀點。學生講出自己的觀點後，江澤民說，同學們對西方和中國的差別缺乏足夠瞭解，你們對西方民主的瞭解都是通過翻譯過來的東西，你們應當直接從外文材料去更多地瞭解民主。然後他用英語背誦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說，這讓很多學生大為折服。此後幾天，由於學生們忙於期末考試，同時上海市政府宣佈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學生遊行也隨之結束，沒有發生任何意外。^[19-77]江澤民在北京高層領導人那裏得了高分，他們讚賞他平息了示威而沒有發生衝突。

12 月 27 日，鄧力群、王震、胡喬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楊尚昆被召集到鄧小平家中彙報學生運動的情況。他們說，形勢十分嚴峻。^[19-78]在鄧小平等一些老幹部看來胡耀邦有嚴重缺點，而他控制學生運動的無能成了導火線。鄧小平認為，無論對學生運動還是對胡耀邦的領導職務，最好立刻採取行動。過去他沒等到黨的十二大就讓華國鋒靠邊站，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讓胡耀邦下台。

鄧小平知道讓胡耀邦下台會帶來麻煩，因為胡耀邦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職也會讓人們懷疑鄧小平當初選擇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澤東和林彪翻臉使人懷疑毛澤東當初對林彪的判斷是否明智一樣。鄧小平也知道，在獻身改革、爭取知識分子和地方幹部的熱情支持上，沒有哪個人比得上胡耀邦。鄧小平在 1986 年 5 月曾問過鄧力群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看法，至少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考慮替換胡耀邦的問題。但鄧沒能預見到對胡耀邦的撤職會在僅僅兩年後胡去世時引發那麼大的騷亂。

1986 年 12 月 30 日，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等人叫來，宣佈必須結束對學生運動的寬容態度。他對他們說：「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堅決」負責，他知道遞交辭呈的時候到了。

鄧小平接著批評方勵之說：

我看了方勵之的講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講的。這樣的人一要開除。——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美國的當權者，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 20 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19-79]

1987 年 1 月 1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強調了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抨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使群眾對隨後胡耀邦在這兩個問題上受到批評有了心理準備。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辭去總書記一職。鄧小平同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和胡啟立幾個高層幹部作了溝通，他們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辭職。然後鄧小平讓他們組成一個委員會，作為籌備十三大的領導班子，並告訴他們在對胡耀邦進行公開批評前，馬上在 1 月 8 日組織一次「黨內生活會」（實際上是關

鬥門爭會）。^[19-80]胡耀邦的支持者後來說，利用「生活會」批評胡耀邦，違反了解除總書記職務的正常程序，因為把如此高職位的人解職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後要有中央全會的批准，最後要經黨的代表大會批准。鄧小平則選擇在把胡耀邦的問題提交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前，就用「生活會」給他定了案。

從 1982 年到 1986 年，每年的中央 1 號文件都與農業有關，但 1987 年 1 月 6 日發給全黨的 1 號文件的內容卻是鄧小平關於處理學生示威的指示要點。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關係到國家的未來，必須態度堅定。對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作出嚴肅處理。^[19-81]沒過幾天示威就停了下來，沒有任何有關示威者死亡的報道。^[19-82]

鄧小平在 1 月 6 日也見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開批評他的「黨內生活會」。在組織這些會議期間，鄧小平指示黨內幹部要「軟處理」。^[19-83]他說，不要搞成路線鬥爭，也不要提「團派」（共青團），開會不是為了打擊報復。^[19-84]但是，胡耀邦在上層的自由派幹部、地方幹部和知識分子中間畢竟有眾多追隨者，鄧小平認為，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響，有必要對他的問題作出詳細而全面的說明。批判胡耀邦最堅決的人是鄧力群，他被請來起草這個批胡的文件。同時趙紫陽也與胡耀邦見了面，通知胡說，允許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職，但他要對次日召開的批評會作好精神準備。趙紫陽還勸說他，如果再發生學生示威，一定要堅定公開地表明反對立場。^[19-85]

1 月 10 日至 15 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據鄧小平的要求召開的「黨內生活會」上，有二三十名高層幹部對胡耀邦進行了批評。鄧小平和陳雲兩人地位太高不宜到會參與批評，不贊成把胡耀邦撤職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沒有參加。有人說，如果葉帥沒有死（他於 1986 年 10 月 22 日去世），他會保護胡耀邦，絕對不會允許開這種批評會。

胡耀邦在會上首先作了自我檢討。他承認自己未能承擔起責任，按鄧小平的指示阻止學生示威。「自 1986 年 11 月以來，小平同志曾就這次十年來最大的學潮給我作過三次指示。」此外，他知道自己會在哪些具體問題上受到批評，對每一個問題都作了嚴肅的交代，他承認自己有錯誤，但也試圖作出辯解：

- 關於他未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我確實講過一些話，也抓過一些事，但沒有嚴格把握這些基本原則」。
- 關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不認為這個問題很嚴重，我覺得只要幹好工作，問題自然會得到解決」。
- 關於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講過之後，我沒有及時採取正確的措施制止一些錯誤言行」。
- 關於培養幹部接班人問題：「黨中央，特別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養好接班人，大膽提拔德才兼備又有經驗的同志。對此我是堅決擁護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幹部上從來沒有以自己為中心，總是集體開會討論。我沒有提拔過有私人關係的人或支持過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錯誤」。
- 關於外事活動：「一定要特別慎重。負責接待外賓的部門請我見陸鏗，我沒有拒絕，這是個錯誤。我在同他談話時……沒有斷然否定他的一些說法」。
- 關於「思想」：「我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後，我在思想鬥爭中總想維護安定，擔心出亂子。我把精力主要用於防左，沒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長期任職之後，我變得過於興奮急躁……不能冷靜聽取別人的意見」。
- 關於答應下面的事太多：「我從來沒有批准過超出自己職權範圍以外的事。」^[19-86]

胡耀邦對隨後受到的猛烈批評完全沒有準備。他後來說，如果他知道「黨內生活會」是那個樣子，他就不會交辭職信，也不會作這種全面檢討。^[19-87]

鄧力群對胡耀邦的詳細批評佔去了 1 月 12 日整個上午和次日的半個上午，總計五個多小時。鄧力群一一列舉了胡耀邦的「錯誤」。他說，胡耀邦最大的失誤是對四項基本原則和反精神污染鬥爭關注不夠。他沒有做到團結全黨，他主要使用跟自己觀點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沒有充分徵求老領導的意見。^[19-88]

趙紫陽在 1 月 15 日也對胡耀邦提出了批評。後來，1989 年趙紫陽被軟禁後，他在跟別人的交談和錄音中痛心她表示，雖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對胡的批評並不過分，他和胡耀邦對改革有著一致的看法，並曾合作共事。他說自己「沒有對胡耀邦落井下石」。^[19-89]當時，在 1 月 15 日的生活會上，趙紫陽批評胡耀邦說，他雖然大公無私，但是也有弱點。「他喜歡標新立異，搞些噱頭。他不服從紀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權力，問題就會更大……為什麼他對劉賓雁、王若水這種放肆的人那麼寬容？他大概是在國內外樹立一個開明形象。」趙紫陽又說：「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如果條件有了變化，小平同志和陳雲同志不在了，我是無法繼續與他共事的，那時我就要辭職了。他不管你常委會怎麼定的，黨代會怎麼定的，或過去怎麼定的，他想怎樣就怎樣。」^[19-90]胡耀邦對這些話很吃驚，他沒有想到趙紫陽會這樣批評他。胡的朋友也覺得趙紫陽確實是在「落井下石」。^[19-91]

15 日上午的「黨內生活會」結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後的檢討，他表示要為自己的全部錯誤承擔責任。但是他也要求組織繼續調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過派系。生活會結束後，有人看到胡耀邦在會議廳的台階上黯然落淚。^[19-92]

1 月 16 日政治局召開了更加正規的擴大會議，與會者包括中顧委的 17 名老幹部，沒有參加「黨內生活會」的陳雲表明了他的意見。他說，他在 1980 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擔任總書記的決定。但是 1980 年至 1981 年這段時期他觀察到胡耀邦領導的書記處並沒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讓一百多個部級單位向他提交報告，卻不解決要害問題。此外，他到下面亂跑，一個星期就能跑 22 個縣，沒有把精力用在他本應深入研究的主要問題上。他也沒有定期召開政治局會議和常委會議，而即使是為了搞好黨內民主，也應當定期開會。陳雲又說，他在 1983 年 3 月批評過胡耀邦以後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錯誤，可是胡耀邦顯然沒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選拔幹部應該選來自五湖四海的能人，胡耀邦卻只選自己圈子裏的人。選拔幹部要考慮「德才兼備」，但「德」（對黨的忠誠）是第一位的。不過陳雲強調說，解除胡耀邦的職務要遵守黨內程序，這一點十分重要。^[19-93]

未經正式程序胡耀邦就被解除了總書記一職。趙紫陽仍然擔任總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總書記。趙紫陽說，他不想當總書記，他更適合擔任總理。但是一些知情的觀察者認為，在鄧小平的人中間並沒有既適合這個職位、同時又能得到其他領導人贊成的其他人選。與會者確實普遍認為趙紫陽在經濟工作上表現出眾，因此沒有太大爭議就通過了讓他擔任代總書記的決定。這些決定後來得到了中央全會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著黨員和中央委員的身分，而且名義上暫時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實上他完全靠邊站了。

一些思想開明的黨員擔心，胡耀邦下台後保守派可能會取得控制權，放慢改革開放的步伐。但是，繼續領導黨的日常工作的「五人小組」——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萬里和胡啟立——都親近鄧小平，願意聽從他的領導。^[19-94]鄧小平和趙紫陽都堅持改革開放不能變。^[19-95]

胡耀邦的秘書在 1 月 17 日告訴胡的家人說，胡耀邦現在身心憔悴，要在中南海勤政殿休息一段時間，他要求家人不要去看他。兩周以後，胡耀邦經由一條專用通道，從中南海走回了只有幾分鐘路程的家中。他讓助手收拾好他過去十年裏的講話、報告和各種文件，在家裏花了三個月閱讀這些材料，最後斷定自己沒有犯過原則性的錯誤。他在家裏也看電視，重讀馬列全集的一些章節。他很少會客，也幾乎不參加黨的活動，但他出席了解放軍「八一」建軍節的慶祝活動、七中全會和中共十三大。

1 月 19 日中央印發 3 號文件，列舉了解除胡耀邦職務的原因：^[19-96]（1）他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導致學潮的發生；（2）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3）在經濟工作中鼓勵經濟過快增長和消費，造成經濟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經常違反程序；（5）在外事活動中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例如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就邀請 3,000 名日本青年訪華；（6）經常不遵守黨的決議，未經中央授權就講話。^[19-97]

3 號文件還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檢討摘要。他在檢討中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損失。不過他沒有說自己對思想的寬容態度導致了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或學生示威。3 號文件中還說，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這些老幹部只要身體健康，今後仍會繼續為其他幹部——這是指總書記和總理——提供指導。3 月和 5 月又印發了 3 號文件的補充文件，對胡耀邦擔任領導期間的問題作了更具體的說明。^[19-98]

在很多自由派幹部看來，這是一場有失公正的悲劇：像胡耀邦這樣為國家辛勤工作、大公無私的人，其治理方針本可行之有效，卻被他為之忠心效力的人罷了官。^[19-99]和鄧小平一起工作過的另一些幹部則認為，假如胡耀邦繼續在台上，社會秩序將蕩然無存，因為胡缺少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威所必需的堅定立場。他們感謝鄧小平精心安排，沒有給黨造成損害就撤掉了胡耀邦，保持了黨內高層的團結，使鄧小平的改革得以繼續。兩年後胡耀邦去世時，這兩種分歧嚴重的觀點再次交鋒，並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後果。

胡耀邦下台後，鄧小平曾數次邀請胡去他家打橋牌，都被胡婉言謝絕，只有一次例外：1987 年 12 月 30 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職那天的整整一年後，他接受了鄧小平的邀請。鄧小平問胡耀邦對自己的問題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沒有回答。^[19-100]在 1989 年 4 月胡耀邦的追悼會上，鄧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遺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絕了。她說：「都是因為你們這些人。」^[19-101]

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7

胡耀邦下台後，鄧小平多管齊下，加強他認為在胡耀邦領導時期日益鬆弛的黨內紀律。為了減少胡耀邦的影響力，鄧小平公開宣傳胡耀邦的「錯誤」，並把批評中共但一直受到胡耀邦保護的一些追隨者撤職。鄧小平還意在遏制對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等西方觀念日益廣泛的渴求，他認為有人利用這些觀念來挑戰黨的最高權威。

鄧小平親自主持的 1 月 16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了要開展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鄧小平還同時宣佈，要繼續實行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19-102]1 月 28 日春節前夕發佈了中央 4 號文件〈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對即將開展的運動作了說明。^[19-103]

受到胡耀邦保護的知識分子——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被開除出黨；朱厚澤在 3 月也被撤銷了中宣部部長一職。劉賓雁為自己辯解說，他的報告文學批評的是一部分中共幹部，並不是在攻擊黨；但有些高層幹部認為，他的批評以及對人道主義理想抱「更高忠誠」的呼籲使人們對黨產生了消極印象。還有不少人雖然未在媒體上遭到批判，但受到了內部批評，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和一些大學行政幹部中的黨員。^[19-104]為避免在知識分子當中造成嚴重的消極反應，鄧小平宣佈運動只限於黨內。

很多在胡耀邦手下工作過的有經驗的黨內高官，如朱厚澤、吳明瑜、于光遠和任仲夷，依然堅信方勵之、王若水和劉賓雁不會危及社會安定；示威活動能夠通過協商加以解決；擴大開放只會加強而不是削弱國家實力；鄧小平高估了國家穩定受到的威脅，作出了過度反應。

鄧小平試圖在主管宣傳工作的高層幹部中加強紀律，要求他們維護社會主義理想。3 月 29 日中央印發了一個改進報刊與出版工作的文件，然後便出現了一篇又一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廣播也在不停地宣傳同樣的內容，包括批判主張個人主義和腐化墮落的西方思想。^[19-105]媒體還歌頌愛國主義，讚揚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和科學成就。^[19-106]

鄧力群在推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相反，趙紫陽設法限制這場運動對經濟部門的消極影響。他說，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不應干擾經濟，群眾對政治運動已經感到厭倦。在為推動運動召開的 4 月 6 日至 12 日的宣傳工作會議上，鄧力群漫無邊界地大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引起了很多與會者的憤怒。趙紫陽的助手鮑彤拿到鄧力群的講話文稿後，趙紫陽把它交給了鄧小平。鄧小平作出了趙紫陽和鮑彤所期望的反應：他同意鄧力群走過了頭，疏遠了過多的知識分子和自由派幹部。有些自由派黨員擔心鄧小平可能會考慮讓鄧力群成為胡耀邦的接班人。鄧小平此時的反應標誌著運動的一個轉折點，也標誌著鄧小平不再支持鄧力群了。

在確認了鄧小平對自己的支持後，趙紫陽在 1987 年 5 月 13 日發表講話，含蓄地批評了鄧力群，實際上也標誌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幾周後的 7 月 7 日，趙紫陽解散了過去鄧力群維護正統思想的根據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鄧小平並未對此表示反對。政治氣氛的這種變化加強了趙紫陽的地位，削弱了鄧力群的影響，為趙紫陽在十三大提出更開明的工作計劃鋪平了道路。^[19-107]

7 月 10 日，曾在 1950 年代短期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李銳交給鄧小平一封信，信中含有詳細的批評鄧力群的內容。李銳說，鄧力群在延安時代曾濫用職權調查李銳，並不斷找李的妻子談話，隨後又引誘她。李銳還批評鄧力群也整過一些好幹部。^[19-108]

當鄧力群受到攻擊時，趙紫陽也感到了來自保守派的壓力，後者將趙視為對保守的經濟政治方針的威脅。趙紫陽後來回憶說，他之前還與保守派維持著比較不錯的關係，但是在他撤掉了鄧力群的根據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之後，他與陳雲和李先念的關係受到了傷害。^[19-109]趙紫陽還說，十三大之後這些保守派領導人擔心他會利用自己的領導地位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推動「政治體制改革」。^[19-110]

中共十三大：趙紫陽主政

鄧小平很清楚，毛澤東像皇帝一樣至死不退造成了極大危害。所以他決心建立一種新的模式，對高層領導人的任期要有限制，到期就退休。然而就鄧小平本人而言，退休是有附加條件的。趙紫陽在 1989 年 5 月向戈巴卓夫透露說，中共的十三大有一個內部約定，即使鄧小平已退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但在大事上他仍保留著最後拍板的權力。

與鄧小平同齡的那一代老幹部知道，只要鄧小平決定退休，他們也只能跟著退。1985 年鄧小平開始提出他可能退休的問題時，有些老幹部請求他留任。就像其他對權力交接的時間和過程並無明確規定的國家中的集權統治者一樣，鄧小平及其同事有理由懷疑一些沒有耐心的年輕幹部甚至在老幹部還不打算退休時就開始為他們的退休作準備，或至少熱切期盼他們退休。1986 年 11 月 11 日，在為籌備一年後的十三大而召開的小型會議上，胡啟立就提到過鄧小平和一

大批老幹部將要退休的事。薄一波聽到這話臉都氣紅了，問胡啟立：「你是不是盼著我們都早點死啊？」^[19-111]胡啟立客氣地回答說，他希望他們繼續幹下去。從來不知隱瞞情緒的王震也曾在中央黨校大罵胡耀邦在為老幹部退休作準備，他其實說出了其他老幹部的心聲。^[19-112]

在 1987 年 10 月 25 日到 11 月 1 日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鄧小平辭去了所有黨政職務，退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但保留了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19-113]其他老幹部別無選擇，也只好從正式職務上退下。陳雲獲准取代鄧小平成為中顧委主任，第一線的工作則交給了趙紫陽。

黨的十三大是趙紫陽的大會。鄧小平知道，為了使接班人有效行使領導權，必須給他相當大的活動空間。除非鄧小平認為事態緊急，趙紫陽就是當家人。把胡耀邦解職後，鄧小平讓趙紫陽放手籌備並領導了十三大。趙紫陽在 5 月 13 日的報告不但標誌著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結束，也是趙紫陽為期半年的全力以赴地領導十三大籌備工作的開始。^[19-114]為使西方民眾對此變化有所準備，趙紫陽在 1987 年 9 月 25 日接受了美國電視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Tom Brokaw)的採訪。在聚光燈下，趙紫陽對自己將在一個月後的黨代會上正式成為新的第一線領導人顯得躊躇滿志。^[19-115]

趙紫陽雖然成了當家人，但他仍是在鄧小平劃定的範圍內做事。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表明自己對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的信念。鄧小平長久以來一直贊成黨政分家，趙紫陽也緊跟這一路線。儘管如此，趙紫陽還是獲得了相當大的活動空間，因為鄧小平甚至陳雲都清楚，在趙紫陽的領導下經濟和政治體制都會繼續發生變化。

1987 年 5 月 29 日，在綠燈亮起的兩周以後，趙紫陽對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說，他正在為十三大準備一個政治改革綱領，改革的長期目標是「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趙紫陽說，這個過程需要保持政治穩定，也將經過很長時間才能成功。改革要循序漸進，一個省一個省地進行。趙紫陽說，將來黨不會再插手政府事務，黨內將會有高度的民主。

^[19-116]

為了反映各級幹部的意見，文件總共修改了八稿。9 月 27 日鄧小平看過文件後決定不再作任何修改，只是簡單地批示說：「看了，沒意見，寫得好。」根據趙紫陽的指示，文件以〈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為標題提交給十三大。鄧小平在大會前夕發表簡短講話，表明他完全支持這個報告。^[19-117]

像鄧小平一樣，趙紫陽也力圖迴避會引起爭議的觀點。十三大的文件既支持繼續改革開放，也避開了容易引起爭議的具體問題。趙紫陽選擇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主題，這是這個概念第一次被黨的代表大會所採用。它的好處是既可以讓那些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擁護者繼續堅持中國最終將走向社會主義的信念，又給予了那些相信市場的人發展生產力所必需的自由空間。當有人問到這個初級階段會持續多長時間時，趙紫陽說：「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體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19-118]

實際上，趙紫陽是將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無限期地拖後，他要讓那些希望經過短期整頓後黨會再次邁向社會主義高級階段的人打消這種念頭。十三大為經濟體制提出了「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這一新說法，反映了市場正在變得更加重要，這與過去宣稱計劃優先的文件相反。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詳細硬性計劃的作用將持續下降。要建立勞動力、技術、信息和房地產市場。趙紫陽說，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報告為進一步改革提供了方向：

- (1) 實行黨政分開，減少黨在領導政府事務中的作用。各級黨委不再設立不在政府任職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全職書記。
- (2) 進一步下放權力。
- (3) 政府各單位要明確職責，減少職權的重疊。
- (4) 提拔、降職和獎懲要以工作表現作為依據，培訓、工資、福利和退休的權利都要有法律加以保障。
- (5) 在關係到地方群體的問題上，政府要與地方幹部進行協商並向群眾告知結果。
- (6) 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要允許各種群眾組織，如婦女、工會和其他團體，表達他們所代表的群眾的意見。要加強民族區域自治，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
- (7)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19-119]

大會還批准了一些程序上的改革。為了能更及時地瞭解情況，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將從一年一次改為一年兩次。政治局會議的重要決定將不再保密，而要在媒體上公佈。對工廠、學校、醫院、企業的黨組織進行精簡，使這些單位能夠更加自主地作出有關自身工作的決定。

在十三大召開前的幾個月裏，趙紫陽全面負責人事上的變動，但在選拔過程中老幹部其實仍發揮著重要作用。政治局的新常委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喬石和姚依林都不是極端派。姚依林被公認是精明能幹的管理者，得到陳雲的強烈支持。好在胡啟立和喬石都堅定地支持改革，這就保證了趙紫陽在常委中能成為改革的多數派。和兩年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一樣，選拔標準強調教育背景、領導業績和相對年輕。經過這次人事變動後，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降低了五歲。

另外，十三大的中央委員會的產生，是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實行了差額選舉，因此就排除了最不受歡迎的候選人，保證了當選者至少擁有其他人最低限度的支持。大會第一輪投票時，候選人比實際名額多出十人，因此得票最少的十人落選。鄧力群便是落選的十人之一。^[19-120]這反映著鄧力群受到普遍排斥，也表明胡耀邦得到普遍同情。^[19-121]隨著鄧力群離開中央委員會，兼之他的主要工作單位書記處研究室被解散，趙紫陽不像胡耀邦，他不會再被這個中國最執著的保守派揪住不放了。

十三大避免了害怕改革的保守派和擔心停滯的改革派之間的尖銳分歧。兩個最具爭議、作為對立兩派代表的幹部——總書記胡耀邦和他的批評者鄧力群——都被撤職，這使中間派更容易齊心協力繼續推動市場改革和溫和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保守派和改革派所爭論的關鍵問題在十三大之前的幾年裏就已經轉向更開放、更多的言論自由和更多的市場改革。趙紫陽在十三大上進一步推進了這一轉向，儘管鬥爭仍在繼續。鄧小平把他認為過於寬容的胡耀邦成功搞下了台，並沒有破壞中共上層的團結。趙紫陽堅持鄧的四項基本原則，推進鄧的經濟和政治設想，鄧有理由希望在自己退出之後，趙將有效引導中國走向改革的下一階段。

[19-1]SWDXP-2, p. 310.

[19-2]Ming Ruan,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pp. 93–94.

[19-3]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冊）（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1980年9月24日，上冊，頁497。

[19-4]Ruan, *Deng Xiaoping*, pp. 91–103;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Readjustment, Ensure Stability and Unity,” SWDXP-2, pp. 335–355.

[19-5]SWDXP-2, p. 303. 關於這個問題的背景和解決過程見 Melanie 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ublic Policies, Social Norms, and Private Interest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sp. pp. 48–49.

[19-6]SWDXP-2, p. 332.

[19-7]SWDXP-2, pp. 341–342.

[19-8]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5.

[19-9]Manion, *Retirement of Revolutionaries in China*, pp. 55–56;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44–145.

[19-10]《紅旗》雜誌，1982年第6期，頁5，轉引自 Wolfgang Bartke and Peter Scheier, *China's New Party Leadership: Biographies and Analyses of the Twelf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26.

[19-1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208頁；楊繼繩：《鄧小平時代：中國改革開放20年紀實》（上下冊）（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下冊，頁479–480；SWDXP-2, p. 368–369；Richard Kraus, “Bai Hua: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of a Writer,”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Timothy Cheek, eds., *China's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6), pp. 185–211. 劇本的部分內容見 Michael S. Duke, *Blooming and Conte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8–112；

W. J. F. Jenner, "1979: A New Start for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6 (June 1981): 274–303.

[19-12]這類文學的部分作品見 Xinhua Lu et al., *The Wounded: 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77–78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1979); Perry Link, ed., *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erry Link, ed., *Roses and Thorns: 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 197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Binyan Liu, *People or Monsters? And Other Stories and Reportage from China after Ma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對這些作品的背景說明見 Link 著作的導言 以及 Merle Goldma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另參見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對這位作家的作用和寫作背景的說明見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9-13]Link, *Stubborn Weeds*, pp. 21–23.

[19-14]Ruan, Deng Xiaoping, pp. 116–117.

[19-15]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

[19-16]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

[19-17]Ruan, Deng Xiaoping, pp. 120–121. 另據作者在 1993 年至 1994 年對阮銘的採訪。

[19-18]楊繼繩:《鄧小平時代》, 頁 177–179; 作者 2006 年 8 月對孫長江的採訪。

[19-19]Ruan, Deng Xiaoping, pp.121–130.

[19-2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1983 年 3 月 14 日, 頁 859。

[19-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 1983 年 3 月 15 日, 頁 859; Ziyang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pp. 115–116.

[19-22]Ruan, Deng Xiaoping, pp. 129–130;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 頁 256–25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1983 年 3 月 17 日, 下卷, 頁 322–323。

[19-23]《陳雲年譜(1905–1995)》, 1983 年 3 月 17 日, 下卷, 頁 322–323。

[19-2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 頁 258–259。

[19-25]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下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 2007), 1986 年 11 月, 下冊, 頁 1293。

[19-26]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下冊)(香港:泰德時代出版社, 2007), 1986 年 11 月, 下冊, 頁 1215。

[19-27]轉引自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 117.

[19-28]轉引自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19–120.

[19-29]轉引自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70–272.

[19-30]SWDXP-3, pp. 47–58.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22–127.

[19-31]SWDXP-3, pp. 47–58.

[19-32]SWDXP-3, p. 47;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 頁 274–275。

[19-33]Ruan, Deng Xiaoping, p. 135; Binyan Liu, *A Higher Kind of Loyalty: A Memoir by China's Foremost Journalist* (New York: Pantheon, 1990), p. 173;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21–128;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269–312。

[19-3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38。

[19-3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15、336–343。

[19-36]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37–165;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20–322。

[19-3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1月2日,頁 1023。

[19-38]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310。

[19-39]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080–1086。

[19-40]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20–322、346–347。

[19-4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20–322、346–347。

[19-42]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36–343。

[19-43]作者 2006 年 8 月和 9 月對朱厚澤的採訪。

[19-4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70。

[19-45]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70。鄧力群說是鄧小平讓胡喬木準備這篇講話的,但是據編輯過這個文件的胡耀邦的友人說,鄧小平說胡喬木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犯了一個錯誤,他要自己修改講話稿,而不是請胡喬木去做。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085。

[19-46]SWDXP-3, pp. 146, 148.

[19-47]SWDXP-3, p. 148.

[19-48]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5年9月18日,下冊,頁 1042–1045。

[19-49]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310。

[19-50]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113、1303–1310。訪談全文見頁 1110–1116。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45–446。

[19-51]據唐·凱瑟爾(Don Keyser)報告,2010年2月,他當時是美國駐華使館的官員。

[19-52]Baum, *Burying Mao*, pp. 187–188.

[19-53]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年1月16日,下冊,頁 1310。

[19-54]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47。

[19-55]"Younger People Elected to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Xinhua*, September 22, 1985; Daniel Southerland, "China Replaces 91 in Party Committee: Move Seen Strengthening Deng's Control,"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1985, A17.

[19-56]2001年6月和2002年11月對澳大利亞總理霍克的訪談,他曾陪同胡啟立在澳大利亞訪問。

[19-5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5年9月18日,頁 1078–1080。

[19-58]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365。

[19-59]SWDXP-3, p. 16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6年6月10日,頁 1120–1121。

[19-60]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年5月,下冊,頁 1212; 1987年1月16日,下冊,頁 1311。

[19-61]SWDXP-3, p. 16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6年6月28日,頁 1125–1126。

[19-62]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頁 21、27–35。

[19-63]Yizi Chen, "The Decision Process behind the 1986–1989 Political Reforms," in Carol Lee Hamrin and Suisheng Zhao, eds., *Decision-Making in Deng's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Insid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5), p. 135; Guoguang 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1986–1989,"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ch. 2. 吳國光是政治研究室的成員之一，1989 年春來到美國。研究室的成員還有嚴家其和陳一諮。見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Zhao Ziyang and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8).

[19-64]1986 年 9 月 13 日鄧小平會見財經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趙紫陽、姚依林、田紀雲等人討論經濟問題和十三大的準備工作，鄧小平再次談到要黨政分開，下放權力，理順政府職能。他說，黨應當只管黨員的紀律，法律問題應當留給政府去做。見《鄧小平年譜（1975–1977）》，1986 年 9 月 13 日，頁 1137；SWDXP-3, p.17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 200–201。

[19-65]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19-66]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19-67]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19-68]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19-69]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80。

[19-70]David Bachman, "Differing Visions of China's Post-Mao Economy: The Ideas of Chen Yun, Deng Xiaoping, and Zhao Ziyang," *Asian Survey* 26, no. 3 (March 1986): 292–321.

[19-71]SWDXP-3, p. 213.

[19-72]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n100.

[19-73]電視機數量的數據取自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p. 35; and Robin Munro, "Political Reform,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nd the Conservative Backlash," in Robert Benewick and Paul Wingrove, eds., *Reforming the Revolution: China in Transition* (Chicago: Dorsey, 1988), p. 71. Munro 是當時的駐華記者。

[19-74]2004 年 10 月對新加坡官員的採訪。另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2004），頁 317–326。

[19-75]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對當時社會狀況的研究參見 Deborah Davis, Thomas B. Gold, Gail Henderson, Charlotte Ikels, Richard Madsen, 及 Andrew Walder 等人的文章，載 Deborah Davis and Ezra F. Vogel, eds.,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03.

[19-76]見 Stanley Rosen, "The Impact of Reform Policies on Youth Attitudes," in Davis and Vogel,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p. 292.

[19-77]Benedict 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An Interim Report* (New York: Praeger, 1988), pp. 89–107. Stavis 從 1986 年 9 月到 1987 年 1 月在上海復旦大學，經歷過這些事件。

[19-78]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2 月 27 日，下冊，第 1297 頁；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79。

[19-79]SWDXP-3, pp. 194–196.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6 年 12 月 30 日，頁 1160–1162。

[19-80]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2 日，下冊，頁 1182；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1 月 2 日，下冊，頁 1302。

[19-81]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1 月 6 日，下冊，頁 1302。

[19-82]見 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pp. 90–96. 又見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194–203；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279、1301。

- [19-8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 1165，1987 年 1 月 13 日。
- [19-84]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82。
- [19-85]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9 日，下冊，頁 1182。
- [19-86]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1 月 10 日，頁 1303-1304。
- [19-87]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95-1196。
- [19-88]鄧力群批評胡耀邦的全文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17-445。
- [19-89]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 568-622，此書的摘譯見 Qiren Mei, ed., "Three Interviews with Zhao Ziyang,"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8, no.3 (May-June 2005); 宗鳳鳴：《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176-182。
- [19-90]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15 日，下冊，頁 1185。
- [19-91]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47-448。
- [19-92]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186。
- [19-93]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307-1309。
- [19-94]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 ch. 2, n101.
- [19-95]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7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187-118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1978.12-2002.5）》（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 修訂版），1987 年 1 月 16 日，頁 224。
- [19-96]3 號文件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下冊，頁 1313-1314。
- [19-97]3 號文件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 月 19 日，下冊，頁 1313-1314。
- [19-98]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89-1190；3 號文件見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 月 19 日，下冊，頁 1313-1314、1319-1320。
- [19-99]對朱厚澤（2006 年 8 月、9 月）、吳明瑜（2006 年 8 月、2007 年 7 月）、于光遠（2003 年 2 月、10 月、2005 年 6 月）和李銳（2006 年 2 月、8 月和 2007 年 7 月）的採訪。
- [19-100]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頁 473；鄭仲兵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下冊，頁 1190-1195。
- [19-101]杜導正：《杜導正日記：趙紫陽還說過什麼》（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0），頁 151。
- [19-102]James Tong, ed., "Party Documents on Anti-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and Hu Yaobang's Resignation,"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1, no. 1 (Spring 1988): 29-38.
- [19-103]《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1987 年 1 月 13 日，頁 224。
- [19-104]Stavis, *China's Political Reforms*, pp. 111-128;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14-225; Baum, *Burying Mao*, p. 209.
- [19-105]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3 月 29 日，下冊，頁 1319。
- [19-106]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p. 204-214.
- [19-107]Baum, *Burying Mao*, pp. 211-215; *ibid.*, pp. 225-232.
- [19-108]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67-468；作者在 2006 年 2 月、8 月和 2007 年 7 月對李銳的訪談。
- [19-109]杜導正：《杜導正日記》，頁 160。
- [19-110]杜導正：《杜導正日記》，頁 173-174。
- [19-111]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6 年 11 月 11 日，下冊，頁 1290。
- [19-112]盛平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1987 年 1 月 16 日，下冊，頁 1306。
- [19-113]SWDXP-3, p. 395, n. 117.
- [19-114]鄧力群在 5 月 13 日講話的觀點見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59-460。

[19-115]Anthony J. Kane, "1987: Politics Back in Command," in Anthony J. Kane, ed., *China Briefing, 1988* (New York: Asia Society, 1988), p. 11.

[19-116]2004 年 10 月對新加坡官員的採訪：《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7 年 5 月 29 日，頁 1191。

[19-117]Chi Huang, "Deng's Ideas on Political Restructuring," *Beijing Review* 30, no. 39 (September 29, 1987): 14–15.

[19-118]Ziyang Zhao, "Advance alo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 Review* 30, no. 45 (November 9–15, 1987): xv–xxi. 關於事件之後不久寫下的有關政治改革的記述，見 Tony Saich,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in Benewick and Wingrove, *Reforming the Revolution*, pp. 27–47.

[19-119]Saich, "Reforming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pp. 27–47.

[19-120]Wu, "Hard Politics with Soft Institutions," ch. 2;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頁 472–473。

[19-121]鄧力群顯然受到了傷害，他在《十二個春秋》中對這件事的背景作了很細緻的描述，見該書頁 467–478。

第 20 章

北京之春：1989 年 4 月 15 日–5 月 17 日

從 1989 年 4 月 15 日到 6 月 4 日，在舉世矚目之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人走上了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頭。^[20-1]4 月 15 日胡耀邦驟然離世後的最初幾天，示威者絕大多數是涉世不深的年輕人，他們要向這位剛離世的英雄和他所支持的民主表達敬意。最初開始集會時，他們表現出對中共的尊重，遊行過程秩序井然，並未給交通造成干擾。起先他們也沒有政治綱領，然而，隨著示威日益擴大，要求變得越來越強烈，內容也越來越激進，示威者與當局的緊張關係不斷升級。衝突在 6 月 4 日達到頂點，軍隊在這一天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恢復了秩序。

當時鄧小平已 84 歲，他沒有去街頭會見示威學生，也沒有插手中共每天作出的反應。但是他身居幕後，一直關注著局勢的演變，是最終的決策者。他並不贊同示威者的言行，他們都是鄧所推動的改革開放和為經濟增長提供基礎的政治穩定的受益者，而現在他們正在威脅這種穩定。

鄧小平試圖避免東歐發生的事情在中國重演，那裏因國家領導人向民眾的要求讓步而導致了失控。鄧小平最初想避免流血，他知道那只會給示威者火上澆油。但是他從事發之初就相信必須立場堅定，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後，他開始更為直接地參與掌控黨對示威者的反應。他要確保幹部能夠落實他認為恢復秩序所必需採取的措施。

在 6 月 4 日之前，無論何人，不管是中共領導人、知識分子還是學生領袖，事實上都無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亂局。黨內領導層的分裂，對中國當時能容許多少自由的分歧，曾為革命浴血奮戰的老幹部和習慣於舒適生活的學生之間的觀點差異，城市居民擔心通貨膨脹與就業的不安全感，示威運動的浩大規模，以及學生領袖在控制自身運動上的無能，國內外民眾對示威者的同情，中國軍隊在控制群體事件上缺少經驗——凡此種種，使中共領導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籌莫展。

中共老一代領導人在 1949 年以前參加的學生運動，有著良好的組織，經過周密思考的計劃和綱領，到 1949 年時學生領袖們已經共同奮鬥了多年。1960 年代後期的學生有參加紅衛兵的經歷，但是在 1989 年以前的十幾年裏，嚴密的控制阻礙了有組織的獨立學生運動的發展。1989 年聚集成群的學生沒有任何組織經驗。能言善辯的演說家可以脫穎而出成為領袖，但他們缺少組織、綱領和確保服從的程序，因而沒有代表其他學生與政治領導人進行談判的基礎。

市民沒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為他們贊同學生的批評。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壓的老知識分子試圖阻止學生採取激進行動，但實際上也讚賞學生們大膽表達了他們自己不敢表達的觀點。最初自發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動，演變成了遊行、政治辯論、露營、憤怒的示威、絕食和日益失控的衝突。

示威學生要求改善生活條件，他們不滿於自己既有能力又辛苦工作，得到的報酬卻少於沒有受過教育的企業主。不過他們也從 1986 年學生運動的失敗中汲取了教訓，即爭取廣大群眾的支持對於他們的事業很重要。因此他們在 1989 年不再抱怨自己可悲的生活條件，而是採用了能引起民眾共鳴的籲求：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負責任的黨、獻身公益的幹部隊伍。

全世界的電視觀眾被中國青年人這些發自內心的溫和訴求所打動，這反過來又讓示威者更加振奮。外國駐華記者的工作長期受到中國官員的騷擾，他們的活動被監視，敢於揭露問題的受訪人被逮捕，因此外國記者熱衷於傾聽學生的要求。在 4 月 15 日之前，大多數學生還不敢跟外國記者公開交談，然而在 1989 年春天的事件過程中，他們的膽子變得越來越大，記者們將他們對民主社會的憧憬傳播出去，為他們贏得了全世界的同情。

學生一方情緒高漲，不僅因為他們在國內外獲得了巨大支持，還因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敗告終。當大批學生突破警察的封鎖線時，學生和外國觀察者都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希望，以為政府最終會向他們的理想讓步。當時學生們很難想像政治領導人會動用武力，人民解放軍會向北京街頭手無寸鐵的市民開槍。

中國的領導層一方能夠看到外國人的關注與支持在鼓舞著學生，但他們很難相信中國民眾對自己的領導人會那麼憤怒，因而易於認為示威有國內外的「幕後黑手」從中操縱。有關這些「幕後黑手」的傳言在高層幹部中間廣為流傳，並被保守派用來作為促請鄧小平採取強硬措施的理由。

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從南方過冬返回北京後不久，出席了 1989 年 4 月 8 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會議開始還不到一小時，他便因嚴重的心臟病發作而栽倒在地。緊急送往醫院後他似乎有恢復的跡象，但在 4 月 15 日凌晨猝然去世。群眾從晚間 7 點的電視新聞中得知了他的死訊，次日的電視和報紙又發佈了正式的訃告。這一消息令舉世震驚，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預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連一些強硬派也不例外。^[20-2]鄧力群是胡耀邦最高調的批評者和 1987 年 1 月批胡的帶頭人，但這時他也讚揚了胡耀邦。他後來寫道，胡耀邦從來不搞陰謀，胸懷坦蕩，對人不抱惡意。鄧力群還說，與胡相比，趙紫陽則參與過陰謀和整人。^[20-3]

群眾能夠長期被胡耀邦所感動，不僅因為他熱情親切，還因為他做人正派，對黨忠心耿耿。他是知識分子的希望，曾為他們作過勇敢的鬥爭。他是他們心目中好幹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無任何腐敗劣跡。他曾長期擔任團中央總書記，能夠與他所培養和提攜的年輕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 1987 年卻被冷酷地免職，因為他被指責為對 1986 年的學生示威太軟弱。

1989 年的示威活動是對鄧小平無意促進民主和沒有支持胡耀邦工作的含蓄批評。胡耀邦的朋友覺得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據他們說，胡耀邦為此深受傷害。他曾忠心耿耿為鄧小平工作，鄧的批評尤其讓他傷心。1987 年被免職後，胡耀邦不再看電視，人也瘦了下來。^[20-4]很多人認為他死於徹底失望，是自由民主事業的烈士。但是，很多參加示威的人關心的並不是胡耀邦個人，而是把他作為推動自由民主的一個契機。事實上，很多知識分子後悔自己在 1986 年的學生運動中過於順從，使運動輕而易舉地得到平息。現在他們決心更堅定地站出來。

當學生們利用悼念胡耀邦去促進自由民主事業時，1976 年 4 月 5 日的示威（為悼念周恩來）和 1989 年 4 月的示威（為悼念胡耀邦）之間明顯的相似性，足以使學生們受到鼓舞，也令中國領導人感到擔憂。1976 年的示威稱為「天安門事件」，而 1989 年的示威也同樣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像周恩來一樣，胡耀邦努力保護人民，含恨而終。不論 1976 年還是 1989 年，群眾對於受他們愛戴的人沒有得到更多的尊重而義憤填膺。1976 年的示威者借機抨擊「四人幫」，現在不是也可借機批評鄧小平和總理李鵬嗎？1976 年春天被逮捕的人在 1978 年秋天就得到了平反並被稱為愛國者；那麼 1989 年的示威者難道不可能以後被稱為愛國者嗎？在那些希望有一個更仁慈的政府的人們中間，胡耀邦已經取代了周恩來，成了當時的大英雄。

騷動的根源

1989 年春天，高層領導人——特別是趙紫陽與李鵬——之間的政治分歧，加上鄧小平逐漸退出對日常工作的領導，導致了相互衝突的信號和困惑。這種不確定的環境使得引發社會騷動的嚴重問題在下層進一步發酵和加劇。在 1980 年代末，大多數學生更加關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們個人的自由，如自主擇業和擺脫「政治輔導員」的權利。大學生們通過艱難的高考證明了他們的能力與勤奮，覺得有資格獲得他們想要的工作。但是在 1989 年，由於重要的產業和政府機關缺少訓練有素的大學畢業生，政府的政策仍然要求大學畢業生服從工作分配。由於每個學生的工作分配部分地取決於同學生住在一起的政治輔導員如何在學生的檔案中寫「小報告」，政治輔導員便成為政府監控的象徵。這些給學生寫報告的政治輔導員的教育水平很少趕得上學生，有些輔導員被懷疑有偏向，有些甚至炫耀自己有權影響學生的前程。很多眼界開闊、思想獨立的學生，對於要不斷討好輔導員深惡痛絕。對他們來說，「自由」就是取消這些政治輔導員，使他們能夠自主擇業。學生們其實很少花時間討論選舉制度。

知識分子，不論年輕年長，仍對 1983 年的反精神污染和 1987 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耿耿於懷。大受歡迎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在 1980 年代末播放了不長的一段時間（後被保守派封殺），它批判象徵傳統中國的黃河，讚揚給中國帶來國外新思想和現代行為方式的藍色海洋文明，引起很多知識分子的共鳴。^[20-5]

對普通民眾來說，主要的擔憂則是通貨膨脹。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國企職工等拿固定工資的人，看到有錢的私人經商者炫耀其物質財富，推高市場價格，威脅到工薪階層獲得基本溫飽的能力，這讓他們感到憤怒。這個問題又因腐敗而加劇：鄉鎮企業的從業者從政府和國有企業獲取短缺的原料和資金以自肥，自主經營的企業家賺到的錢至少部分來自

鑽政府的空子。「官倒」想方設法把社會財富裝進自己腰包，遵紀守法的幹部的收入卻停滯不前。^[20-6]農民工開始紛紛湧入城市，也加劇了通貨膨脹問題。

官方數字儘管低估了實際變化，仍顯示 1987 年至 1988 年北京的消費物價上漲了 30% 以上，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資、過去 30 年來一直有著物價穩定預期的家庭感到恐懼。此前為養老和以後生病而攢錢的節儉家庭，卻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貶值。由於物價持續上漲，政府又聲稱要進一步放開價格管制，使憤怒變成了恐慌。

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政府幹部一向受到為社會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們憤怒的是，中國社會中最不道德的人，只為自己幹活的人，和為謀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資源的人，如今能夠出入高檔餐館，住好房子，穿著時尚，買得起摩托車甚至是汽車。沒有哪個城市像北京那樣，集中了如此之多拿工資的機關幹部或將在畢業後靠固定工資過日子的大學生。這些人認為，國營企業應當用它的更多收入給職工加薪或至少提供更多福利。在 1989 年春天群情激奮的氣氛中，甚至一些憤怒的機關幹部也冒險加入了示威，並且打出自己機關單位的旗號。不過，即使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學生們反通脹、反貪官的口號，也洩放出了他們積蓄已久的憤怒。

中國民眾提到「貪官」時，並不是在說犯法的人，因為當時法制的觀念並不強；他們指的是那些利用別人沒有的職務或個人關係謀取私利的人。對「官倒」怒不可遏的抗議學生要求公佈他們的收支、他們擁有的別墅數目以及他們子女的金錢來源。^[20-7]1966 年時有很多高幹子女踴躍參加紅衛兵反對「走資派」，但在 1989 年高幹子女很少加入抗議活動。相反，他們和父母一起因為享有特權而受到抨擊，因為他們把權力地位變成了在新的市場經濟中謀利的資本。

對於國企職工來說，企業被迫進入市場後他們可能丟掉「鐵飯碗」——即得到保障的工作和福利——這比通貨膨脹還可怕。政府已經開始向虧損的國企施壓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業甚至獲准破產，引起了職工的恐慌。這對工人們有極其重大的利害關係，因為中國當時沒有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大的國有企業很像美國的軍事基地，不但是經濟單位，而且是一個完整的社會，它們提供有補貼的住房和醫療，甚至職工子女的教育。對於國企職工來說，失去工作就等於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場會把國有企業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 1980 年代中期，隨著經濟的增長，很多農民工湧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機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築業。但是 1988 年底為控制通貨膨脹對經濟採取的緊縮政策，使他們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機會。很多失業後仍留在城裏艱難度日的人，卻看到「官倒」和大款們在炫耀財富。總之，對很多人來說，市場力量帶來的巨變讓他們深感不平。

除了這些不滿的來源，還有很多人想得到自由遷徙之外的更多的權利。他們厭倦了生活在因「政治錯誤」而挨整和受罰的恐懼之中。自由民主的呼聲和對胡耀邦的讚美凝聚成了一種訴求，要擺脫國家的監管，擺脫官方強加的批評會。

從悼念到抗議：4 月 15—22 日

4 月 15 日傍晚，在宣佈胡耀邦去世幾小時後，北京大學的牆上就貼滿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報。^[20-8]次日，大約 800 名學生從學校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對於從大學前來悼念的人並未進行干預。

隨著廣場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動也開始有了政治意味。4 月 18 日一大早，數百名學生穿過天安門廣場來到人民大會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幾條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推翻 1986 年懲罰抗議者的決定，公開領導人及其子女的資產。當晚 11 點左右，數千名憤怒的抗議者從天安門廣場來到幾百米開外的黨政機關所在地中南海的新華門前。他們不斷高呼口號，要求進入中南海。警察請求他們離開但遭到拒絕。人群一直堅持到次日凌晨 4 點，警察才終於將其驅散。自共產黨 1949 年掌權以來，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進入中南海。正如李鵬所說，在 4 月 18 日這一天，示威的基調從悼念變成了抗議。^[20-9]

中南海裏很容易聽到新華門外人聲鼎沸，這使高層領導很快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後匆忙從日本回國的李鵬，在採取什麼措施上與趙紫陽發生了分歧。李鵬對趙紫陽說，要作出強硬的反應；作為當家人的總書記趙紫陽則認為，最好不要激怒學生，只要不發生打砸搶，採取強硬行動就是不明智的。^[20-10]

4 月 21 日的示威規模進一步擴大，廣場上的演講者也開始要求更多的民主。^[20-11]為了使學生平息下來，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指示大學幹部維持校園的各項正常活動，對學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中南海增加了一個團的兵力，以防學生衝進大門。《人民日報》宣佈禁止遊行示威，並警告學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誤以為是軟弱」。但是領導層嚴重錯估

了形勢，學生們誇示著自己的力量，拒絕平復下來。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大約有2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通過廣播喇叭仔細聆聽20分鐘的悼詞。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遺體被送往安葬高級幹部的八寶山。追悼會過後，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等了大約三小時要求見李鵬。他們後來抱怨說，他們受到慫恿，相信李鵬或另一名高級幹部會出來見他們，但李鵬和其他官員聲稱李鵬對此並不知情。^[20-12]當時李鵬不同意接見任何非官方的學生團體，因為他擔心這會使這些團體獲得他所不願給予的合法性。李鵬還擔心這樣做會削弱黨所支持並具有更強控制力的官方學生組織。

李鵬和鄧小平的「四二六社論」

學生悼念胡耀邦時，鄧小平對他們沒有採取任何限制措施。不論鄧小平在胡耀邦掌權的最後幾年如何批評他，胡仍然被認為是一個為改革開放作過貢獻的忠誠幹部。鄧小平知道，壓制學生的悼念活動只會激怒他們，就像1976年4月阻止悼念周恩來逝世點燃了抗議者的怒火一樣。但是，悼念活動一結束，鄧小平已經打算向學生發出警告。恰在這時，主張採取強硬路線的李鵬臨時取代趙紫陽，接過了處理示威活動的工作。

按照早已確定的行程，趙紫陽出訪北韓將從胡耀邦追悼會後的4月23日開始。據趙紫陽說，他動身之前去見鄧小平時，鄧小平告訴他仍然應當去北韓訪問，並且他回國後將被提拔為中央軍委主席，這說明當時鄧小平仍把趙紫陽視為他的接班人。因此趙紫陽按照行程於4月23日準時從北京火車站動身前往平壤。^[20-13]李鵬為了平息他與趙紫陽有衝突的傳言，去火車站送趙紫陽離京。趙紫陽對李鵬說，自己不在時李可以自行決定召開政治局會議。

趙紫陽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會之後人群就會散去，然而他們並沒有散去。就在趙紫陽離京的當天，儘管有不允許學生成立組織的禁令，來自21所高校的學生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他們決定不能像1986年的學生那樣輕易結束示威，現在這個學生團體要更加頑強。學生的組織者早先曾宣佈將在5月4日以後復課，現在他們推翻了這一決定，宣佈將無限期延長罷課時間。^[20-14]

趙紫陽出國後，臨時接過工作的李鵬知道責任重大，於是去諮詢楊尚昆。楊尚昆認為，鑒於局勢的嚴重性，應當向鄧小平彙報。當天傍晚李鵬和楊尚昆就向鄧小平彙報了他們的看法，認為對抗議活動要採取堅決果斷的行動。李鵬說，學生已經開始批評鄧小平本人，而且還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進展：新華門前的扭打，六萬名學生仍在罷課的報告，交通受阻，有關試圖推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幕後黑手」的報告，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事態之嚴重。^[20-15]鄧小平同意要對學生發出警告，說明他們行動的嚴重性。此後，鄧小平便深深捲入了應對示威者的決策之中。

李鵬於次日召集政治局會議，聽取了負責監控首都事態的北京市領導陳希同和李錫銘的彙報。有觀察家認為，這兩個人由於害怕為可能出現的問題承擔責任，誇大了示威的嚴重程度，使鄧小平對實際情況產生了誤解。但其他幹部認為形勢確實嚴峻，李錫銘和陳希同對天安門廣場情況的報告是準確的。

4月25日上午10點鄧小平在家裏與李鵬和楊尚昆會面，聽他們彙報情況。李鵬在日記中說：鄧小平在4月23日就決定了必須發出嚴厲警告。^[20-16]聽完他們的彙報後，鄧小平說，必須終止這場動亂——像波蘭那樣縱容示威活動的其他共產黨國家，黨的權力垮掉了。因此中國領導人必須明確堅定地結束動亂，控制住局勢。鄧小平還說，要立即發表一篇權威社論向學生發出警告。要告知北京地區的領導人堅定立場，並指示高校的黨政領導把事態平息下去。^[20-17]

鄧小平對社論的內容親自作出指示，就像通常作出重要決策時一樣，他認真準備了自己的意見。胡啟立受命負責起草社論，由筆桿子胡喬木定稿。社論於當晚在電台播出，第二天即4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20-18]社論讚揚了大多數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譴責一些悼念者有不當言行。按照社論的說法，一些示威者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甚至成立非法組織，試圖從得到政府批准的學生組織手中奪權。他們參與罷課，引發試圖推翻共產黨領導的「動亂」。他們打著民主旗號破壞中國式的民主。不制止這場動亂就會導致社會混亂。鬥爭是嚴肅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組織，禁止非法遊行。對任何造謠惑眾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責任。^[20-19]

李鵬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論能夠嚇住學生使其屈服，畢竟，社論發出的嚴厲譴責等於政府公開威脅要逮捕很多學生領袖。然而令鄧小平失望的是，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了更多的學生加入他們的行列。李鵬在日記中說，「四二六社論」取得了成功，然而來自廣場的報告認為它不過是激怒了學生。比李鵬更瞭解學生情緒的大學校長和管理人員覺得，社論毀掉了本來可以和平化解學生不滿的對話的基礎。在他們看來這篇社論的語氣太強硬了。^[20-20]84歲高齡的鄧小平很少出門，也很少跟人交談，不再能敏銳地感受民眾的情緒。有些幹部相信，

倘若周恩來還活著，他會與學生取得諒解。但是在 1989 年 4 月，沒有哪個領導人既擁有提出解決方案的權威，又具備在革命老幹部和青年人之間建立溝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趙紫陽，儘管他後來主張與學生對話，撤銷「四二六社論」，但當時他也是態度疏離，並沒有被學生視為同情他們的盟友。學生指責他的兒子搞腐敗，批評他打高爾夫球。

戰線隨著「四二六社論」的出現拉開。示威領袖把鄧小平和李鵬視為他們的敵人。示威的規模越來越大，輕易便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線，因為警察被通知反應要有節制，以免造成流血。^[20-21]但是，領導層也不願有絲毫動搖。鄧小平不肯撤銷「四二六社論」，因為他擔心這將削弱黨的權威。雖然李鵬等官員放棄了最初不願與學生對話的態度，但他們在會見學生時仍堅守防線，未能緩解局勢。例如，在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和教育部副部長何東昌 4 月 29 日下午會見 45 名學生時，袁木拒絕承認腐敗是一個嚴重問題，並且否認存在新聞審查制度。學生們離開時比此前更加憤怒。^[20-22]

學生獲得了如此廣泛的同情，以至於李鵬很難在下級官員中為鎮壓行動獲得支持。分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對他的同事解釋說，很多報社的記者對於他們報道廣場真實事態發展的文章不能發表感到不滿。被告知要平息示威的高校幹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傳達給學生，但很多人內心並不贊同。^[20-23]李鵬甚至無法指望官方媒體支持他。有時候報紙的準時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響。在國家電視台上，報道廣場情況的節目會突然中斷，一度出現黑屏，畫外音也完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員說：「今天沒有新聞。」^[20-24]6 月 4 日以後中宣部部長和《人民日報》總編被免職，因為他們被認為在示威期間過於同情學生。

李鵬和趙紫陽的分裂：4 月 29 日–5 月 12 日

面對規模日益擴大的群眾示威給政府和黨造成的壓力，高層領導出現了兩極分化。害怕混亂的一方認為必須進一步加強控制，另一方則相信應該對學生的要求採取更寬容的態度。李鵬是前一派的象徵和中心人物，趙紫陽則代表後者。李鵬的日記中每天都記錄著對趙紫陽的批評，他說鄧小平在 1988 年秋天之前就已經對趙紫陽處理經濟工作的表現有所不滿；鄧還不滿趙紫陽在政治上軟弱，沒有堅定支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並且不願意為惡性通貨膨脹和群眾對放鬆價格管制的反應承擔全部責任。^[20-25]相反，趙紫陽則說，局勢是在他出訪北韓以及李鵬向鄧小平彙報了示威可能帶來的威脅之後惡化的。^[20-26]鄧小平和其他黨內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鵬。從北韓回國後即主張撤銷「四二六社論」的趙紫陽，則獲得了知識分子、改革派、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支持。

李鵬和趙紫陽都設法避免使他們的分歧公開化。李鵬 4 月 23 日為趙紫陽出訪送行，又照例於 4 月 30 日迎接趙紫陽回國。然而，他們個人之間的分歧與對抗，以及各自營壘的影響力，卻遠遠強過他們合作的願望。自 1988 年夏天以來，兩人之間的矛盾就因為經濟問題的累積和趙紫陽要對中國的高通脹負責而不斷加劇。當時趙紫陽名義上仍是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但對政府經濟班子的控制權已經從趙紫陽轉移給了李鵬。責任重疊之處，便成了作為改革派的趙紫陽與李鵬這個謹慎的計劃派之間的戰場。

李鵬是個穩重的幹部，學水利工程出身，有盡責有效的行政官員的名聲。他是革命烈士的後代，也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的眾多養子之一，這使他有著特殊身分。事實上，他想必具有很高的才能，才得以通過嚴格的篩選去蘇聯學習先進科學知識，但他在領導人中間並不以才華著稱。他表達個人見解時總是態度謙遜，對黨十分忠誠，工作勤懇而投入——無論老幹部們的指示多麼不受歡迎，他總是樂於依照他們的意願行事。他的固執而又謹慎的性格，與熱情且富有同情心的胡耀邦、或者超然而具有紳士風度和分析才能的趙紫陽形成了鮮明對比。李鵬難以掩飾他對示威者的輕蔑，因此他與他們見面只能激化而不是平息他們的怒氣。

當 4 月 25 日鄧小平向李鵬說明他認為很有必要發表一篇社論時，鄧的講話要點也送達了還在平壤的趙紫陽。趙在一間掛著黑色窗簾的密室裏讀了鄧小平的意見後，立刻發回電報說：「我完全同意鄧小平同志對目前的動亂問題作出的決策。」^[20-27]李鵬在日記中強調，趙紫陽對社論是同意的。但事實上趙紫陽同意的是鄧小平 4 月 25 日的講話，而不是根據講話寫成的《人民日報》4 月 26 日社論。

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很快就斷定黨和學生之間已經形同水火，若不撤銷社論，幾乎毫無和解希望。他甚至一度同意，如果撤銷社論，他願意為此承擔全部責任。^[20-28]趙紫陽很瞭解鄧小平，他想必知道讓鄧小平撤銷社論的希望很渺茫。確實，鄧小平認為優柔寡斷和推翻決定只會削弱黨的權威，因此拒絕撤銷社論。對於學生一方，趙紫陽盡量緩和矛盾：他強調絕大多數學生都是愛國的，試圖以此讓他們放心不會受到懲罰；他還鼓勵他們離開廣場回到課堂。

5月1日，趙紫陽從平壤回國兩天後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如何應對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時可能發生的示威。他主張發表一個聲明，表明黨支持加強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以適應時代的變化。但李鵬認為政府的頭等大事是穩定，他批評了非法組織和散佈謠言。他堅持認為，如果放任這些年輕人，中國就會發生大倒退。趙紫陽反駁說，儘管中國確實需要穩定，但學生的口號，如擁護憲法、促進民主和反腐敗，與黨和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20-29]

與李鵬生硬而嚴厲的語調相反，趙紫陽的態度就像一個寬厚的長者去勸說本質不錯的孩子。5月3日和4日，趙紫陽在兩次重要的公開講話中說明了要正面看待學生要求的理由。他在5月3日紀念五四運動的大會上說，七十年前的示威者推動了科學與民主，今天的示威者也應當重視科學和民主在實現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強調了穩定和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但他同時又說：「廣大群眾包括廣大學生希望推進民主政治，要求懲處貪污腐敗，……這也正是我們黨的主張。」^[20-30]像往常一樣，黨的領導層試圖表現出他們的一致面。趙紫陽的講話在文字上作了仔細推敲，使保守派無可指責。

在5月4日亞洲開發銀行年會的講話中，趙紫陽也努力向外國投資者保證，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秩序沒有陷入混亂，學生示威很快就會得到控制。趙紫陽5月3日的講話在發表之前要送其他領導人圈閱，這次講話則不必經過高層領導的審查，因為他在亞洲開發銀行這樣的經濟機構講話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儘管如此，後來他還是受到批評，說他沒有事先把講話送元老們過目。^[20-31]這篇由鮑彤推敲過措辭的講話也對學生進行了廣播。趙紫陽在講話中承認，黨內確實存在腐敗問題，他將之歸咎於社會主義法制不完善、缺乏開放性和民主監督。他重申學生是愛國的。^[20-32]學生因趙紫陽的講話而平靜下來，天安門廣場的示威人數驟減。

此時，香港媒體特意點出了趙紫陽講話和李鵬與學生對話的差異，並開始推測兩人之間的分歧。負責向高層彙報示威情況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是站在李鵬一邊的，他後來在7月6日向全國人大彙報「反革命暴亂」時說，就在李鵬準備更加強硬時，趙紫陽卻擺出了諒解的姿態。陳希同與李鵬和鄧小平站在一邊，批評趙紫陽5月4日的講話背離了「四二六社論」精神。陳希同說，很多和他一樣的基層幹部正在努力控制違法亂紀的學生，他們覺得自己被趙紫陽的講話出賣了。他們正在試圖使學生讓步，在他們看來趙紫陽則過於同情學生。陳希同還說，很多知識分子在趙紫陽講話的鼓舞下，言論變得更加囂張，引起新一輪示威，造成了更大的動亂。^[20-33]而趙紫陽的追隨者則認為，李鵬這一派使他們爭取學生合作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為戈巴卓夫訪華作準備和絕食抗議：5月13–24日

對鄧小平來說，戈巴卓夫5月15日至18日對北京的訪問既是中蘇關係的一個歷史轉折點，也是他個人的一次勝利。兩個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長達30年的疏遠即將結束，關係正常化露出了曙光。早在1980年代初，鄧小平就提出了中蘇恢復正常關係的三大條件：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同時將軍隊從中國東北邊境附近撤離，越南人離開柬埔寨。他之前曾估計，蘇聯因戰線拉得太長，需要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這一估計已被證明是正確的。戈巴卓夫同意了所有三個條件，將按照鄧小平的條件前來北京訪問。這是鄧小平一生成就的頂峰之一。為了這次勝利，他準備做一個熱情的東道主，歡迎世界各地的記者前來共襄盛事。

隨著戈巴卓夫訪華日期臨近，全世界大批文字和攝影記者齊聚北京，準備全程報道這一事件。很少出國的美國電視新聞主持人拉澤爾（Dan Rather）也像其他西方知名播音員一樣親自來到北京。不難理解，鄧小平打算在戈巴卓夫到達之前竭盡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門廣場。趙紫陽5月4日的講話後學生開始返回校園，因此有理由期待事態將有所好轉。北京地區較為溫和的學生已經用腳投票，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但是那些更為激進的北京學生和外地學生仍然在廣場上安營紮寨。

5月13日上午，離戈巴卓夫訪華還有兩天，激進的學生領袖正發愁如何讓消退的運動保持活力，同時相信政府不會在戈巴卓夫訪華期間抓人，於是他們宣佈了一個中國示威傳統裏前所未有的奇舉：當天下午開始絕食。一千多名學生步行來到天安門廣場，聲稱政府若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就不吃飯。學生們宣佈：「我們不想死，我們也希望活著，充實地活著……但是如果一個人或幾個人的死能夠讓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們的死能使祖國更加繁榮富強，那麼我們沒有權利苟且偷生。」^[20-34]

大多數絕食者只喝水及飲料。也有假裝絕食、其實還吃東西的人。還有人既不進食，也不喝水，沒過多久就暈倒了。抱定一死的決心使絕食者的鬥爭超越了現實政治並在民眾中獲得了道德優勢。絕食者的電視畫面引起了國內外的同

情。一些指責學生阻斷北京交通的旁觀者也開始同情這些決心犧牲生命的學生，把他們看作英勇的受害者而不是麻煩製造者。政府官員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任何絕食者死亡都將激怒群眾，因此在對待絕食者上行動節制。沒有學生受到攻擊或逮捕，政府在雨天給他們提供大客車避雨，為他們提供公廁，派人清掃廣場衛生。同情學生的醫務人員在廣場上治療暈倒的人，把情況嚴重者送往附近醫院。據官方統計，從 5 月 13 日到 24 日，共有 8,205 名絕食者被送往醫院治療。^[20-35]在良好的醫療照顧下，沒有學生死亡，但死亡的危險增加了示威運動的戲劇性。

絕食抗議完全出乎中央領導人的預料。5 月 13 日，即絕食開始的當天，為此憂慮的鄧小平會見了趙紫陽和楊尚昆。他說這場運動拖得太久了。他要求在戈巴卓夫抵達之前清空廣場。當鄧小平問到群眾的情緒時，趙紫陽說，廣大學生知道不能拿國家的榮譽當兒戲，不太可能干擾歡迎儀式。趙紫陽承受著壓力，他要保證戈巴卓夫訪問期間北京平安無事。他也被賦予很大的自由，可以採取他認為必要的任何措施清空廣場。

5 月 14 日，幾位著名知識分子意識到戈巴卓夫到訪之前清場的重要性，同時也擔心發生暴力衝突，因此盡最大努力試圖化解對抗。12 名中國最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包括戴晴、劉再復和嚴家其等在內，發表聲明批評政府對待學生的方式和不公佈運動真相的錯誤。為了達成和解，他們呼籲政府承認獨立的學生組織，但也敦促仍留在廣場上的學生返回學校。^[20-36]他們勸解學生說：「民主是逐步建立起來的……要保持十分清醒的頭腦……我們懇請你們充分運用學生運動最寶貴的精神即理性精神，暫時離開廣場。」^[20-37]

趙紫陽沒有親自來到學生中間，而是派統戰部部長閻明復代替他去了廣場。閻明復在 5 月 16 日看望了學生。閻明復雖然身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但對學生的要求抱有同情。由於迫切地希望達成一致，他開誠佈公地向學生們披露了黨內的分歧，敦促他們離開廣場以保護趙紫陽。他答應次日再來見他們，並保證只要他們返回校園，就不會受到懲罰。閻明復甚至提出，為了確保他們受到保護，自己可以充當人質。^[20-38]然而，他的努力並未奏效。

儘管參加絕食示威的學生是在爭取民主，但是他們自己並沒有遵從多數原則。舉止大膽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說，他們有一個協定，哪怕只有一個學生想留在廣場上，運動也要繼續下去。^[20-39]學生們一直舉止得體，升國旗時會莊重地起立唱國歌。但是全社會鋪天蓋地而來的同情，也堅定了他們絕不退讓的決心。看到學生顯然不會離開廣場，閻明復明白這對趙紫陽的政治生涯意味著什麼，也擔心由此給國家帶來的後果，不禁傷心落淚。^[20-40]

戈巴卓夫訪問北京

5 月 15 日戈巴卓夫抵達北京那天，支持學生的人再次增多。5 月 16 日是鄧小平會見戈巴卓夫的日子，政府在凌晨 1 點作了最後一次清場的努力。廣場上的大喇叭廣播說，政府正在與學生代表對話。官方的廣播敦促學生考慮國家利益，停止絕食，返回校園。學生們在他們製作的歡迎戈巴卓夫的橫幅下聽著廣播，他們把戈巴卓夫視為值得中國效仿的政治改革家。其中一條橫幅上寫著「向民主的使者致敬」。^[20-41]但他們仍然拒絕離開廣場，而且有越來越多的人群前來支持他們。政府別無選擇，只好取消原定在廣場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有重兵把守的機場舉行了一個規模很小的儀式。鄧小平和戈巴卓夫的會見地點是人民大會堂，示威者試圖衝進去，事件過程中打碎了一扇窗戶。

在絕食導致的紛亂中被迫改變歡迎儀式地點，這讓鄧小平和老幹部們臉上無光，他們連自己首都的秩序都維持不了。不過，鄧小平和戈巴卓夫的會談進行得很順利。在中國領導人中間，沒有任何人像鄧小平那樣在中蘇之爭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他曾在 1960 年代初負責起草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又在 1963 年訪問莫斯科，代表中國與蘇斯洛夫交鋒。但是，他也曾兩次親自為改善兩國關係打下基礎：一次是在 1979 年攻打越南後不久，另一次是 1985 年他請來訪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Nicolai Ceaușescu）向蘇聯領導人轉達了中國就中蘇關係正常化提出的條件。中蘇兩國外交官之間的談判一直持續到 1989 年 2 月，雙方才就越南停止佔領柬埔寨的聯合公報的措辭達成一致，並宣佈了戈巴卓夫訪問北京、開創友好關係新時代的日期。^[20-42]

鄧小平精心地與美國官員保持溝通，以便不使中蘇關係的改善損害中美關係。中蘇雙方一達成協議，鄧小平立即在 1989 年 2 月 26 日會見了參加日本天皇葬禮後到中國進行短暫訪問的美國總統喬治·布殊。鄧小平向布殊保證中蘇關係的改善不會影響中美兩國的友好關係。他首先回顧了中蘇關係史，明確表示中國不會與蘇聯發展出 1950 年代那樣的親密關係。他說，中國將繼續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因為這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20-43]5 月份，就在戈巴卓夫到訪前夕，他又派萬里去消除美國和加拿大官員——包括在 5 月 23 日向布殊總統——的疑慮，與戈巴卓夫的會談不會損害中國與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中蘇會談之後，他派錢其琛外長向美國通報了會談的內容。

5 月 16 日鄧小平與戈巴卓夫兩個半小時的會談中，錢其琛外長也在座。據他說，鄧小平在會談中興致勃勃，甚至有些興高采烈，因為他是依照自己的條件彌合了與蘇聯的裂痕。鄧小平和戈巴卓夫都是改革家；84 歲的鄧小平即將結束他的政治生涯，而 58 歲的戈巴卓夫才剛剛開始。鄧小平毫無敵意地談到過去與蘇聯的矛盾，他承認親自參與過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之爭，但是他說，爭論的雙方講的「全是空話」。^[20-44]他坦承「我們也不認為當時我們說的話都是對的」。鄧小平不靠筆記，僅憑記憶就清楚細緻地講述了跌宕起伏的中蘇關係。他說，問題的原因在於蘇聯對中國不能總是做到平等相待。但是他又說，中國絕不會忘記蘇聯的援助為新中國打下了工業基礎。鄧小平同意結束過去的爭論，放眼未來，使中國能夠與各個鄰國建立睦鄰關係。戈巴卓夫對歷史背景已有很好的瞭解，他言談謹慎，表示贊同鄧小平的看法，中蘇作為鄰國應當努力發展友好關係。^[20-45]

鄧小平對戈巴卓夫發表了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講話，但他畢竟年事已高——有人認為他當時也有些緊張，在歡迎戈巴卓夫的宴會上，他面對鏡頭時手有些顫抖，餃子竟從筷子上滑落下來。^[20-46]就在這一天，有大約 200 名絕食者被緊急送往醫院治療，廣場上的絕食者還有大約 3,100 人。^[20-47]鄧小平很難忘記不斷惡化的局勢。

戈巴卓夫在 5 月 16 日下午會見趙紫陽時說，他已經見過鄧小平，但現在見到趙紫陽總書記，全部協定才算是得到了正式認可。趙紫陽解釋說，鄧小平仍在工作，中國仍然需要鄧小平的智慧和經驗，「因此 1987 年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要由鄧小平同志掌舵」。^[20-48]鄧小平得知趙紫陽這些話後很不高興。趙紫陽的支持者後來解釋說，趙紫陽理所當然要糾正戈巴卓夫的印象，因為他與鄧小平的見面也是正式的官方會見。趙紫陽後來也說，他是想保護鄧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損害。^[20-49]然而李鵬在日記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承認趙紫陽的說法是準確的，但他認為趙紫陽在這種場合說出來，是想把 1988 年的經濟問題和導致學生示威運動惡化的決策責任推給鄧小平。^[20-50]事實上，像李鵬一樣，鄧小平確實認為趙紫陽的話是在指責他要對當前的問題負責。^[20-51]

全世界的記者聚集在北京，本來是要報道中蘇和解的過程，卻發現學生運動更加引人入勝。確實，廣場上的大戲很快就使戈巴卓夫的訪華黯然失色，不再是媒體關注的焦點。外國記者們很難不被學生的理想和熱情所打動，而學生也遠比以往的中國人更加大膽敢言。在國際社會的關注下，他們愈加相信解放軍不會對他們動武。有些學生意識到這是向世界展示的機會，便派會講英語的示威者站在遊行隊伍的周邊，向全世界講述他們對民主自由的渴望和消除高層腐敗的必要性。一些連續報道此事的外國記者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他們說，大多數學生其實對民主自由瞭解很少，對如何實現這些目標也沒有多少想法。^[20-52]

在戈巴卓夫訪華期間，廣場上的學生數量日見增長。5 月 18 日儘管下雨，據國家安全部估計廣場上大約仍有 120 萬人。^[20-53]抗議活動也擴散到了其他大城市，另有大約 20 萬學生從外地湧入北京，路途遙遠的甚至要坐數天火車。有些學生認為自己是為正義而來，因此像文革期間的紅衛兵那樣要求免費乘車。原定於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戈巴卓夫記者招待會，由於車隊無法通過廣場，最後一刻改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20-54]但是大批記者並沒有去記者招待會，而是仍然留在天安門廣場。

戈巴卓夫的到訪不僅標誌著中蘇關係的轉折點，也是學生運動的轉折點。在此之前，鄧小平希望學生能夠聽從向他們發出的愛國主義呼籲，在戈巴卓夫抵京前離開天安門廣場。對鄧小平來說，按中國的條件結束中蘇分裂是一件大事，絕不能放棄把天安門廣場作為舉行歡迎儀式的地點。可是學生卻不願讓步。當時鄧小平不想派軍隊進來，讓可能導致的衝突破壞戈巴卓夫的訪華。但是，當學生們在戈巴卓夫訪問期間固執地不離開天安門廣場時，鄧小平認為他們做得太過分了。他準備動用軍隊。

[20-1]來自高層人士的兩個文獻是：Zhao Ziyang,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Zhao Ziyang*, trans. and ed. Bao Pu, Renee Chiang, and Adi Ignatiu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9), 這是根據他軟禁期間的錄音翻譯的文獻；以及李鵬這個時期的日記：《李鵬六四日記》，可在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查閱。關於 1989 年春天北京示威運動最有用的文獻是：Michel Oksenberg, Lawrence R. Sullivan, and Mark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The Basic Document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尤其是 Melanie Manion, "Introduction: Reluctant Duelists," pp. xiii-xlii; Suzanne Ogden et al., eds.,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The Student and the Mass Movement of 198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Minzhu Han,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Orville Schell, *Mandate of Heaven: A Generation of Entrepreneurs, Dissidents, Bohemians, and Technocrats Lays Claim to China's Fu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Binyan Liu, with Ming Ruan and Gang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New York: Pantheon, 1989); Tony Saich, ed.,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Spring 198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video recording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Richard Gordon and Carma Hinton (San Francisco: NAATA/CrossCurrent Media, 1996); Mike Chinoy, *China Live: Two Decades in the Heart of the Dragon* (Atlanta: Turner Publishing, 1997); Tang 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Melinda Liu "Beijing Spring: Loss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in David and Peter Turnley, *Beijing Spring* (New York: Stewart, Tabori & Chang, 1989), pp. 44–172. Jonathan Unger,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1); Dingxin Zhao,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James Lilley, with Jeffrey Lilley,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4), pp. 297–392. (李潔明於 1989 年 5 月 2 日到中國擔任美國大使，一直待到 1991 年 5 月。)對現有文獻的仔細分析見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美國政府的《天安門文件》中包括現藏於國家安全局的政府解密文件，帶有導讀，收入 Michael L. Evans, ed.,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New Documents Reveal U.S. Perceptions of 1989 Chinese Political Crisis," 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June 4, 2001,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47/>, 訪問日期 March 16, 2010. Tony Saich 和 Nancy Hearst 所編 1989 年 6 月 4 日之後一年的文獻目錄見 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p.190–196. 最全面的文獻集，包括一個大事年表，是 Liang Zhang, comp., and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eds., *The Tiananmen Papers*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1). 這些文件由中國的改革派收集並送給編者用來在西方出版。有些文件肯定是真的，但還有一些文件，尤其是記錄八老開會和電話交談的文件，其真實性受到質疑。據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說，她父親在討論人事問題時，是與每個人單獨交換意見，而不是像這些文件中描述那樣與很多人一起商量。中文版張良編：《中國六四真相》（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比英文版更完整。中文版頁 988 用「韓國」一詞指南朝鮮，但這個說法只在 1992 年中國與南韓關係正常化後才在大陸使用，過去都是用「南朝鮮」一詞。由於臺灣和香港在 1989 年使用「韓國」一詞，這至少給一部分文件的真實性帶來疑問。事實上，無論在李鵬和趙紫陽他們對高層政治的可靠紀錄中，還是官方的年鑒文獻中，都沒有提到八老會議，這使人懷疑是否真正有過這樣的會，但也有可能這些會議的機密文件尚未被外界所知，或者李鵬和趙紫陽也不知情。Alfred L. Chan 與 Andrew Nathan 進行交流時也對其可靠性表示懷疑，見 Alfred L. Chan and Andrew J. Nathan, "The Tiananmen Papers Revis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7 (March 2004): 190–214. Nathan 和 Link 在編輯和校對譯文上做了十分細緻的工作，由於這是一本方便的總集，因此我利用了這本書中的很多文件，但不包括其中的八老會議紀錄和電話紀錄，因為材料不完全可靠。

[20-2]TP, p. 21.

[20-3]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第 466–467 頁。

[20-4]李銳：〈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張黎群等編：《懷念耀邦》（四集）（香港：一、二集，凌天出版社，1999；三、四集，亞太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1），第四集，頁277-278。

[20-5]對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深入討論見 Perry Link（林培瑞），*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New York: Norton, 1992)。林培瑞有極為出色的漢語水平，在1988年和1989年一直住在北京，他與中國知識分子的交往沒有哪個外國人能與他相比。一本討論當時一般老百姓看法的出色文集見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美國駐華大使洛德（Winston Lord）的妻子包柏漪也與許多鼓吹民主的知識分子有來往。在2009年1月為中美關係正常化30周年舉辦的慶祝會上，洛德大使對我說，學生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包括中國媒體的人員，因此對這個政權會作出一些改變允許更多民主很難不抱有一定希望。林培瑞在回顧往事時說，他們當時低估了最高領導人進行鎮壓的決心。

[20-6]董輔初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第2卷，頁348。

[20-7]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57-59, 87-88.

[20-8]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p. 78.

[20-9]《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18日。

[20-10]《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18日、19日、20日。

[20-11]Liu, Ruan, and Xu, *Tell the World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Why*, p. 9.

[20-12]2006年11月對姚監復的採訪；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95-96 and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7-28，都是根據不知道全國人大委員與請願者見過面的學生的說法。另見 Baum, *Burying Mao*, pp.248-249; 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p.165-166.

[20-13]據1993年12月16日與趙紫陽交談過的楊繼繩的說法。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卓越文化出版公司，2004），摘要譯文見 Qiren Mei, ed., "Three Interviews with Zhao Ziyang,"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38, no. 3 (May-June 2005)。另見與趙紫陽有密切工作關係的孫長江的文章：〈趙紫陽口述與胡耀邦關係〉，載《動向》，2006年第5期，頁28-32。另見 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6-7.

[20-14]TP, p. 55;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 xvi。關於廣場上不同時間的人數沒有官方紀錄，對人群規模的估計以及當天事件發生的確切時間和聯合會所代表的學校數量也有差異。我所採用的人群的估計數是與幾位目擊者的共識最為接近的數字。

[20-15]《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23日。

[20-16]《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23日。

[20-17]《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24日。

[20-18]《李鵬六四日記》，1989年4月25日。TP, pp. 78-79; Larry M. Worzel, "Review: Quelling the Peopl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p. 125; Timothy 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9-40; Kristof and WuDunn, *China Wakes*, p. 79.

[20-19]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Domestic Radio 0930 GMT, FBIS, April 25, pp. 23-24.

[20-20]TP, pp. 76, 80-81.

[20-21]Saich,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 167; Long Bow Group,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20-22]TP, pp. 95-96.

[20-23]TP, pp. 86–95.

[20-24]1989 年 6 月採訪劉賓雁。

[20-25]《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4 月 23 日。

[20-26]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5–9.

[20-27]TP, pp. 74.

[20-28]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8–14.

[20-2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100, 107–108.

[20-30]這篇講話收入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44–251.

[20-31]對外國人講話不要求經過其他領導人圈閱，但考慮到當時的緊張局勢，趙紫陽不徵求別人意見的做法加重了外人覺得他不按政治局常委中其他成員的意願行事的印象。據 TP, p. 108，趙紫陽其實在 5 月 1 日已將講話稿送交政治局常委其他成員。

[20-32]原文見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254–256.

[20-33]原文見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p. 69–70.

[20-34]TP, p. 154.

[20-35]Brook, *Quelling the People*, p. 37.

[20-36]Ogde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215–217.

[20-37]關於這份聲明和簽名者，見 Han, *Cries for Democracy*, pp. 207–208. 相關分析見 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pp. 308.

[20-38]David Zweig, "The Hunger Strike: From Protest to Uprising," in Ogden, ed.,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pp. 194–195, 尤見 footnote 29; TP, p. 176.

[20-39]TP, p. 202.

[20-40]2006 年 11 月採訪姚監復。

[20-41]Lilley, *China Hands*, p. 301.

[20-42]Qian Qiche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foreword by Ezra F. Voge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5), pp. 1–31.

[20-43]George Bush and Brent Scowcroft, *A World Transformed* (New York: Knopf, 1998), pp. 91–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89 年 2 月 26 日，頁 1266–1267。

[20-44]沈志華仔細評估過他們的會談，認為這確實是鄧小平對戈巴卓夫說過的話。官方的會談紀錄稱，鄧小平說最初的辯論包含著「一些空話」。

[20-45]Qian,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 pp. 29–31.

[20-46]Tsou, "The Tiananmen Tragedy," p. 306.

[20-47]TP, p. 173.

[20-48]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eds., *Beijing Spring*, 1989, p. 261.

[20-49]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p. 35–44.

[20-50]《李鵬六四日記》，1989 年 5 月 16 日。

[20-51]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 p.48.

[20-52]2007 年 8 月與王丹和其他學生運動領袖的交談。

[20-53]TP, p. 194.

[20-54]TP, pp. 163–175.